

炎黄春秋



萧克：读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后记

说实话，办实事：

陆定一立德立身立言

错误开除刘少奇党籍时

陈少敏唯一反对票的是非毁誉

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

——中国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能保持金牌第四吗？

饮誉中外的
正义法官梅汝璈
致“三家村”作者
亡灵的祭文



陈少敏

7
96

賀炎黃春秋創刊五周年

弘揚中華文化
振奮民族精神

楊成武
一九九六年四月

炎黃春秋雜誌創刊五周年

繼承弘揚炎黃精神

朱德勝
一九九六年四月

祝炎黃春秋創刊五周年

為炎黃春秋雜誌創刊五周年題

堅持實事求是精神

堅持實事求是弘揚民

神弘揚中國革命

族優秀文化

歷史

程思遠

一九九六年四月 王平

慶祝炎黃春秋雜誌創刊五周年

1996/7 (总第 52 期)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飞无线电电讯发展公司
深圳市建设基础工程公司

理 事:孙敏伟 宋晓洛

秘 书 长:徐 孔

副秘书长:段向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编:100802 电话:66170955

排版:北京维科电子技术研究所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M

出版日期:每月 11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 价:4.00 元

专 稿

②读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后记 萧 克

④讲真话,做实事:陆定一立德立身立言 徐庆全

⑨致“三家村”作者亡灵的祭文 丁一岚

春秋笔

⑪错误开除刘少奇党籍时

陈少敏唯一反对票的是非毁誉 耿一民

⑳“太上皇”洋顾问李德离开中国之后 卢 弘

㉘黄绍竑、刘斐与 44 人声明 刘晓滇 刘小清

时代风

③③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

——中国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能保持金牌第四名吗? 笑 非

赤子心

③⑧谢子长之子谢绍明是怎样继承父业的 青 霞 炳 书

殒星篇

④④碧血丹心的郭化若将军 周而复

④⑧抗日英雄李兆麟遇害始末 钟子云

英杰谱

⑤①贺龙和他的姐姐贺英 周保林 罗长江

⑤⑥饮誉中外的正义法官梅汝璈 王俊彦

长征颂

⑥①有关记述长征故事的故事 辛 平

⑥⑦大渡河边的战前动员 李水清

⑥⑨珍贵的长征记录 谢景星

⑦②从 60 年前拍摄的毛泽东照片说起

——红军老战士钱江忆长征 钱听涛

艺苑志

⑦⑤我与“武生泰斗”厉慧良的 40 年交往 冯其庸

遗闻录

①⑨彭总和甘泗淇行军路上的一次趣谈 陈辛火

古镜台

⑦⑧契丹一代巾幗英主萧太后 王兴文 关玉华

读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后记

● 萧 克

编者按：这是萧克同志1971年冬在江西永修云山国务院农林部“五七”干校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原文写于作者所存1960年人民出版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91—599页眉批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75周年，又是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发表的75周年，我们特请萧克同志将他这篇文章核校后，在本刊发表，想来定能给读者以教益。



定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又概括地总结了布尔什维克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以为是篇常读常新的杰作，特别是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所作的自我批评，更使人受到至深的启迪和教育。

读了列宁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我感到列宁思想上最伟大最感人之处，就是他敢于公开承认十月革命四年来所犯的重大错误，深刻分析了错误的由来，并提出了切实措施坚决予以改正。列宁说：“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失利和错误……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纠正这些毛病，改进我们把苏维埃原则运用于实际的方法（我们的方法还远远不够完善）。”列宁又说：“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将冷静地看待这些错误，学会改正这些错误。”列宁还特别指出：“最后的，也是最重要最困难和我们根本还没有做到的工作，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制度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定经济基础。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最多。”列宁坦然承认了这些错误，并提出以“新经济政策”改正这些错误。他强调说：“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从1969年到江西云山农林部“五七干校”以来，我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及《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书，特别仔细读了列宁的《十月革命四周年》，帮我清理了时下流行的被颠倒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使我困惑之心态大大减轻。

列宁写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既热情地肯

十月革命后,苏俄党与国家所犯的最为重大的错误是什么呢?列宁说:过去,“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我以为,这句话非常重要。想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生产和产品分配,这是错误之一;想用热情的浪潮来直接实现经济任务,这是错误之二;想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来达到上述目的,这是错误之三。回顾我们自己有些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三条不值得我们特别认真地思考一番么?在一个小农的国家里,究竟怎样走向社会主义?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并指出“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许多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达到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列宁强调说:“对个人利益的关心,能够提高生产;我们无论如何首先要增加生产。批发商业能够在经济上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引起他们经营的兴趣,把他们联系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在生产中用各种形式的联系和联合起来”。因此说,我们“学习新的转变,学习实行‘新经济政策’了。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的主人,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是没有其他过渡到共产主义道路的”。列宁还写过一篇文章叫作《论合作制》。他在那里面写到“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善于把我们

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获得了完满结果的革命胆略和革命热忱(这里我几乎敢于说)与作为一个干练而又有胆识的商人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所谓作商人的本领是指作文明商人的本领。这一点是俄国人,或者直截了当说是农民应该牢牢记住的。他们以为一个人既然作买卖,就有本领作商人。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对的。他们虽然在作买卖,但作买卖距离有文明商人的本领还远得很。他现在是按亚洲方式作买卖,但是为了善于作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作买卖。他要作到这一点,还需要一整个时代。”(《列宁选集》第4卷第718页)中国也是一个小农充斥的国家,列宁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应当有所帮助。

今天的中国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照列宁时期的具体措施来办,但应该根据他的观点立场来解决问题。我重温列宁这些论述,深深感到列宁无论什么时候,对革命事业和他所领导的党和国家都极端认真负责,表现了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求实精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的继续做下去,错的便承认错误,切实改正。尤其可贵的是他绝不讳疾忌医,不推卸责任,一旦发现了错误,便努力想出切实措施,加以改正。

在革命运动遇到新事物的时候,在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要学习。在十月革命五周年时,已经有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不少新经验了,列宁还反复强调学习,指出新经济政策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应当学习,而且从头学起”,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他还说:“我们在这新的‘科学’的领域里,就要读完预备班了。我们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下去,要用实际经验来检查我们每一个步骤,不怕多次地改进初步着手的工作。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就能升到以后的一班级里去了。”这一有力的督促,对每个共产党人来说,都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鞭策!都不能例外!如果放松了不断学习,而听凭自己的热情和意志,便贸然作出重大决策,那就可能在实践面前碰壁。

讲真话，做实事：

陆定一立德立身立言

● 徐庆全

如果从1928年5月，陆定一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算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已在党的宣传领域工作快40年了。因此，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陆定一有一个尽人皆知的雅号——“老宣传”。这不仅是因为迄今为止，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担任中央宣传部长时间最长的人，而且是因为他“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新华社发《陆定一同志生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另一个并不尽人皆知的雅号——“党内笔杆子”，更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今年的5月9日，陆定一同志离开了我们，为了纪念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特意采访了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及其子女，写成此文纪念他。

求真求实，经得住历史考验

1981年3月12日，一部分当年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过的老同志，欢聚一堂，为《解放日报》史的编写提供史料。作为当年《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陆定一，出席会议，并讲话。这篇讲话，就是现今收在《陆定一文集》里的《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一文。

陆定一是在1942年8月担任该报总编辑的。当时延安整风运动已开展四个多月了。其实，早在4月3日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就点了陆定一的将，指名要他为《解放日报》编辑“学习”副刊，宣传“整顿三风”的思想。他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一系列比较有影响的文章，论述从实际出发开展整风运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担任总编辑后，陆定一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以一种务实的工作态度，为当时的《解放日报》以及后来我党的新闻宣传定下了基调。

当时，《解放日报》的社长是博古同志，他主张，报纸的总编辑应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陆定一上任以前的总

编辑杨松同志，就是按照这一要求行事的。陆定一上任后，认为报纸的社论是代表一种方向性、政策性的意见的，每天都发一篇，流于形式，就失去了它的指导意义，因而不同意这样做。

博古对此很有意见，他对陆定一说：“你看《真理报》（当时的苏共中央机关报）不就是每天写一篇社论吗？我们要学《大公报》嘛。《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到报馆看重要新闻。王芸生（当时《大公报》的总编辑——引者）进去请示今天社论怎么写。他们商量一下就决定，今天写个什么什么社论。王芸生就去执笔，写了后再商量修改，一篇社论就出来了。张季鸾说：‘我们《大公报》的社论，只管二十四小时，第二天就可以擦屁股。’”

对博古的这番高论，陆定一不为所动，而且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他说：“第一，我不是杨松；第二，我的社论十年以后还要经得起审查，不能只管二十四小时。”博古无奈，只好同意了陆定一的意见。从此，《解放日报》的社论就不是一天一篇了。社论也变得令人喜欢看了。

对于报纸撰写社论的方针，陆定一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当年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不但在“十年以后”“经得起审查”，而且，有的即使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翻开他在1943年9月1日为《解放日报》所写的社论——《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即可得到非常有力的证实。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社论，陆定一在这次座谈会上做了阐述。他回忆说：“那时报纸的编辑和记者们都是青年，二十几岁，其中有些人受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影响。当时新闻学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是所谓‘性质论’ Quality theory，认为新闻就是某种性质的本身。这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完全相反。自己的稿子，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许别人改，说‘我写的稿子有趣味性，你得登，否则你就违背了新闻学原理’。这种事情发生多了，我就写了一篇关于新闻学方面的文章，只写了一段，就是解

决这个问题的。还想写下去，没有写成，看来也不必写下去了。”

在这篇文章中，陆定一开篇就强调说：“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主义，就是科学主义。”既然无产阶级崇尚的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么，“在新闻事业方面，我们的观点也是老老实实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我们党开始从事自己的新闻事业时，就有了的”。

那么，这种“老老实实”的新闻观点是什么呢？陆定一接着阐述道：“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做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

既然如此，他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

接下来，陆定一又对唯心论有关新闻的“性质说”——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论述了新闻性和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既然有唯物的社会观，就一定承认每个新闻归根结蒂具有政治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说，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说‘新闻就是政治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置颠倒过来。”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的新闻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事过40年的1982年10月6日，陆定一对《新闻战线》杂志记者发表谈话时，依然强调他40年前的观点：“新闻，我是天天看的，看了几十年了。看来想去，想来想去，我还是认为，新闻一定要真实。”

可见，追求新闻的真实性，是他一生的愿望。

在这次座谈会上，陆定一还讲到了当时康生在延安搞的所谓“抢救运动”：“‘抢救运动’在报社也搞了，后来停下来，很多机关把青年打得很惨！《解放日报》损失较轻些。陈坦同志可以说一说。”

对党史稍有了解的同志都知道，“抢救运动”是当时康生所搞的一个大冤案。延安整风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对干部的审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干部进行审查，是必要的。但是，“负责审干的工作的同志往往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胡乔木同志回忆说，“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

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性问题，甚至反革命，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仍然采用‘逼、供、信’，使审干工作出现了偏差”。当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利用了这一偏差，把审干运动变成了混淆敌我界限，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的“抢救运动”。

当时的延安，人人自危，各个单位都要揪出所谓的特务来，《解放日报》当然也不例外。当时的报社为什么会损失小一些呢？陆定一所提到的陈坦同志已经不在人世，我们无法从他那里了解内情，倒是当时在延安的温济泽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

据温济泽讲，“抢救运动”开始后，康生就给《解放日报》下达了揪出“特务”的指标，并且捕风捉影地说，《解放日报》有一个国民党的支部。但是，陆定一认为，对待任何同志的问题，都应当以事实作依据。报社里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即或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多些的人，也没有“特务”的嫌疑，所以，他坚决地把康生下达的指标顶了回去。因此，《解放日报》的损失才“轻些”。

陆定一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使他对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的东西非常反感。

1956年3月，陆定一到上海检查宣传工作，一些形式主义的倾向，引起了他的关注。他除了自己在上海致力于纠正这种倾向外，还希望引起中央的注意。3月23日，在随他去上海的陈克寒和包静之等同志要回北京



1961年，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作报告

时,他随即就这一状况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写下了一封信,这就是现今留在《陆定一文集》里的《应当纠正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一文。

在这封信中,他列举了上海宣传工作中相当严重的形式主义的现象:“在工厂中,一是广播,不管工人在做工、吃饭,它在作政治报告。这时候,究竟是停了工注意听报告好呢?还是专心做工不听政治报告好呢?二是宣传网,在党、团、工会之外另立系统,经常汇报,实际上是占了时间,添了忙乱,反而使宣传员没有可能利用时间去向工人做宣传。其实,党委宣传部要了解思想情况,经过党、团、工会、行政等系统足够了,用不着直接听宣传员一个个来汇报,至于宣传员,不是团员,就是党员或是工会会员,用不着另外再有一套独立组织……三是学习,项目很多,学习起来又总是先听报告,然后分组讨论,一条一条不分轻重缓急,总是老一套,为的可以报账。结果时间拉得很长,学得没有味道。现在工厂的党委宣传部门,在工人中被认为‘五多’部门。”

陆定一在信中继而谈到长江轮船上,对乘客要上政治课、有些乡村买大批喇叭准备做到“家喻户晓”等等。他说:“凡事要有分寸。讨一个老婆是喜事,讨两个老婆是犯法,吃二、三碗饭可以饱肚子,合卫生,吃十碗八碗同样的饭就会生病。”

因此,他忧心忡忡:“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再不适当纠正,就不行了。它会妨碍建设,会令人望而生畏,宣传工作脱离群众,就糟了。”

为了解除这种忧虑,中宣部必须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因此,他甚至等不到自己返回北京,就托人将自己的意见带回中宣部,目的是使中宣部的领导层,“在思想上有所酝酿,集体讨论,请示中央,再做适当部署”。

反思历史,批判两个“两个凡是”

1978年12月2日,中组部和公安部的两位副部长,将陆定一接出了监狱病室。至此,结束了他自1966年5月8日开始的为期13年的囚禁生涯。

1979年6月8日,中央给他做出了平反的结论后,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两次同他谈话,希望他回到中宣部,接替他刚离任的部长之职,或者去中央党校担任校长,培养党的高级干部。陆定一却对耀邦说:“我已经73岁了,孔夫子就是这个岁数死的。人老了,身体不好,不能再去占这个位置了。”决定退居二线。

但是,退居二线的陆定一,并没有一心安度晚年,还是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作为在宣传部门工作了近40年的老人,陆定一知道,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往往可视为一个国家政治变化的晴雨表。因此,他晚年所做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

思。

陆定一这样做,虽然与他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无联系,但决不是为了纠缠于个人恩怨。

“文革”中,陆定一一家的遭遇确实是相当悲惨的:他和妻子严慰冰各自被关押了13年,大儿子陆德被关押了6年,并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女儿陆瑞君和小儿子陆健,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陆定一冤案平反后,即告诫孩子们,不要从个人的恩怨出发,来看待当初曾受命关押、审讯他们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一场浩劫,虽然使千千万万的人陷入悲惨的境地,但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灾难。因此,他要反思,并通过反思,在理论上对这场运动进行高屋建瓴的认识,力求使我们党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严重错误。

陆定一的反思,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历史经验,作为参照物的。他的思考是从王明路线开始的。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之际,陆定一也在莫斯科。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以后,随即在共产国际设立了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瞿秋白任团长,当时陆定一任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他也是少共国际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委员。当时,陆定一追随瞿秋白,对王明的“左”倾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苏联一家报纸来采访陆定一,要他谈谈中国革命的情况,并约他写文章。他将毛泽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详细介绍了一番,并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走乡村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这一观点,与当时共产国际主要是发动工人阶级,以城市斗争为重点,进而夺取政权的理论是相左的。

王明是依靠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而上台的。他们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以此来解释和解决中国革命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马恩列思说过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给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瞿秋白和陆定一,也因为坚决反对这两个“凡是”,被扣上“调和路线”的罪名而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王明“左”倾路线对党的危害是巨大的,它曾使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使苏区的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曾在同王明“左”倾路线斗争中遭受过打击的陆定一更是把这一惨痛的历史铭记心头。

据于光远回忆:1956年5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施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光远随同陆定一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向尤金大使通报情况(那时中苏关系比较好,凡是两党中央的决定,都要互相通报,并征求意见)。尤金听了陆定一约半小时介绍后,转身走进里屋,拿出《列宁全集》中的《做什么》一文说:“你们谈的问题,列宁这本书中有些话可供你们参考。”陆定一同志没有说话。待出了苏联大使馆,陆定一才感叹地说:“尤金也

不问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方针,就拿列宁的书来。多少年了,苏联的教条主义还是这样严重。”接着,他又谈到了王明的“左”倾路线时的“两个凡是”,感情仍然难以抑制。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又产生了另外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陆定一被解放之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也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紧要关头。

曾与王明“两个凡是”做过斗争的陆定一,对眼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两个凡是”,自然十分警觉。

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之后,他以三中全会的精神为出发点,以实事求是为准绳,反思历史。这在他1979年的3月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一文可以得到证实。

文章在追述了与周总理的交往后,着重阐述了周总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的精神”,并由此谈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

他指出:“庐山会议上有些人的态度,与周总理的态度成了明显的对比。由此,我更钦佩周总理的实事求是态度和民主作风。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原来的目的,是要实事求是地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加以改正的,但是却变成了反对彭德怀同志正确意见的会议,这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打倒‘四人帮’以后,才得以纠正。”

谈完庐山会议,他又对照周总理对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实事求是的估计”,找出了自己的错误,并做了检讨:“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陆定一的这一段话,现在看来或许并不值得惊讶,但在当时却需要足够的勇气。因为,第一,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的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但据此实事求是的分析、审视、评述每一个历史事件,还需要艰难的努力。因此,在此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庐山会议上“有些人的态度”与周总理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符,已是不易;而他还更进一步地强调:“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就更加难得。第二,他在对历史是非进行评论时,并不将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在报纸上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没有足

够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难以做到的。

文章中更为可贵的一点是,将庐山会议后的“左”倾错误,上升到了“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在当时“两个凡是”阴影未消的情况下,陆定一需要直面来自一些人的责难。

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出后,果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人民日报》在3月8日转发了此文。根据陆定一的子女和秦川的回忆,当时,《人民日报》在转发此文前,曾派人找到陆定一,希望能删掉文章中“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这一句。理由是,这一句前已有“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的话。但陆定一坚决不同意,并声明不更改一字。

陆定一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呢?

“文革”中,陆定一被关在秦城监狱时,李锐同志正好与他关在隔壁。尽管由于监狱的管理很严,他俩谁也见不到谁,但李锐还是从隔壁经常传来的“我没有反对毛主席”的大声呼喊,判断出了他就是所熟悉的陆定一。李锐回忆说:“我们的冤案平反后,依旧往来。我知道他对毛主席从来都是很敬佩的。‘文革’这场浩劫又使他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命运。”

陆定一的儿子陆健对笔者说:“爸爸临终前曾对我说:‘我一生就一些事情发表过反对意见,但并不是冲着哪一个人的,我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来发表意见的’。”

陆定一这种实事求是的大无畏态度,对推动意识形态领域里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作用是巨大的。

实地考察,为乡镇企业鼓与呼

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新体制的实行,必然要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对农村改革的争论。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农村办起了乡镇企业(当时称社队企业)。但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乡镇企业所需的原材料以及产品的销售市场是不被列入计划的。为了获取原材料和销售市场,在夹缝中得以成长,一些乡镇企业的领导人曾利用“请客送礼”等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必会对计划经济产生一股冲击力,因而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扰乱市场”、“扰乱价格”和“以小挤大”等现象。这些现象,现在看来,是经济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乡镇企业是公有性质还是私有性质,也就是说“姓资还是姓社”?它的发展是有利于国民经济还是干扰了国民经济?由于当时中央对农村改革的重点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的发展,却持相当谨

慎的态度,因而一些同志把乡镇企业与苏联的那种“地下工厂”划等号,并提出应明令禁止。这种大气候,使得当时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每年年底的全国各地财务大检查,都无一例外地把乡镇企业当成了重点的清理整顿对象。清理一次,就有一些乡镇企业被整顿掉,也有一些企业家受到了不应有的处理,甚至被关押。

当时,已退居二线的、76岁高龄的陆定一,也十分关注农村改革,关心农民的致富问题,那场波及全国的有关乡镇企业性质的争论,也使他困惑。对于像他这样在党的宣传战线工作了一辈子的人来说,解决工作中所遇到困惑的唯一办法,就是调查研究,从中得出结论。因此,1982年,他决定前往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起伏也比较大的江苏省,特别是他的老家无锡进行考察。

无锡的农村,人均耕地仅有三分。虽然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但是要想在这三分地上富裕起来,却是不可能的;而且,三分地所投入的劳动力并不多,农村中必然要面临一个过剩的劳动力的出路的问题。这些现象引起了陆定一的思考。

他认为,过剩劳动力的出路,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道路那样,使大量农民破产,流向城市,形成廉价劳动力;一种是就地安排,给他们创造一个就业的机会和条件。选择哪一种方式,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如果走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子,使数亿农民破产涌入城市,必将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大灾难。因此,农

村过剩人口只能在乡、镇、县一级的范围内进行安置,而安置的措施,就是大力扶植农民创办相关的企业,使引起争议的乡镇企业朝着健康完善的道路发展。

实地考察,使陆定一对乡镇企业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前景,有了充分的认识,并在与家乡人的座谈中,对乡镇企业做了充分地肯定。家乡人见他态度鲜明,也纷纷将创办乡镇企业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向他详细地作了汇报。当陆定一听说乡镇企业年年挨整,甚至有的企业家为此不得不自杀时,他被深深地震撼了。

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再也无法沉默了;他觉得他应该将这些情况向中央汇报,使中央尽快出台一项为八亿农民撑腰的措施。于是,1982年初,他将到乡镇企业的考察和自己的认识,写成一封信,转给了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并在信中提出了后来几乎成为农民“尚方宝剑”的一句著名的话——“谁反对乡镇企业,谁就是反对八亿农民”。

胡耀邦对陆定一的这封信非常重视,当即批转印发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当时,中央虽未就此有过什么明确的文件,但陆定一的这封信却引起了全国的重视,并促使人们对乡镇企业有了新的认识。此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对乡镇企业试点的探索和探索,1984年初,中央下发了对农村政策的“一号文件”。文件第一次为乡镇企业正了名,并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作为党对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明确规定下来。

现今,乡镇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富裕起来的农民,自然不会忘记陆定一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所做的一切。

作者附记: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采访了于光远、冯征、李锐、张映吾、周而复、秦川、温济泽、童大林、廖盖隆等同志,以及陆定一同志的子女陆德、陆瑞君、陆健,陆定一同志的秘书宋广为、《光明日报》社的陈清泉等同志,在此谨表谢意。

(责任编辑 洛松)



陆定一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经毛泽东修改的手迹

前言：今年的5月18日，是“文革”奇冤大案“三家村”作者之一邓拓同志含愤逝世30周年纪念日。“三家村”另两位作者吴晗、廖沫沙，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亦先后离开人间。今年5月17日，“三家村”作者及刘仁同志的亲属、朋友近五十人，在北京八宝山骨灰堂

内举行了极简单的纪念仪式，向他们三位先行者与他们的老领导、北京市委书记刘仁表示深切的悼念。刘仁夫人甘英、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都有祭词发表。这里是丁一岚同志的祭文原文。丁一岚是我国著名的广播工作者，原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

致“三家村”作者亡灵的祭文

● 丁一岚

敬爱的刘仁同志，吴晗、沫沙同志，亲爱的云特^①：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全面发动了文化大革命，5月18日成为众矢之的的邓拓同志被迫离开了我们。全国批斗的矛头很快集中对准了“三家村”、北京市委。十年浩劫中，很多同志含冤逝世，活下来的同志也被整得或病或残。现在一晃过去30年了，没有见到你们也已经30年了。沫沙同志有幸坚强地活到了83岁病故。

今天你们的亲人、老战友和朋友们站在你们的灵前纪念你们。现在我先和你们谈谈心里话：

刘仁同志，您是我1938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敬爱的师长。当年冬天我在您率领的队伍里来到敌后晋察冀边区。您一生为党的事业坚持斗争，您领导的华北地区和平津的地下城市工作有卓越的贡献，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大功。解放后您领导了北京的城市建设，为把北京建成一个伟大的首都，彭真同志和您都费尽了心血。像您这样一个

忠诚的领导干部，在妖风初起时，竟忽然变成了人民政府监狱里的囚犯，无情的手铐白天黑夜里连续锁了您五年！您的身体本来很好，却没能熬到打倒“四人帮”，在1973年含冤病逝了！有一件事您听了一定高兴。打倒“四人帮”后，在公审这四个恶棍时，您的夫人甘英同志庄严地坐在法官席上，代表人民审判他们，痛斥江青，为我们被迫害致死的干部，为我们苦受折磨的家属们伸了冤，我们大家都扬眉吐气，您如有知应当感到欣慰。

吴晗同志，您原本是一个勤于钻研的历史学家，但是，当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屠杀人民时，您和闻一多等著名教授挺身而出，在反饥饿、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您像一只猛虎，把投枪掷向敌人。您对党对人民是那样忠诚热情。您奉命写了论海瑞的文章，反倒引来了杀身之祸。听说您在监狱中，被打得胸腔里充满了鲜血，不能说话。十年浩劫中，您的全家遭遇最惨，一家四口您竟携妻带女三个人离开了人世。我和您

最后一次见面是1966年夏天在工人体育馆批斗大会开会前，在休息室里，“造反派”让我收钱和粮票去买一些干粮给咱们被称为黑帮的当午饭，我走到您的面前，您仍然是那样忠厚老诚，满面愁容，始终没有抬起头，您大概不知道是我接过您的钱。您死得冤哪！大概您直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海瑞罢官”的要害究竟在哪里！

沫沙同志，北京刚一解放，您直接领导我在广播电台的宣传工作，您对下级总是那么平易近人，但工作上要求十分严格，绝不能马虎一点。在浩劫中，您吃尽了苦头，被打掉了满口牙齿，但是您凭着过去长期地下工作的经验，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非常坚强机智地和看管人员斗争，您通过在狱中写检查和敌人斗，现在，您的狱中诗文出版了，被读者称颂为当代奇文。您有幸看到了“四人帮”倒台，您参加了

① 云特，是邓拓的别名。



邓拓

对“四人帮”的公审，在证人席上，拍案痛斥江青，为我们受迫害的广大干部和家属出了气。您活得潇洒，走得潇洒，您活到83岁溘然病故，最后又用您的骨灰在长城岭畔培育了一棵常青树，您的精神永存，生命永存。

亲爱的云特，我们离别30年了。你竭尽全力为党工作了大半生，没想到浩劫初期就被称为反党集团的主帅，对你进行全国规模的口诛笔伐。北京市委的许多同志关心你，刘仁同志，天翔同志在乌云压顶的形势下到家里来看你，安慰你，劝你正确对待群众的批判斗争，做好检查，将来还是党的文化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很多好心的同志劝我，让我关心照顾你，准备做好检查，我没有



吴晗

实现他们的嘱托。我能劝你什么呢？让你承认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不能。让你承认是被他们诬告的“叛徒”吗？不能。让你和当时的批判斗争进行抵制吗？也不能。真是无路可走啊！看到你苍白的面孔，坍塌的脸颊，茶饭难咽的情况，我忍不住暗暗落泪，真是爱莫能助！我们彼此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在有人监视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只好是相对无言。5月16日咱们在卧室的走道里抱头痛哭，你说让我和孩子们第二天就离开你，我说不可能，我无处投奔。没想到5月17日深夜，也就是5月18日凌晨，你就匆匆地永远离开了我们。你告诉淑彬姐说，你是“冤沉大海”啊！最后你给党组织留下了六千多字的遗书，有力地驳斥了康生、江



廖沫沙

青一伙对你的诬告。你本想离开我和孩子们，就能使我们得到解脱，哪知道在十年浩劫中我们受尽了歧视和折磨。好在，你的一岚和孩子们都坚强地、胸怀坦荡地挺过来了。

党组织为你平反后，我和孩子们集中力量做了几件事，通过各种方式为你平反正名，出版了多种书籍、文集、诗集、书法选、藏画集等等，请很多同志写了纪念文章，写了传记。你逝世20周年时，在故乡福州召开了你的学术思想座谈会和纪念诗会；在你80岁诞辰时，福州市委协助我们恢复了你的故居，建立了邓拓纪念馆。

云特，我竭尽全力地做了这些事，目的只有一个：1966年“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们，颠倒黑白，把一切污泥浊水泼在你和吴晗、沫沙同志身上，我要为你们洗刷干净！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了解，所谓“三家村”的三个人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你是个杰出的有才干的清醒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的政论和杂文作家、历史学家，有胆有识，与邪恶之风进行斗争。你的才华是卓越的，骨气是高洁的。现在，海内外许许多多人赞扬你的骨气和才华。

应该做的事我都尽力做了。

云特，我们的孩子都是很正直、勤劳和善良的，他们不愧是你的后代。我今年已经75岁了，又身染重病，不会太久我们就要相会了。

最后，向你们四位致以深深的悼念和敬意！



1996年5月17日，丁一岚挥泪读祭文（健民摄）

错误开除刘少奇党籍时 陈少敏唯一反对票的 是非毁誉

● 耿一民

陈少敏，这位被人誉为“杰出女性”的人，在“文革”结束后的20年内，不断见诸报端；近十年内，已有三本关于她的传记出版，最少有两部以她为主人公的电视剧问世。

陈少敏之所以为舆论关注，并引起一些学者研究的浓厚兴趣，不仅因为她有“痛打日本浪人”、“扮‘贤妻’护徐老赴湘”、“飞马比武退群匪”、“夜袭鬼子巡逻车”等传奇经历，也不仅因为她是主持过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和为维护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权益呕心沥血的一名工会领袖，更为重要的是，她作为一名中共中央委员，在“文革”中坚持真理，不畏强暴，与“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在决定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投下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

因为这一票，她遭到了完全可以预料的来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迫害；因为这一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她竟然还受到了来自某一个高级领导同志的冷遇；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票，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人的赞许。陈少敏“唯一一票”的几十年的是非毁誉，留给世人的是历史的思考和启迪。

于无声处听惊雷

“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在全面夺权实现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于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全会是在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在此之前的7月21日，康生曾亲自写过一封绝密信给江青，送去了江青索要的一份名单。在这份

名单里，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达到总数的71%。中共“八大”选出的97名中央委员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的10人外，只有40人被允许参加十二中全会。为凑够法定人数（超过中央委员的半数），以便能够通过决议，到了开幕的那天，才从被许可出席全会的候补中央委员中挑出10人，增补为中央委员。

在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133人中，仅有59人是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其余的74人则是中

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会后发现来自地方革命委员会的一个与会者，竟然并不是共产党员。

陈少敏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出席这次会议，同胡耀邦和候补中央委员李志民、范文澜等同志一样，是在被“打倒”的状态中临时解放出来的。

陈少敏出席会议的通知发到全国总工会后，立即被当时把持“全总”权力的负责人扣下，说陈少敏是

“黑帮分子”，不准出席中央的会议。最终还是在周总理干预之下，由中央办公厅派车把陈少敏拉走的。

会议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进行。

开场锣鼓并非会议的正式议题，而是有预谋地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分组围攻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江青在10月17日第一小组会上，诬陷谭震林是“叛徒”，诬陷叶剑英、徐向前“乱党乱军”、“要夺军权”。10月26日林彪在全会上讲话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10月28日康生在第四小组会上说：“‘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会上，林彪、江青、康生还组织对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等同志的围攻，鼓噪开除邓小平党籍，给会议制造紧张气氛，向与会者施加压力。

全会将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操纵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交付代表“讨论”。历史资料表明，在此之前的9月16日，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送的三大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行材料上，就有了江青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的批语；29日林彪在上面批道：“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绩的江青同志致敬！”

对于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这些诬陷，刚直不阿又深知刘少奇为人的陈少敏，当然不会买账。1966年8月初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在刘少奇被“炮打”，被陈伯达宣布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代表”之后，陈少敏即在会议休息室，当着众人的面，以汇报工作为名，主动与刘少奇同志攀谈，以示同情和慰问。过后，有

一次“全总”造反派逼着陈少敏去看大字报，有张大字报诬称陈少敏与李先念是刘少奇的黑干将，诬陷陈少敏、郑位三等组织1946年中原突围的同志是“叛徒集团”。陈少敏旁若无人地大声嘲弄说：“不懂历史，信口雌黄！”1968年春，陈少敏在三〇一医院住院，王震、李贞看望她时，谈及“文化大革命”，她十分率直地说：“党内有些家伙总是要整人，刘少奇有什么问题要这样整？”

此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陈少敏所在的小组会上，她又为刘少奇的问题遭受围攻。陈少敏怒火中烧，满怀愤懑，以沉默抗争。康生责问：“陈少敏，你为什么不要表态，不说话？”陈少敏说：“身体不舒服。”康生勃然大怒：“不舒服就请假出去！”

小组会情况几次登上《简报》。10月23日的《简报》中说：“陈（少

敏）至今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报告没有明确态度，她今天在会上作了个很不像样子的所谓检查……”一些人对她提出了严肃批评，说她没有同刘（少奇）划清界线……”24日的《简报》中又说：“小组同志对陈少敏今天的发言东扯西拉、对审查报告始终不表示明确态度，两次提出批评，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堕落到惊人的地步，一个农村老太婆的政治觉悟比她高得多。”

全会就是这样在正直的共产党人无法表达自己真正意愿的情况下，讨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的所谓刘少奇“罪行”报告的。全会的最后一天，即1968年10月31日，在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时，陈少敏不愿看到这耻辱的一刻，她紧闭双眼，不发一



战斗在鄂中时的陈少敏
(史沫特莱摄于1940年)

言,更不肯举起自己的手……于无声处听惊雷,陈少敏终于以这样的方式,投下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唯一的一张反对票。

劫难中的期待

陈少敏,这位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入党,一生历经磨难,富有斗争经验的坚强女性,当然知道自己投下这“唯一一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会议归来的那天晚上,她无论如何不能入睡。她不为自己的荣辱和生死担忧,惦念的是自己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这个国家和这个党:堂堂的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就这样轻率地被免职了、开除了……是非颠倒,人妖颠倒,真理与谎言的颠倒,带给她内心的折磨、痛楚和悲哀,使她想起30年代初那最难度的日子。巾帼英雄泪不轻弹,然而此刻她哭了,在大哭一场之后,她抚摩着丈夫任国桢那尊瓷像,心情才慢慢趋于平静。

那瓷像是她为纪念牺牲的丈夫在江西景德镇特制的。她与他虽已永别37年,但她忘不了他的音容笑貌,忘不了他的帮助和教诲,忘不了他在对敌斗争中的机智和坚毅,也忘不了他在受到“左”倾路线领导人排斥时的顾全大局和忍辱负重。

同她作为夫妻一起生活仅仅20个月的任国桢,在1930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不久,即被撤职派往唐山搞工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以河北省特派员身份赴山西建立抗日武装。然而他刚到太原便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11月13日被枪杀在太原小东门外。任国桢在牢房墙壁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饮弹从容向天笑,长留浩气在人间。”这诗句,既是写给难友的,写给党组织的,也是写给陈少敏的。陈少敏就是凭借着这种无所畏惧的革命



与群众一起劳动时的陈少敏

精神,捱过了丈夫牺牲的痛苦,捱过了女儿夭折的悲伤,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对敌斗争中,创造了无愧于先烈、无愧于人民的业绩……如今的陈少敏虽然老了,身体也垮了,然而她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和意志上的准备,再一次实践任国桢烈士的遗言,“从容”对待一切恶势力,给人间留下“浩然正气”。

陈少敏“唯一一票”招来的迫害接踵而至。

1969年4月初“九大”召开,“九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是由各地革命委员会同造反派组织头头“协商”确定或上级指定,陈少敏当然得不到这样的“殊荣”;她这位“七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八大”的中央委员,自然被排斥在“九大”中央委员之外。对于这种政治上的扼杀,陈少敏付之一笑。她一面骂康生之流卑鄙无耻,一面为自己庆幸。庆幸自己没有通过给党带来耻辱的“九大”党章时,再一次面临真理与谬误、善良与邪恶的痛苦选择。就是这个“党章”,公然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它

的总纲部分,成为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史无前例”。

此时,陈少敏的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也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中断而悄然消失,连每逢“五一”劳动节的游园票也不再给她。这个当年以“劳动神圣”为口号,领着工友们闹工运的陈少敏,如今连参加一个劳动群众集会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1969年10月,林彪借所谓“战备疏散”把大批老干部赶出北京。那时的陈少敏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且因脑溢血留下了半身不遂,只能靠轮椅行动。“全总”造反派强令她迁往河南省罗山,硬是差人把她抬上了火车。

陈少敏被监管在这个名为“五七干校”的地方,不准坐轮椅外出,未经审阅不准同外边通信;同时,她远在陕北志丹县插队的养子被告知:与陈少敏通信,不得直书其名,而写“河南省罗山县全总五七干校转一号”。

然而这个“全总”一号死不悔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在这被封闭的罗山,也没有使“全

总”的大小“造反派”及其主子有半点放心。

罗山,原是豫鄂边区的老根据地,曾是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经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村村寨寨都倾注过她的心血,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她从未忘记过这里的父老乡亲,这里的父老乡亲也从未忘记过这位被称为“陈大姐”的老领导。他们一旦得知当年曾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被蒋介石下令重金悬赏捉拿的陈少敏,眼下就在这里被秘密监管时,便以各种无法拒绝的理由和形式,纷纷前来看望。但谁能想到,当年那个站在台上举着拳头做战前动员、跨在马上挥着驳壳枪指挥冲锋的陈少敏,如今已被煎熬得面黄肌瘦、行动艰难……那些老游击队员、老农会会长、老妇女会会长,忍不住围抱着陈少敏放声大哭。有的毫无顾忌地说:“这是怎么了,把人折腾成这个样子,他们不要你,跟俺们走,俺们要你!”附近驻军的领导,不少是原来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闻讯后也纷纷驱车来到罗山,看望陈少敏这位老首长。曾作过陈少敏警卫员的李天元,此时担任信阳铁路医院的政委,在陈少敏心脏病复发,处于危急状态时,他冒着风险把她接到信阳去抢救。

在罗山,虽然陈少敏的病情有了发展,身体越来越坏,但在精神上得到了某些慰藉。她这个20年代末、30年代初长期以普通工人身份秘密领导工人运动的老资格共产党员,是最善于在日常生活中体察人心向背的。她要坚强地活下去,等待雨过天晴。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陈少敏得以回北京治病。

1972年夏天,曾任豫鄂挺进纵队二支队队长兼政委、时任空军学院院务部长的宁淮来看陈大姐。他们高兴地谈到林彪的“折戟沉沙”,

又从林彪谈到刘少奇的案子。宁淮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是全会一致通过的,陈少敏气愤地说:“一致个屁!表决时我就没有举手。”这天,恰恰是个急风暴雨的天气,她趁势对宁淮说:“现在的政治气候和刚才这天气一样,说变就变。林彪死了,党内除了一大患,可是他们的同伙还大有人在……党内还会出现狂风暴雨,你要有这个准备。什么时候都要坚持真理,不能犯软骨病。”

陈少敏虽久卧病榻,却无时不在关心着党和祖国的命运。1975年12月17日,陈少敏的养子陈卫平将在去医院途中听到的康生病逝的消息告诉她。躺在病床上的陈少敏挥了一下那只能动的拳头说:“死了活该!康生不是个好东西,他除了整人不干别的。”为了这句话,第二天“全总”政工组率人来医院,对她整整围攻了一上午,从此再次控制她的会客等活动。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陈少敏悲痛欲绝。在她最痛苦的日子里,李垠等老同志到医院看她,并说上海有人贴出大字报要张春桥当总理,陈少敏愤怒地用拳头敲打

着床头柜说:“我不同意,我不赞成,我不投他的票。”还说:“张春桥和江青、康生是一伙的,他要当了总理,国家就完了。”

形势的发展果然被陈少敏所言中,张春桥当总理的阴谋破产。几个月后,“四人帮”也垮台了。陈少敏的老部下刘毓兰得到这一消息的当晚,便去告诉陈少敏。陈少敏听了举起一只手喃喃自语:“好了,好了!”“有救了,有救了!”她无限欣慰地说:“我死而瞑目了。”

“盖棺”未必“论定”

1977年12月14日15时41分,陈少敏在北京医院溘然离世。一个多月前因疾病加重而住进医院的陈少敏,精神和情绪倒一直是较好的。她对国家充满希望,对党充满希望,对人生充满希望。无论是康克清来送泡菜,还是李先念、王震来探望,她都要摸出孙子的照片,高兴地对他们说:“我有孙子啦,还没有取大名,现在就叫胖子。”

陈少敏这次住院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医院报病危



访问莫斯科时的陈少敏(1952年)

后，华国锋和汪东兴批示“全力抢救”。陈少敏逝世后，在“全总”写给中央的报告上，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都一一“圈阅”。李先念还在报告中“请李先念副主席出席追悼会”的字句上写着：“我一定去。”

陈少敏非凡的一生已经结束，如何评价她的一生，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30年代曾任河南省委书记、“文革”前任华北局书记、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朱理治，连夜乘汽车赶来北京，作为熟知陈少敏的老战友，特到“全总”对悼词初稿提出修改意见。悼词在简要叙述了陈少敏的历史及其参加革命以来所任职务后，有一段准确、中肯且颇具特色的评述，就是在朱理治同志坚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支持下写成的。这段文字是：

“她为恢复和建立豫鄂边敌后党的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斗争，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是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

陈卫平是陈少敏的养子并由她抚养成人；陈卫平的妻子徐杰从1973年起就为陈少敏料理生活。这一对青年人无疑对陈少敏晚年的情感思绪，较之别人有更多的了解。他们以亲属的名义，也关注着对于陈少敏的评价。就在开追悼会的头天晚上，两位年轻人来到北京富强胡同胡耀邦同志的住所，他们问胡伯伯，为什么悼词中只谈了陈少敏同“四人帮”的斗争，却只字不提对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因为他们最清楚，陈少敏为此是付出过惨痛代价的。

那是她在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向“全总”的领导干部传达会议精神时，陈少敏难以抑制对刘少奇的同情和对林彪的不满，曾脱口而出地说：“现在谁都不要了，只要林彪了！”为此她遭到了“全总”造反



与邓颖超、蔡畅等在一起的陈少敏

派的多次围攻批斗，后又由康生批准，强行从北京医院拉到中山公园开批斗大会。陈少敏遭到百般凌辱，摁脑袋，掐脖子，扭胳膊，致使她的右肩关节脱臼。

听了陈卫平等的陈述，胡耀邦也觉得不无道理，沉吟片刻后率直地解释说：“你们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这份悼词已经中央批准，主席、副主席五位领导都批了。明天就要开追悼会，再报批也来不及了。是不是先按这份悼词宣读，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1977年12月21日，陈少敏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领导同志参加追悼会。中共中央委员、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主持追悼会，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纯古致悼词。

然而，宣布的悼词留下了历史的缺憾。那就是全国最大的冤案、仅被株连判刑的就达二万八千多人的刘少奇案，此时尚未平反，陈少敏虽已“盖棺”，她在刘少奇问题上的是与非尚不能“论定”。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如果悼词对此或“语焉不详”，或“缄口不述”，均无不可。然而

既可笑又可气的是，由于我们一些人写惯了、看惯了“八股文章”（这里姑且不说是由于说惯了、听惯了假话），悼词中竟出现了全然不顾事实、是非颠倒了的一段话，将自“文革”以来，一直反对栽赃陷害刘少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置生死于不顾抵制开除刘少奇党籍的陈少敏，写成：“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她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自觉抵制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见197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这到底是对陈少敏的“褒奖”还是“诋毁”呢？此刻，九泉之下的陈少敏若有知，她一定是万万不答应的。难怪一位历史学家曾为此大发感慨：“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愜于心。”怎么大哲学家王充一千八百多年前说的这些话，现代的中国人就忘了个一干二净呢？

历史的车轮终于复归正常航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共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始了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党开始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1980年2月23日



重返大别山时的陈少敏(1962年)

至29日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恢复了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1980年4月,即刘少奇平反两个月、陈少敏辞世两年四个月后,全国总工会党组为陈少敏政治历史作出复查结论。结论说,1946年“中原突围”前,陈少敏、郑位三等以组织名义作出的关于干部应变的几项决定,“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作出的”;解放后,陈少敏在总工会工作期间“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是有成绩的”。1971年6月8日“全总”军代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陈少敏“在中原工作期间执行过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犯有严重丧失政治立场的错误”,说陈少敏“在工会工作中积极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工运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均属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至此,应该说“文革”期间泼在陈少敏身上的污水已经涤去。然而,“文革”之后的另一种不实之词,如陈少敏悼词中被糊里糊涂加进去的所谓“自觉抵制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云云,却一直保留着。直到

1983年清明节,王光美去扫墓时在陈少敏骨灰盒外罩的生平简介中发现,回到家便给“全总”打电话,让他们去人做了技术处理。去年王光美还在电话里跟陈少敏的养子提及此事,并说:“你们应该经常去看看,不然骨灰盒上会落土的。”

掩不住的历史事实

历史恢复了陈少敏的本来面目,但是还没有被置于应有的历史地位。典型一例,即陈少敏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唯一一票”,其事实尚未公布,其作用和影响未予肯定。

“唯一一票”,不仅是陈少敏一生最辉煌的一瞬,更是共产党的宗旨和真正共产党人品格、节操的集中体现。陈少敏的“唯一一票”不是偶然的。

“横戈原不为封侯”。1949年3月,陈少敏出席了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面临全国解放,各地、各部门大量需要干部的时候,陈少敏这位在党、政、军、群各部门都曾主持过工作,并被称之为在中国共产党中“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

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却就其今后的工作安排,向党作了如下自荐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写信给少奇、恩来说:“关于工作,在什么地方,和谁一起工作都无意见。但在工作部门上,有个要求。我做不了专门的妇女工作,因为我没有那个耐性;我不适合组织部的工作,因为我粗心,对干部的方法太简单,对落后的要求,一点也不能让步,最容易惹得干部不满意。我的毛病你们是知道的,最好分配我去做工人或农民工作(从一个工厂或一个农村生产合作社做起)。最理想的是叫我到一个工厂去,以工人工作为主联系其他工作,一气儿作上三年、五年,搞出一套经验来。”

周恩来将陈少敏的信批转给负责组织工作的安子文,并在与刘少奇同志商量后,决定派她去全国总工会。当时主持“全总”全面工作的李立三,安排她负责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的筹建。

陈少敏高兴之极。她一头扎到了基层,深入工人群众,切实解决工人困难,为捍卫工人利益仗义执言,奋斗不懈。她在青岛处理中纺四厂罢工事件,力主把受谣言迷惑带头闹事的人放了,细致耐心地做重点人的工作;在中纺六厂她见旧社会的“搜身制”依然存在,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说服大家,作出了废除搜身制的决定;她听说东北用“自建公助”的办法解决工人住房问题有成效,经实地考察,她写信给负责国家计划工作的李富春,在得到政府支持后,迅速在青岛、上海、天津和东北等地推广。为了捍卫工人的切身利益,她作为委员或代表,在出席党的中央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和妇联的会议时,总是代表工人群众大声疾呼,有时甚至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坦言晋谏。她在给刘少奇、陈云、李立三的一个关于改善劳动保护条件、扩大生活福利设施的报告

中, 特别强调: “政治动员要有一定的物质保障, 否则, 职工的热情是不会持久的。”当陈少敏了解到工人对劳动保险条例迟迟不能公布很有意见时, 她立即写报告给李立三并转呈毛泽东和刘少奇。报告中很有肝火地说: “费了一年的工夫, 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草案, 群众眼巴巴地等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 至今仍不公布。……生产长一寸, 福利长一分, 这个要求并不高。工人群众不仅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并且不断进行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 政府也应随时照顾工人生活, 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上感到政府是自己的。”她认为这些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具体问题之所以没有迅速解决, “是工人阶级观点薄弱的具体表现”。她在报告中甚至气愤地说: “去年一年中, 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 狗皮膏药被我们卖光了, 如果再不解决问题, 只好卖西北风了。这个不要成本。”

真个是无私无畏! 从陈少敏 50 年代初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甚至可以说是个人安危), 无私无畏反映群众呼声、捍卫群众利益的精神, 完全可以看出她 60 年代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投“唯一一票”时的影子: 其语言铿锵, 其铁骨铮铮。

陈少敏“唯一一票”的披露始于胡耀邦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次党的会议上, 谈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时, 高度评价了陈少敏在刘少奇问题上, 坚持真理, 坚持原则, 称她投下了“了不起的一票”; 同时坦诚地对自己当时违心地举手表示自责。

1980 年 4 月, 全国总工会党组在写给中央的《关于陈少敏同志的复查报告》中承认: “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时, 陈少敏同志不表态, 进行抵制, 表明陈少敏同志是一位敢于坚持原则的优秀党员。”

1981 年 1 月 1 日, 《北京晚报》

发表了王文祥题为《光荣的一票》的文章; 同年 10 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内部发行) 中记载: “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 对这个决定拒不表示同意”。

1982 年 6 月 5 日, 《解放军报》发表了宁淮所写的《回忆陈少敏大姐片段》, 文中追记了陈少敏同他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投反对票一事。

难以理解的干预

业经组织(总工会党组)证实、权威机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多家报刊(《北京晚报》、《解放军报》等)公开报道的陈少敏“唯一一

补 正

本期目录中《共产党员的正气歌——记陈少敏大姐》(第 8 页)一题应改为《方便之门不能开》作者李长群、陈昭, 并增补《请君写好教子篇》潇雨(9 页)、《万邹氏夸好崽》朱凤林、熊典达(10 页)、《湖南省邀请离休干部检查指导老干部工作》曾晋成、孙南轩(11 页)三题。谨此向作者、读者致歉。

启 事

本刊前几期已发表的文章的作者中, 有少数地址不详。请至今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赐知详细通讯地址, 以便寄奉稿酬。

票”一事, 谁能想到在粉碎“四人帮”将近八年之后, 竟又遇到了麻烦。

1984 年 7 月, 以纪希晨为总编辑的《中国老年》杂志, 在重要位置发表王子铎、马焰、李垠的文章: 《共产党人的正气歌——记陈少敏大姐》, 并曾在该刊 6 月号上发表“要目预告”。

发行数十万份的《中国老年》杂志 7 月号全部印装完成, 即将发往全国时, 负责组织并签发这篇文章的纪希晨正在山西忻县出席一个有关晋绥根据地党史的会议。这天突然接到家里打的长途电话, 说杂志社有要事让他马上回京。纪希晨回到北京才知道是这篇文章出了问题, 某位高层领导同志指示某部门责令杂志社将这篇文章撤掉, 否则不准发行。杂志社只好紧急动员工作人员, 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一

高吟颂改革 盛代祭屈原	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老年人也要关心新的技术革命	对老年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老干部的光荣职责
——记陈少敏大姐		——全国政协委员关注老年问题	——应《中国老年》而作	
王子铎等	谢希德	郑治	谭启龙	
44	8	6	4	1

右为《中国老年》杂志 1984 年第七期目录(部分)

左为被迫撤下有关陈少敏文章后发的“补正”

文从杂志中撕掉,并找来《方便之门不能开》、《请君写好教子篇》、《万邹氏夸好崽》等几篇小稿,抢排单印,补上空下来的8页至12页。目录页上的黑体字标题是抠不下来的,只好在内文中加个《补正》说:“本期目录中《共产党人的正气歌——记陈少敏大姐》一题应改为《方便之门不能开》……”这种不明不白的“说明”,这种未“开天窗”而实“开天窗”的作法,更招致了读者的猜测,来信来电弄得编辑部有口难言。最难的是对作者的交代。作者之一的李垠,抗日战争时期便在豫鄂边区工作,与陈少敏非常熟悉。这位饱经磨难的老同志,天不怕地不怕地追问总编辑纪希晨:“谁不让刊登?我去找他,问问他什么理由!”有些话纪希晨也不便讲,只好再三宽慰她,并送她几份未将该文撕毁的杂志说:“你们几位作者留作纪念吧!”

编者、作者、读者都在想: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报道失实?否!若是报道失实,只要指出失实之所在,言之凿凿,无论作者、编者,是说不出二话的,何况意见来自上级机关和高层领导。

是因为写了刘少奇?不会!刘少奇的冤案已在四年多前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平反。全会公报特别说到:“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并说:“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同样是在这次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已赫然写入了“要讲真话,言行一致”,“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等。既然如此,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唯一一票”所体现的正是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和不计个人安危“捍

卫党员民主权利”的精神,又犯了哪一条忌讳而不得宣传呢?

是否认为对陈少敏“唯一一票”的褒奖,便是对其他许多违心投票者的贬损,从而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宁肯把陈少敏的“唯一一票”尘封在档案里?人们不愿妄加推测。若果真如此,那肯定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陈少敏不惧淫威投下“唯一一票”是伟大的;胡耀邦不无自责地将陈少敏“唯一一票”公诸于世,丝毫不损其伟大;至于那些当时痛忍屈辱,韬晦俟奋,尔后得以兵不血刃,把“四人帮”收拾了个痛快老师傅们,历史已经记下了他们的丰功伟绩。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一段极为复杂的历史,这一历史阶段的斗争,具有历史罕见的复杂性。那时,党纪国法荡然无存,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完全颠倒。党的领袖的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林彪、江青之辈既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集团元凶,当时又在党内占据着合法的领导地位。他们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吊民伐罪”,借刀杀人,而使自己的双手不沾血迹。在“文革”这一历史过程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并且被罩着种种神圣而虚幻的光环的情况下,在等待历史的转机 and 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中,共产党人也面临着特殊的选择。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共产党人之间出现不同的选择,出现不同的特殊的斗争方式,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英国作家韩素音,写过一篇《从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的文章,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她在文章中说:“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残存的中央委员会对刘(少奇)的‘罪行资料’进行研究。会上指定周恩来主持讨论特别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同时周主持

了对刘的问题作出决定的会议。在付诸表决的时候,周像其他在场的人一样,投票反对刘少奇。唯一例外的是一位勇敢的妇女,她的名字叫陈少敏。”

接着韩素音提出问题说:“周恩来能不能拒不投票?如果他要投票反对开除刘,对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韩素音继而写道:“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24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

对于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的处境和贡献,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有亲身感受的。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住了相当一批人。”陈云说:“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叶剑英说:“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李先念说:“他如同‘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减少政治损失,维持经济生活,保护广大干部,支持正义群众,改善对外关系,等等。”

大河毕竟东流去

历史是可以理解的,陈少敏“唯一一票”的历史功绩是抹杀不掉的,无端干预是错误的。

1985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一书在谈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说:“与会的中央委员陈少敏在表决时拒不举手赞成。”

1986年12月,以温济泽为总编辑的《中华英烈》,全文发表两年多以前《中国老年》杂志被责令撤下来的王子铎、马焰、李垠的文章,题目改为《了不起的一票——陈少敏大姐在“文革”中》,以胡耀邦的话直接点明主题。

此后,在1987年4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增补修订本,1991年8月出版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4年6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典》等书,在写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均记载了陈少敏对开除刘少奇出党拒不举手一事。

在传记文学著作中,1990年12月出版的李树高、曹伦甫合著的《陈少敏》一书和1993年12月出版的张李文、陈承模合著的《杰出女性陈少敏》一书中,都较详细地反映了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同林彪、江青等恶势力的斗争。

陈少敏的“唯一一票”,如今不仅堂而皇之地见诸“经传”,而且有了很好的口碑。

著名作家萧乾在《更重大的贡献》一文中称赞巴金“向读者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自我揭发和自我否定,从而用亲身实践来提倡说真话”时,说到不讲假话之难,列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例子,尔后他动情地说:“当时有

一位陈少敏同志,她拒绝举手——也就是拒绝说假话。她确实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一个令人钦敬、值得载入史册的一员”。1995年4月《工人日报》发表署名哥舒的一篇短文,称赞陈少敏的“唯一一票”是“一举惊天下”,并说:“在那段被扭曲了的历史中,真正闪光的东西将如血与火一般更加鲜明。”

巴金很赞赏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

陈少敏,就是一个真正的丹柯式的勇士。中国共产党需要陈少敏这样的人,中国人民需要陈少敏这样的人,时代需要陈少敏这样的人。我们相信,陈少敏的光辉将与日俱增。

(责任编辑 洛松)

彭总和甘泗淇行军路上的

一次趣谈

● 陈辛火

1949年8月26日,西北第二大城市兰州解放后,我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于硝烟仍在、征尘未拂之时,又继续西进了。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奉命挥师经青海门源,跨越祁连山到达甘肃张掖,急速向新疆挺进。当时彭总(彭德怀)和甘泗淇同志一起,从兰州乘坐吉普车沿兰新公路送王震同志暨第一兵团到达嘉峪关。在河西走廊,车行在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见不到一户人家。可是从兰州起,直到嘉峪关,一路上道路两旁却有延绵不绝的粗大的杨柳树。

有一天,运送一兵团指战员的汽车队正在嘉峪关附近歇中午,大家坐在道旁吃干粮,甘泗淇同志下车后和同车的干部聊天,他问道:“这一路人烟稀少,气候异常,车行千里,道路两旁连绵不断的杨柳树,你们知道那是谁栽的?”周围的人被问得一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甘泗淇同志兴冲冲地对周围的同志讲:“那是清朝陕甘总

督左宗棠进军新疆时栽下的。唐诗上不是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吗?当年左宗棠西征时,看到甘肃境内许多地方童山秃岭,赤地千里,便下令湘军沿途栽种杨柳树。到了1879年左宗棠的老部下、湘阴同乡杨昌浚,应左宗棠的邀请去新疆,他在一路之上,看到柳阴匝地,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些杨柳树也就是后来人们经常称道的‘左公柳’。”讲罢,乐呵呵地自己笑了起来。

正在此时,彭总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我们中间,突然插话问道:“那首唐诗是谁写的,哪位同志能把全诗背得出来?”甘泗淇同志很快走近彭总,用两只含笑的眼睛环顾四周。顿时在随行人员中有位同志开口答道:“这首诗是盛唐时代名重一时的边塞诗人王之涣写的《凉州词》,《唐诗三百首》卷八中题为《出塞》,全诗四句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彭总听后,和蔼地要这位同志把王之涣和杨昌浚的诗再背一遍,然后沉思片刻,说道:“我觉得王之涣不朽的诗句,表现了他对祖国大西北自然风光的爱,但也有一点哀怨的情调;而杨昌浚歌颂左宗棠的‘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诗句,具有改天换地的气概。”说得大家都笑了。

(责任编辑 洛松)



李德在中国的唯一一张照片

“太上皇” 洋顾问 李德 离开中国 之后

● 卢弘

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太上皇”的李德，在遵义会议上被赶下了台，作为“局外人”随军长征到达陕北，从事了一段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于1939年夏奉命返回苏联，他的命运际遇又发生了如下重大变化。

1 李德乘着苏联飞机从迪化（今乌鲁木齐）起飞径直向西北飞时，随着与苏联国土的距离越来越近，他的心底却升起一种越来越沉重的失落感和令人难堪的被抛弃、被驱逐感。他离开延安时是那样地毫无准备和仓皇失措，又是那样地很不想走却不得不走，他深感无颜重见“江东父老”却非见不可，飞机已经飞临世界“红都”莫斯科上空了。当飞机在莫斯科机场徐徐降落，终于着陆时，李德的

心却反而一下悬到了半空中，他不知道也不敢想在莫斯科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人们将会怎样对待他？

“李特罗夫同志，李特罗夫！”

直到有人拽着李德的胳膊，他才惊觉过来，只见是一位中国同志。

“怎么，认不出了，我是师哲。”

李德终于想起，这是位20年代就来苏联的中国同志，他们早就相识，只听师哲说：“我现在在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今天来接周恩来等同志，恩来同志说，你也同机回来了，让我来看看你，如果没有别人来接你，就把你先接到我们那儿去。”

李德才意识到，刚才听到有人叫“李特罗夫”（李德曾用名），原来就是在叫自己。

师哲说周恩来他们被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接到他那去了，让李

德这就跟他去，到他的住处吃了饭再说。

李德跟到了师哲住处，只见他把罩在桌上的报纸一揭，推过一盘切好的面包和一盘现成的菜，说道：

“来，请用饭，我再来热一个汤。”

李德本来就毫无胃口，一见这饭菜，没吃就“饱”了，对主人嘟囔道：“连你也对我这样子，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就这样来接待我！”

师哲连忙说：“你多心了，我实在是在没有准备，只好委屈你一下，先用这家常便饭招待你，凑合着吃点儿，另找机会再请你。”

李德勉强吃了几口，只觉莫斯科的面包远没有延安的小米饭香，见师哲吃完抽起烟来，自己也抽出一支，还按中国习惯，要去同师哲烟

头接烟头地对火，师哲却缩回自己的烟头，另行划着一根火柴给他点火，李德把烟卷一扔生气地说：

“你看你，连抽烟都不肯同我对火，还不是对我有看法，要同我划清界限！”

师哲笑道：“你这是怎么啦？想到哪儿去了，我干嘛要同你划清界限？”

李德颓丧地说：“你哪能不知道？都说我在中国犯了错误，为国际闯了大祸，从国际去的人都回避我，不理我。你也是这样，不愿沾我，你们为什么对我这样，难道我真干了坏事，是个反革命吗？”

师哲只得尽量安抚他，作了解释，安排他休息一下，赶紧去向周恩来、任弼时报告，又按他们的指示把李德送到国际执委会机关，由他们负责接待了。

正如李德所预感的，莫斯科等待他的并不是温暖和温馨的情谊，而是严肃甚至严酷的审查。他曾回忆道：

到达莫斯科之后，好几周我忙于回答问题、写报告、写补充说明。我感到很不舒服，起初我把这整个程序视为讨厌的例行公事，因为我毕竟有七年半离开了，对这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当然应该循问而答。但不久我注意到，这背面隐藏着更多的东西。

这“隐藏”着的东西是什么呢？李德竟说那是什么“毛（泽东）要在精神和肉体上把我消灭的意图”。这真是太可怕了，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已近90高龄的师哲老人后来才解开这个谜，原来这些事都出于李德自己的丰富想象力，他所虚构出来的“恐怖神话”，虽说事出有因，却也由来简单。

负责对李德进行审查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他们根据中共中央陆续送来的文件报告、情况汇报和李德自己写的检讨材料等等，决定先开会让李德作一次全面

的检查交代，再组织对他的批判质询，然后讨论处理。国际监委要求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以及正在莫斯科的较了解李德情况的中国同志都去参加会议，希望他们到会上多多发言，展开对李德的批评斗争。周恩来、任弼时和师哲，以及已在莫斯科的原中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等都被通知到会，当时在李德的母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曾在国内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的原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也被找来参加会议。刘亚楼来时有人对他说，你们在苏区和长征中吃过李德不少苦，了解情况多，开会时要多放几炮，狠狠地攻一攻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顾问大人”，为当年受过他气的同志出口气。刘亚楼说，遵义会议批李德时，他级别不够参加不上，这次正好是个机会，把李德干的那些胡来瞎指挥的混账事，都给他抖露出来。

开会以后，李德先做了检查，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了错误，内容与他在延安写的检讨报告大体一样，情绪和语气都很沉重。所以在中国党内几十年来所说的李德如何始终坚持错误甚至死不悔改，其实与事实并不相符，李德确曾认真做过检讨。李德在延安时和到莫斯科后的检查，至少在态度上还是真诚的，这既有他的检讨报告为“物证”，又有国际监委那次会议的参加者为“人证”。当年他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抵触情绪，是思想上还没转过弯来，属于认识问题。至于以后特别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完全推翻以至根本否认自己作过检讨，反而倒打一耙大肆攻击毛泽东等中国党领导人，又是另一回事。还是回到国际监委召开的对李德的批评会上来。

会议开始，李德不由紧张起来，他见“周恩来坐在一旁像是‘原告’”。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也在场。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同几位国际执委和监委领导人坐在一起。第

一个发言的是刘亚楼。李德在中国多次见过他，苏区反“围剿”中几个大仗苦仗，特别是过湘江的那场血战，就是刘亚楼那个部队打的。因此，他对李德意见最多，火气最大，几次相见时刘亚楼都是对李德怒目而视。刘亚楼扯着嗓门说：“你这个军事顾问，到底懂多点军事？除了把课堂上教材上的东西生搬硬套过去，还会什么？”他说了李德瞎指挥的几个例子后，接着批判道：“你自己并没有带过兵，打过仗，更没有指挥过大战役和大兵团作战，什么经验和能耐都没有，又不听有经验的，例如毛泽东等同志的意见，还偏要逞能胡来耍威风，结果呢，在湘江边上你自己也看到了，我们损失多大，多少同志牺牲，血流成河啊！可你自己不知过，还拿别人撒气，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动不动就骂人训人，连我们的朱总司令你也敢骂。”

李德狼狈地说：“我忘记了，我印象中，并没有骂过朱德同志。”

刘亚楼道：“你是不敢认账。”他又对大家道：“他居然骂我们总司令，是‘老油子’。”

李德连忙申辩道：“不，我说的是‘老头子’，因为我的中国话发音不准，被人听错了，我并不是骂人。”

刘亚楼却毫不妥协地说：“你不是说你忘了吗？你以为说‘老头子’就没事啦？我们的总司令是德高望重的红军领袖，谁都拥护他，爱戴他。你倒好，说他是‘老头子’，你也太放肆了……”

会场上有的苏联同志听了不以为然地议论道：“骂人算什么路线问题？说这些事有什么意义？”有两个从德国来的同志道：“说‘老头子’也不算骂人么，听说朱德本来就年纪不小了，说他老有什么不可以？”还有人：“作战指挥时，骂人是常事，这算不了什么错误！”人们对刘亚楼的发言都不太支持。

任弼时听了，忙与周恩来商量。周恩来站起来说，刘亚楼的发言比

较激动,这是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在李德指挥下伤亡太大,说起来就有气,希望大家谅解。他接着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决策,都有严重错误。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能及时批评抵制,对造成错误同样负有责任。他发言后,有几个中国同志也批评了李德。毛泽民发言时,李德又紧张起来。

毛泽民说,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长征以后,红军在中国南方的各个革命根据地相继丢失,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也一一遭到破坏,上百万的人民群众和革命同志受到迫害、牺牲和流散;原来全国已有三十来万红军,长征以后只剩了几万人,一下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当时全国党员也有三十来万,后来也只剩了几万人,同样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两个全部:全部南方根据地,全部白区地下党;两个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的红军,百分之九十的党员,都因为当时中央的错误被葬送和丧失了。毛泽民痛心地说:“李德同志,当时你是中央的‘太上皇’,大事小事全得由你说了算,别人再好的建议你也不听,结果造成了两个‘全部’和两个‘百分之九十’的巨大损失,虽然不能由你一个人负责,你就不感到痛心和有罪吗?”他最后建议国际监委一定要从严处理李德的问题。

毛泽民等人发言时,李德的脸都发白了。正好主持会的国际监委主席佛罗林也是德国来的,会间休息时问李德为什么这样紧张,李德忙用德国话对佛罗林说:

“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清楚,我一开始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

只是个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佛罗林同志,我可是忠于党和国际路线的啊……”

佛罗林对他摇摇头道:“没那么严重,也不必紧张。”在接下去的会上,他让苏联和德国的其他莅会者发言。人们大都批评李德自以为是,不懂装懂,不会尊重和团结别人,很少指出是路线方针上的错误,似乎主要是个人思想作风问题,只要他好好接受经验教训就行。李德听了这些发言,情绪才慢慢缓下来。已经出过气的中国同志,也无意再制造紧张气氛。在国际监委征求了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国领导同志意见并与国际执委会商讨请示后,作出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师哲老人对此回忆道:

国际监委佛罗林主席负责处理此事,他是德国人。共产国际是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对李德进行审查的。刘亚楼等出场作证。

国际给李德作的结论是,有错误,免于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于处分。从此,国际不再重用李德,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

至此,李德完全回归为李特罗夫或奥托·布劳恩(李德原名)了。他在中国的全部活动及其业绩,总算有了比他预想好得多的简直是喜出望外的结论和结果。在一个时期内,他除了在中国党和军队的老同志记忆中还存在着或出现过之外,在许多的有关文件文章中,已尽量抹去他的名字,力图消除他的阴影。哪知他的中国情结并未就此了结,

几十年后李德自己不仅忽然翻开老账,全力为自己翻案,并将矛头直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他的中国情结是了犹未了又打上了新结。

3

可以这么说,李德在中国的几年,既使他登上了一生的辉煌顶峰,又使他跌下了自己命运的低谷。他于1939年回到苏联以后,其生活道路就不再那么大起大落,共产国际对李德的处理决定被及时执行了,他不太情愿地被迫离开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的光荣岗位与热门单位,他曾不无遗憾地说:

“我不得不放弃战士的生涯,而且多年来不能再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了。有人还劝我,让我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我严格遵守了保持沉默的规定。”又说:“在苏联,我的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什么限制,或者受到什么报复。相反,我平静地生活和工作在莫斯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我还担任了负责的政治工作。”

有资料表明:恢复奥托·布劳恩原名的李德“转业”后,开始被分配到苏联的外国文出版社工作,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从德文译为俄文,将列宁、斯大林原著从俄文译为德文的工作,也算是业务归口、人尽其“才”了。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李德被抽调去战俘营做管理教育工作。据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季托夫说,李德曾以“渊博的学识和有说服力的、不容置疑的论据,对被俘德军的军官、将领们产生很大的影响。许多原来的德国战俘都很感谢布劳恩,因为他治愈了他们的纳粹病。”季托夫说他又曾成为“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苏联反法西斯中心学校的德国学员都很熟悉并敬重这位学识渊博的布劳恩教授”。

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归本行,重新去文学出版社工作,又成为“一位出色的政治、文学作品的翻译家”。新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苏联长篇小说

《收获》、《茹尔宾的一家》、《阿尔泰到山里去》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著名文学作品，都由他一一译成德文，为其本国同胞输送去整批的俄罗斯味的精神食粮。上述那位苏联学者说，“他的译著在苏联和德国均受到读者的喜爱；苏联作家协会接受他为会员，并被推选参加翻译部执行局的工作”。李德搞了多年军事和政治，没能进司令部或政治局，如今改行成为作家，倒也歪打正着，他自然干得更起劲了。

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后，苏联政治舞台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德又是很不情愿地被迫离开了他一直效忠效劳的苏维埃联邦，回到他阔别26年的德意志祖国。由于他的革命经历、资历及其“学历”，他成为并未统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实即德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据说还是一位负责人，曾作为“德文版的列宁著作的责任编辑”，“在用马列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方面，特别是培养社会科学工作者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除了编书、译书外，自己也写作并发表了一些文章，主要有《关于出版德文列宁著作问题》、《列宁与军事科学》、《列宁著作〈战争与革命〉的序言和注释》、《军事专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百科全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问题》、《自由与社会主义问题》等等。

这位布劳恩教授也许确是多才多艺，他由中国回到苏联改行搞文学翻译和政治教育后，获得了苏联勋章，当上了苏联作家，回德国后又按捺不住自己活跃的文学细胞，苏联“解冻文学”代表作《一个人的遭遇》等文学名著又由他译为德文，还发表了《关于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等论文。在60年代初期，由于他“是第一个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传播苏联文学的人”，“他在许多领域

里增进了东德人民和苏联人民间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合作关系”，当了东德的作家协会第一书记，成为他一生中仅次于在中国当“太上皇”的又一事业高峰。

由此倒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当年玩“枪杆子”，结果失了手，后来改抓“笔杆子”反而倒成了功。这说明李德此人原来就不是抓“枪杆子”的材料，至多只是个拿“笔杆子”的“一把手”。30年代初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度把他当作会念马列主义军事“真经”的“外来和尚”，结果反而暴露了他只是个“歪嘴和尚”，把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经”全给念“歪”了，以致把中国党和红军念得几乎“大劫难逃”，险乎“不得超生”。当时之所以“引进”此人并委以重任，是主管此事的“共产国际”或中共中央用人不当乱点了“鸳鸯谱”，还是他自己缺乏“自知之明”只想来过“洋钦差”和“太上皇”的瘾，才露了自己的“馅”又坏了（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以至（共产）国际的伟大事业，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看来值得探究。

4 如果这位布劳恩教授兼东德“第一”作家，从此安心于文学之道，中国人民特别是红军老战士和延安的老同志，也许会把他当作曾经同甘共苦过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长征战友和国际友人来怀念和看待，甚至会在他也曾为之出过力的新中国接待他。哪知这位早已下台的“国际顾问”忽然又重操旧业，重新“顾问”起“国际”事务首先是中国问题来了。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他不再遵守他已遵守二十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规定”，开始大讲而特讲其关于中国的事，特别是许多世所罕闻的属于党和国家及国际机密的事，并且对已经成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袖的毛泽东点名口诛笔伐。他于1964年5月27日，在作为德国党主要喉舌的中央机关报《新德

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署名文章，标题就是：

《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

其中说“30年代，我在中国经历了大部分反帝民族解放斗争。那时我受中共中央邀请做军事顾问，我参加了中国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我还参加了华南的战斗和神话般的长征，并在延安的军事学院任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年代里，我支持过中共领导基本正确的政策。我竭尽全力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为在中国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前提而斗争。正是为了这些理想的实现，我反对中国的领导政策。我要问：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谁把权力交给中共领导人的，使他们脱离党和人民，高高在上？他们为什么以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指导思想，拒绝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经验？”

这个当年在中国玩“枪杆子”没玩儿转的“洋钦差”，忽然间用“笔杆子”对中国党及其领袖以至领导政策，公开宣战了！

同一天的同一份《新德意志报》上，又发表了该报记者对这位作者的访问记，标题也很引人注目：

《奥托·布劳恩——一位参加过（中国）“长征”的人》

文中介绍并颂扬他“年轻、有活力，这位63岁的老人饱经风霜的经历使他越活越年轻”，又说“他曾多年生活在莫斯科，后来又生活在远东。在那里，他克服了艰难险阻来到中国人民军队中，并随同这支军队一起长征。直到今天，当谈到中国的那些战士时，他依然怀着崇敬的心情。例如，他曾高兴地回忆起，中国战士如何在一次令人敬佩的行动中胜利地通过了泸定铁索桥……”

李德在德国对中国党发出这“第一枪”后，接二连三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从历史往事到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揭发”和“深入

批判”，其代表作是1969年在东德的又一机关刊物《地平线》周刊的第23期到第28期上连续发表的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随后又对其作了大量补充修订和加工，于1973年正式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纪事（1932—1939）》。

推出此书的东德国家“迪茨”出版社在其前言中称作者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度过了七年多充满战斗的生涯，他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先后在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华南中央苏区、长征途中和华北解放区工作过，“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

此书很快在苏联等国家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发行。

于是当时已过古稀之年，曾叫李德的布劳恩教授，忽然枯木发芽、老树开花似地成了新闻媒介、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政治斗争舞台上冒出一颗年迈“新星”。

但是这颗“新星”转瞬即逝。其大作问世才一年，他忽然病逝。1974年8月16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讣告。宣布奥托·布劳恩同志于1974年8月15日逝世，终年73岁。

8月22日下午3时，在柏林苗圃路火葬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一位书记和苏联驻德大使馆代办等出席。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布鲁瑙·马洛夫在悼词中说：

“奥托·布劳恩这位热情的国际主义者和为和平与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不论是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上，还是在德共机关；不论是作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在完成共产国际交给的重大任务中，还是作为宣传员、教师、列宁著作的翻译家，在他整个一生的各个阶段，他都无私地为党服务。”

5

然而正如中国俗语所说的“阴魂不散”一样，李德本人虽已“仙逝”，而其“未竟事业”尚存，他那本《中国纪事》，由于其从头至尾猛烈抨击了中国党及其领导人，当然引起了中国有关方面的注意。70年代末《中国纪事》也被引进中国，1980年即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作为只“供内部参考”的秘密资料由一个自称为“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单位印发出来。

由于全书充满了对中国党的攻击和污蔑，我国有关方面为了防止扩散以致产生不良影响，便由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专文进行批驳。文章由《红旗》编辑部写成，发表时署名的是国内对李德最熟悉并早就对其反感和反对的，后来在党内外以至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李德当年的翻译伍修权。文章发表于《红旗》1981年第23期，其标题为《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

文章一开头引用列举了中共中央对遵义会议的一贯的观点和历史性的结论后写道：

“这个结论，不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且永远闪耀着光辉，每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不断地从这里吸取智慧和力量。然而，对这个历史性的结论有没有人反对呢？有。其中最突出的，除了王明以外，就是李德。”文章中说：“我作为李德当时的翻译和遵义会议的列席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用确凿的历史事实，驳斥李德对遵义会议的种种诽谤，以正视听。”

以下便对李德关于遵义会议的言论逐一进行了批驳和批判：

“李德攻击遵义会议，首先就是竭力歪曲遵义会议前的形势……

“李德竭力否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其目的只是掩盖他应负的罪责……

“李德却把遵义会议说成进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这是恶毒的

攻击，卑鄙的诽谤……

“李德硬说（毛泽东、洛甫、王稼祥）这是‘宗派’，完全是诬陷……

“对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讨论和解决军事问题，李德也进行了攻击……

“他（李德）把遵义会议以后的军事战略方针说成是错误的，这同样是拙劣的歪曲和卑鄙的攻击……”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中国党对李德所写《中国纪事》第一个也可能是仅有的一个正式的公开回答。然而从《红旗》编者到文章作者一字未提《中国纪事》一书，未说明李德何时何地以何方式来污蔑遵义会议的，但是文中列举的反动观点及其材料，全部出自李德这本书。

这里有个问题，李德从中国回去以后沉默了几十年，为什么人到暮年还要对中国反咬一口，打出“第一枪”，自招反击？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动机呢？

6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李德写作和出版其著作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当时的国际矛盾，或许能够找到它的答案。

以斯大林的去世为分界，苏联党和国家以及所谓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发生了变化。虽然列宁亲自创建的和李德曾经参与的共产国际，在1943年就宣告解散了，但是苏联凭藉传统的“世界革命中心”和“老大哥”地位，俨然还是“国际大家庭”的“家长”，继续对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已经执政的国家指手划脚甚至发号施令。

这首先遭到了国家人口及党员人数都属世界之首的中国的反对。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开始出现“芥蒂”，进而发展为矛盾分歧和形成对立，造成了国际共运以至世界格局的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苏共指责中共为“民族主义”、“教条主义”等等，中共则批判苏共为“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等。以与苏



伍修权重访遵义时说，遵义会议时，我和李德就坐在这里听取毛泽东对他的批判

联“共呼吸”为荣，认为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来就是国际共运中的“异教徒”的李德想起当年，他这个“国际顾问”被赶下台，不由旧恨新恨满胸怀，奋起出战向中共开火，这才出现了他的这一系列“不朽名作”。

在李德洋洋近25万字(中文译本)的《中国纪事》中，也能追寻出他所以要写这本长篇回忆的思想轨迹。对于他在中国时为其作翻译的伍修权，他曾酸溜溜地说伍修权如何“得到毛(泽东)的信任逐渐升到中央委员，中央国际联络部领导和外交部副部长”。正是在伍修权作为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时，他曾与李德互不照面地在德国重逢过，当时伍修权是出席东欧几国党代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那时的各国党代会还有邀请“兄弟党”代表出席自己大会的惯例，中苏两党分裂以后这些大会增加了一个“保留节目”，即各国党照例要按苏共定好的调子对中共批评指责一番，而中共代表又必然予以回报。就在1963年1月的东德“统一社会党”党代会上，李德有幸也参加了大会，不过仅仅是坐在台下奉命鼓掌助威喊口号者之

一，他当年的中国“部下”伍修权却成了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外国贵宾，所以他一认出伍修权就满心酸涩气不打一处来，为此他在《中国纪事》中记了一件并非中国之事：“1963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从远处看到他，听到他粗暴地攻击兄弟党，因此代表们不得不命令他遵守大会秩序。”

其实际情况是各国“兄弟党”代表在苏共头头面前轮番对中共进行批判以后，中共代表团团长伍修权按照中央的指示(连讲稿都是从北京用电报发来的)在“祝词”中照例作出回答时，哪知会场上包括李德在内的德国党代会代表竟有组织地对正在演说的伍修权鼓倒掌，吹口哨，又跺地板，伍修权硬着头皮等全场起哄渐渐平息下来，在祝词稿子以外即兴加了一句话道：

“你们(刚才)这样做很好，这就使我看到了你们德国同志的‘文明’。”

在场的中国翻译见德国翻译有意不译出这句话，就抓过话筒特意补译出来，这下如火上浇油，会场越闹越乱，简直想把伍修权从台上轰下来。李德所说的“大会秩序”云云，

就是这么被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德国同胞破坏的，但他在回忆此事时，却对“老部下”伍修权倒打了一耙。

也许他觉得就这样说伍修权还不解气，他又找到关于这个“老部下”的新材料，在《中国纪事》中幸灾乐祸地写道：

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搞得声名狼藉。1967年4月13日，我见到了一张北京“红卫兵”大字报的英文底稿，大字报指控他“反对毛的革命路线，反对林彪，亲近南斯拉夫和苏联修正主义，攻击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大字报上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在1935年1月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上，正是李德这个大叛徒，最激烈地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方针。李德在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都是反对毛主席的，而把李德的这些报告忠实地翻译过来的不是别人，就是伍修权这个混蛋。”

幸亏当时李德不知道伍修权以后又署名发表专门批判他的文章，不然很可能会同中国红卫兵一样，也要“坚决打倒伍修权”。不过以上那段话除了他并未在遵义会议作什么“报告”外，情况还是“基本属实”的。伍修权在中国“文革”期间确曾受到冲击和攻击，其主要“罪行”就是他曾经为反对毛泽东的李德作过翻译，又去过“修正主义”的苏联，当过驻“修正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首任大使等等，因而也被批斗，关押和罚刷厕所等等。李德本来是伍修权挨整的“祸根”之一，他不仅不“引咎自责”，反而在一边看热闹，为人也太不地道了。

也许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在伍修权终于被解除“监护”重获“解放”的这一年即1974年，李德却辞世了，他没见到伍修权出狱并“出山”后，经叶剑英推荐和毛泽东批准，担任了比“文革”前地位更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要职。亏得这时李德已不在世，不然又得气歪鼻子了。

但要说明一点,即李德离开中国并“严格遵守了保持沉默的规定”几十年后,忽然又“跳”出来对中共及其领袖搞“揭老底”加“大批判”,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自发行动,也不是为了对伍修权等人泄私愤,而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是直接为其又一“祖国”的斗争方针服务的。李德在其《中国纪事》的第一章就庄严宣告:

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们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中体现,保卫它,使它不受冒险计划的破坏,不受敌人的打击,这是我们神圣的国际主义职责。

在其最后部分又郑重表白: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就认为,对苏联的态度是衡量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不管他是哪个民族,也不管他处在什么形势下。这一认识一直指导着我在中国的活动,而体现在苏联政府政策中的苏联人民的利益,就我认识到的和力所能及的,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始终是捍卫不懈的。我想我可以满意地说,我经受了这个考验。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把一切听苏联的话并听苏联的一切话、自觉“捍卫”苏联利益者,都封为“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把是不是“苏联的朋友”,视为他区分和评价人的最高标准。

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他观点相反。毛泽东曾对被李德封为“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的王明评价说,他“对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替别人想的事又太多了”,也是“心中只有别人,唯独没有自己”。“自己”者中国也;“别人”者苏联也。王明和李德一样,或者说李德和王明一样,从来如此。

对于“国际派”的这一套,毛泽东等人当然不予支持,李德等感到自己的亦即苏联的目的在中国达不

到,就认为这是“毛(泽东)领导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联的政策”,因而他们就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和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在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中,他当然得听从苏联那个“祖国——母亲”的召唤,向着他们的“敌人”猛烈开火了。李德长期沉默后忽然爆冷门地大肆攻击中国党及其领导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直接为这场斗争服务的,东德出版社在李德的《中国纪事》前言中,就毫不掩饰地说: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已经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观点,开始了他们对于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

因此,奥托·布劳恩同志的《纪事》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对马列主义兄弟党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和团结、反对毛分子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进行争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李德为了将中国党和毛泽东等骂得一无是处,同时将苏联和他自己说成一贯正确,就对自己当年根据所谓“国际路线”实为苏联意图在中国干的那些事、捅下的漏子,来了个彻底翻案和否认,更一字不提自己曾为此承认过错误作过检讨。

但是,李德为中国革命造成的两个“全部”和两个“百分之九十”的惨重损失,事实俱在、有史为证;他为此做过的检讨也人证、物证俱全,由不得他不认账。正如伍修权在索尔兹伯里访问他时说,李德想通过自己的回忆录“粉饰自己的过失并诋毁毛泽东等反对他的人是徒劳的”。

世界上国家与国家,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常常风云变幻,六七十年的“国际共运大论战”已成“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有人在“笑谈”之中透露出一点当年的秘闻轶事。在那时的

“反华大合唱”中,苏联和东德等“卫星国”出的类似《中国纪事》一类的书,大都是奉苏共中央之命专人炮制出来的。例如有一本与李德所著《中国纪事(1932—1939)》成为姐妹篇《中国特区(1942—1945)》不仅书名基本相同,作者身分也基本相同,后者是李德离华后的“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对外称苏联塔斯社记者弗拉季米洛夫,他也与李德相同地取了个中国名字叫孙平。他和李德一人一本书为了同一个目的合攻了同一个对象。又在同一个时期内出版,在北京由同一个“现代史料编刊社”翻译出版时从开本、字体到灰纸封面都完全相同,只是书名被改为《延安日记》。这本在作者死后的1973年出版的书,和基本同时出版的李德的书同样对中国党“进行了攻击和歪曲”。本来与孙平熟悉的师哲看到后气愤地说:

这本书以孙平延安日记的形式公布了大量“材料”,严重歪曲事实、造谣、任意中伤、诽谤我党和毛主席,令人气愤。孙平,一个老党员,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有良心的人才写得出。这与他在延安同我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师哲后来得到了答案,他说:

1990年,我的女儿黛霞来北京探亲,她带来孙平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发表的一篇讲话。尤里对记者说:1968年他被叫到苏共中央整理他父亲的档案文件。为了适应当时苏联同中国论战的需要,苏共中央书记处准备以公开的情报资料和他父亲从中国发回的电报为基础出版一本书,建议由他来编撰。他的任务是说明苏中分歧产生的根源。

……这本书根本不是孙平在延安的日记,而是后来拼凑起来的。当时出版这本书不仅有损于苏两党的关系,而且也丑化、损害了孙平的形象。

根本不是“延安日记”的《延安

7

日记》，实际上“也丑化、损害了孙平的形象”，它的姐妹篇《中国记事》是不是也丑化、损害了作者李德的形象呢？看来也未必不可能。这本书进入中国后，马上引起了对它的批评驳斥，李德在中国本来就印象不佳，这下更成了抵赖翻案，造谣污蔑和诽谤诬陷的无耻之徒。他在中国的重招批判完全是他自找的，这个结果在其作品写作和出版时就可以想见。那么李德会不会也如孙平一样是奉命之作，甚至是由别人捉刀代笔搞出的呢？看来也很难说。

不过一向以宽厚待人为传统美德的中国人民及其革命者，还是不愿把曾经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并与我们同甘共苦多年的国际友人想得或说得太坏，至少不会像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把他的中国战友歪曲丑化成那个样子。也正因此，早年曾说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分子”并发誓不愿同他共事，后来又署名著文批驳过他的伍修权老人，在他回首往事并缅怀故人时，曾经很客观公允地说：

“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以为对于李德也应该一分为二，不能将他完全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看。诚然，他来华以后，为中国革命造成

的损失及他自己犯下的错误，确实是很严重的，他的个人思想作风也是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他也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如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革命的献身精神，也还是真诚和可贵的；他在军事上也是知识比较丰富，对我军能够有所帮助的；他在工作中的认真严肃和前线上的沉着无畏，都还是可取的。他所犯的错误，有的是由于客观原因，不是以他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主观动机还是想把事情办好的，特别是他当时只有30多岁，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承担着那么重大的责任，几乎不可能不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只有我们对他作了客观公允的分析与认识，才能真正从包括他在内的前人的失败和错误中，汲取有用的正反面经验与教训。”

这是伍老同本文作者交谈到李德问题时说的，同样意思的话已在一本题为《李德与中国革命》的史料专辑的前言中公开发表了。不少老同志和有关的研究者，也同意伍老这个看法，有的还这样认为：

李德到中国以前并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有一些军事知识也主要来自苏联军事学院的课堂上和教材中，本人其实没有多少作战经验，

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家，更算不上什么战略家，又是在外国指挥一支兵力有限的军队同另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作战，这两支军队和作战地区及其传统方法都不熟悉，加之他的革命狂热过于自信，特别是其身分地位和出身民族的盲目优越感，因此他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硬把一个缺乏经验水平有限的至多是战术家的人，推出来充当战役家甚至战略家，不搞坏事闹乱子才怪呢！

对于这种“错把黄牛当马骑”的事，伍修权老人也曾说：“是当时的领导上，把李德摆错了位置。”

而这个责任显然就不应该由李德自己来承担了。

那么到底是谁，怎样和为什么“把李德摆错了位置”的呢？李德到底是怎么当上这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以致成为凌驾于中央和军委领导之上的“洋钦差”和“太上皇”的呢？……

在李德本人已去世20来年后，这些问题又作为一串历史之谜，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和兴趣。

（本文节选自即将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洋钦差”外传》一书）

（责任编辑 洛松）

浏览《资治通鉴》，当读到北魏孝文帝令出法随，严惩贪官污吏那段记事时，不觉赞叹不已。据该书记载：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发下诏书，布告官吏，凡收受贿赂违法断案，得绢10匹者，罪死；接受以送礼名义的贿赂，得绢20匹者，亦罪死。诏书下后，即雷厉风行，分命使者赴各地检举审查州郡官吏中的违法者。当时，兼领秦、益二州的刺史李洪之，系皇亲国戚，仗势违禁，贪赃枉法。孝文帝下令把他逮捕押京，集百官亲数他的罪行，然后令其自尽。随之，又处死了违禁的地方官吏四十余人。由于令行禁止、说到做到，很快收到了“受禄者无不局路，赍赂殆绝”的效果。

清人唐甄说：“天下奚治？令行则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则不治。”即：令必行，禁必果。

令必行 禁必果

白玉

这些年，“三令五申”一语经常见诸报刊、文件，或领导干部之口。有些地方和单位，任你“令”再“令”，“申”之又“申”，依然我行我素。比如，肃贪反腐，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制止乱摊派、乱收费、乱设卡，行政事业单位不准购置进口豪华小轿车，反对用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和公费旅游等等，“令”何止三，“申”岂止五，就是难以落实。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令出必行、维持禁令的绝对权威性。

使禁令见效的办法是令出必行，将政令法律化。如有谁敢于犯禁，不管他官居几品，权有多大，关系网编制得多么严密，一律严加追究，严肃处理。果能如此，则令行禁止。不搞“纸上谈兵”，没有“下不为例”，使人人知所畏惧，个个不抱侥幸，何用“三令五申”？

（责任编辑 友慈）

黄绍竑、刘斐与 44 人声明

● 刘晓滇 刘小清

黄绍竑秘密赴港

李济深秘密北上

1948年5月初的那几天，南京大悲巷雍园1号白崇禧的公馆，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时而又响起一阵鞭炮声。

这是在庆祝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胜利，也是桂系扬眉吐气的几天。

竞选期间，桂系要员倾巢而出，志在必得。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程思远、韦永成、邱昌渭、夏威、李品仙等，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连夫人们也出动使用外交手腕。竞选中，共用了一千多根金条，由广西、安徽两个由桂系控制的省份供给。这样，终于击败了以蒋介石为后盾的“太子派”代表人物孙科，李宗仁堂而皇之地就任国民党政府的第一届副总统。

然而，桂系的胜利就是蒋介石的悲哀。据蒋介石的侍卫透露，当播音员播出李宗仁的票数已过半、依法当选时，蒋介石盛怒之下，一脚踢翻收音机，脸如白纸，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卫备车，漫无目的地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官邸。

蒋介石是不能容忍桂系在他的眼皮底下坐大的，他与桂系结怨日深，并一直视其为异己。这次李宗仁

以微弱多数当上副总统，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但是，蒋表面上还要做出“精诚团结，共撑危面”的姿态。然而，内心却在盘算着怎样削弱桂系的权力。于是桂系的第二号人物，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首当其冲。

当白崇禧还在为竞选胜利弹冠相庆时，蒋介石在其黄埔官邸召见了白，请他出任“华中剿总司令”。同时，任命陈诚为国防部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

白崇禧一气之下，坚持不干，并赌气寓居上海。

见白崇禧不受命，蒋介石派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赴上海劝白，却是无果而归。为此，蒋介石又看中了曾陆续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湖南省政府主席以及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黄绍竑。

蒋介石破例地邀请黄绍竑参加他家庭式便宴，除蒋氏夫妇外，陪同的仅有蒋经国、张群、吴忠信。素不饮酒的蒋介石举起了酒杯，也道出了“醉翁”之意：“我想请季宽先生（黄绍竑字季宽）去劝劝健生（白崇禧字健生），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

虽然这趟差事对黄绍竑来说有些勉为其难，但他还是上了蒋经国飞往上海的专机。

当白崇禧在虹口家中接到黄绍竑从霞飞路住宅打来的电话后，非

常敏感地说：“季宽兄，是那个人（指蒋介石）派你来的吧？”

“是的，但我并不代表他，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黄绍竑直入主题。他说：“我此行并不是给老蒋当说客的，但我想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与关在笼中的鸟一样吗？现在蒋把鸟笼门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走高飞。他要整我们，我们就借机出去，到外面反过来整他。武汉是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你看形势，待机会，拥兵在手，主张和平，同共产党合作，迫蒋下野，德公即可取而代之。我们岂不是可以大有作为吗？”

黄绍竑一席话，令白崇禧恍然大悟。他很干脆地说：“我明天就回南京，然后到武汉就职”。6月28日，白崇禧终于登上那架绰号叫“空中霸王”的专机飞抵武汉。

半年后，在汉口三元里一所别墅里，白崇禧向蒋介石发了逼宫的电报，要求蒋介石以党国利益为重而下野。此时，淮海战役战火正酣，中共胜券已握，国民党内部谋求和平谈判呼声日高。为此，蒋介石被迫声明：“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在武汉白崇禧的别墅里，一个秘密的桂系会议正在召开，除在南京的李宗仁和桂林的黄旭初外，白

崇禧、黄绍竑、李任仁、李品仙、夏威等文武要员都参加了。白崇禧首先发言说：“蒋介石如果仍旧在位，各处都不服，和也难，战也难。所以，非让蒋让位不可。蒋让位后，就会六军同命，可望南北分治。我的意见，李任公（济深）一向反蒋，他团结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就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

众人皆无异议，于是就推人起草以白崇禧的名义写给李济深的信，但两易其稿，均不满意。这时黄绍竑建议：“最好派与任公有关系的人去香港，当面说明情况，既安全又迅速。”

白崇禧认为言之有理，便说：“季宽兄，这个重要使命只有请你担负了。”

黄绍竑一口应允：“我辛苦一趟就是了，但任公在上海临走时同我讲过，到香港一有机会就到解放区去。如果任公不在香港，同何人接头呢？是否能同中共驻港代表联系？”

白崇禧说：“行，你快点动身。”白崇禧还派机要秘书海岱禄带着密码本同黄一道赴港。

与此同时，李济深正准备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他的整个行动都由中共驻香港负责人潘汉年和夏衍秘密安排，以防不测。行前，李济深也想到了白崇禧，希望白能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走向光明。为此，他会见了当时在香港的原白崇禧秘书黄启汉，让黄带一封他的亲笔信去武汉面交白崇禧，以争取他起义。黄启汉展开白绫条幅，只见上面写道：

健生吾兄勋鉴：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战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



黄绍竑

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详情托黄启汉先面陈。

此即颂筹祺

弟李济深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颇有戏剧性的是，第二天，黄绍竑即抵港，并且与黄启汉见了面。相互很熟悉的桂系“二黄”，一个负有白崇禧找李济深的使命南下；一个负有李济深找白崇禧的使命正欲北上。但由于任务的机密性，他俩谁都没同对方讲，就这样令人遗憾地擦肩而过。

黄绍竑在香港未见到秘密北上的李济深，找到了当时在香港的好友、曾任第二十六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黄琪翔，并在黄琪翔的安排下见到了中共驻香港负责人潘汉年。三天后，当黄绍竑又与潘汉年见面时，潘对黄说：“我党中央已有了回电，要白崇禧派刘仲容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线去找刘伯承将军接头。”黄绍竑随即将情况电告白崇禧。

毛泽东不打“清一色”，爱打“平和，只要和了就行”

1949年1月10日，历时65天



刘捷

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四天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通过新闻媒介，公开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其中惩办战争罪犯条款和附列罪犯名单，给国民党上层人物以极大的震惊。

22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宣布下野。26日，李宗仁宣布代理总统。李宗仁这时充满幻想，希望与中共“划江而治”。而白崇禧又因为被中共列入战犯名单，心存不快。

正是在这样复杂和变化的历史背景下，黄绍竑被李宗仁电召回国。他回到南京，即同白崇禧就和与战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白崇禧坚持与中共“划江而治”，并说：“如果迫我太甚，仍然要打。”黄绍竑大为失望。他见南京城内和平空气冷淡，不由心灰意冷，想置身事外。于是，再次飞往香港，作局外观。

当行政院长孙科派出的谈判代表团被中共拒绝后，南京政府不得不重组谈判代表团，最终确定了由张治中为首席谈判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燕为代表团成员。

李宗仁又一次发电报到香港，点黄绍竑的将。黄绍竑不想卷进是

非，坚辞不出。最后因李宗仁屡电迭催，才勉强参加了代表团。

代表团的另一成员刘斐，也是李宗仁点的将。这位曾任军政部次长、国防部参谋次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湘籍将军，奉命到南京后，曾与李宗仁有番交谈。当他得知李宗仁的谈判目的是“划江而治”后，便直言相告：“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了和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要有决心，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有言和。并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才能行得通。”最后，在得到李宗仁“纵然在和谈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也愿意签字”的诺言，刘斐始答应随代表团到北平走一趟。

在北平的国共会谈，当然是以双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和张治中唱主角，但作为南京方面的代表，黄绍竑和刘斐也不虚此行。这倒并不是因为参与具体细节的讨论，而是因为受到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接见。

那是4月中旬的一天，当黄绍竑和刘斐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时，毛泽东已经在屋门外的院子里等候。两人下车后，毛泽东微笑着迎上前来和他俩握手。毛泽东很随意地问道：“季宽先生是广西哪里人？”黄绍竑回答：“广西容县，是容量的容，不是光荣的荣。”毛泽东顺口说：“容者，宽纳博大之谓也。前天与文白（即张治中）先生谈，我们准备宽大的政策，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李德邻（即李宗仁）先生虽不是容县人，也不必计较个人得失嘛。”

黄绍竑和刘斐不觉被毛泽东的幽默而逗笑了。

毛泽东遂又转问刘斐：“为章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老乡靠老

乡，两眼泪汪汪哩。”

毛泽东亲切随和的态度，使他俩顿释紧张的心情。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打仗的，发动内战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平，我们是欢迎的。”接着，毛泽东又扳着指头对他俩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说到这里，毛泽东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他俩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他真心和平。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讲到双方正在讨论的“国内和平协定”方案时，毛泽东问：“这个协定你们都同意吗？”

刘斐说：“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李宗仁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

黄绍竑说：“他这个代总统当得很难受，自己作不了主。”

毛泽东笑着说：“好，看在你们的情面上，不写罪魁祸首，那就写上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

他俩听了哈哈大笑。毛泽东说过这话以后，在协定的最后修正案中，果然没写上“罪魁祸首”、“元凶巨恶”这类词。

毛泽东一面笑，一面拿起新华

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红蓝铅笔指着稿子说：“你们看，李宗仁也说破坏旧政协的是蒋介石嘛，李宗仁也是这么说的嘛！”

当刘斐说到蒋介石不学无术时，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

谈话中，不知不觉已近中午。毛泽东遂邀请黄绍竑、刘斐共进午餐。他们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毛泽东对黄绍竑说：“听恩来说，季宽先生是个词人。我素好结交诗人词友，待协议签订之时，我们不妨作诗填词为之唱和。”

黄绍竑连忙说：“不敢，不敢。主席是大手笔，我读过主席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词风雄浑潇洒，我是佩服之至。我只是有时闲来无事，聊以寄怀。待协议签定之时，定填几句向主席请教。”

刘斐也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毛泽东，便问：“主席，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毛泽东回答。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爱打平和？”

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毛泽东思维敏捷，心胸宽宏，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使他俩在欢笑中疑虑皆释。

毛泽东这天的接见，对于他们告别旧营垒，选择新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他俩人生道路上新的转折点。

黄绍竑、刘斐在香港成了

了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

1949年4月16日清晨，西苑机场的停机坪上显得特别热闹。中共会谈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彪、

林伯渠、李维汉和南京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刘斐、李燕，都来为黄绍竑和屈武送行。

然而，黄绍竑心里有数，此番携带中共的和平条款飞回南京请示，他对李宗仁、白崇禧已经不大抱太大的希望。

这时，周恩来走过来说：“季宽先生，昨晚我同毛主席通了电话，他祝你和屈武先生一路平安。毛主席说跟你相约过，等签了协议，你们要填词唱和。”

黄绍竑有点激动：“周先生，我会努力去做的。虽然签字的希望只有百分之三五十，但不管协议能否签成，我都要回来的。”

果然，黄绍竑在南京遇到了很大阻力和众多责难。白崇禧怒气冲冲地指责黄说：“难为你呀，像这样的文件也带得回来！”何应钦冷冷地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不能随便决定，行政院要专门开会讨论。”蒋介石在溪口闻之则勃然大怒，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李宗仁则摇摆不定，不知所措。最终和平协议被拒绝。对这一结果，黄绍竑并不觉得意外。他心灰意冷，于是向李宗仁请辞，李宗仁终于答应了。

黄绍竑刚到香港，人民解放军即开始渡江。没有几日，南京便宣告解放。

和谈既然已经破裂，南京和谈代表的去留则倍受人们注目。中共希望他们都留下来，以免回去后为蒋家王朝殉葬。而张治中则坚持要求回南京复命。为了留下张治中，并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在周恩来的直接布置下，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将张治中的家属秘密从南京接来北平，同机被接来的还有邵力子的夫人。

此时，刘斐仍在北平，他虽已下定决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但他的眷属还留在香港。想到蒋介石特务无孔不入的触角，他不免有些担心和不安。周恩来得知后，同意他经天津乘船赴香港将眷属接回北平。

听说刘斐要去香港，邵力子和章士钊便专门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托刘面交，谴责李宗仁优柔寡断，背信弃义，未能履行在协定上签字的诺言。

刘斐到香港后，便托人捎信给已在广州的李宗仁。李宗仁随即派程思远和邱昌渭专程赴香港，请刘斐至广州晤面。刘斐考虑现在与李宗仁在想法上难趋一致，即使见面也未必有理想的效果，所以未能成行。以后，李宗仁又几次直接打电话，均被刘借故推托了。

恰巧这时湖南省主席程潜知道刘斐已到香港，也派程星龄、刘岳厚持他的亲笔信到香港请刘斐回湘。程潜在信中写道：“白崇禧已胁迫我一同备战，并指桑骂槐地责备我。我实在是难以忍受，希为章兄不负重托，速回湘任主席职。云之。”

原来程潜在湖南正积极准备起义，这些为白崇禧所风闻，白为防止不测，要程潜主动辞职，并率桂系主力部队进驻湖南衡阳。程潜身处逆境，如坐针毡。他想请刘斐接任省主席职务，借以“金蝉脱壳”，缓和自己与白的矛盾。白崇禧听说程潜请刘斐回湘后，也表示赞同，并两次发电希望刘斐到任。刘斐始而坚辞不受，继而又想争取白崇禧同他一道站到人民革命这方面来，于是电约白崇禧到广州，与李宗仁一起详谈。白表示赞同。

在广州，李宗仁、白崇禧、刘斐举行了一次有关前途决策的秘密会谈。由于此时各自的立场相距甚远，会谈未取得共识。

刘斐在他的回忆录《1949年北平和谈的片断》中详实地记述了这次谈话：

李说：“我只好负责牺牲到底了。”

刘说：“你这样替蒋介石负责，就是替罪魁祸首的蒋介石垫棺材底，于党、于国、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应该的。”

一直谈到深夜。白崇禧说：“我们还是九九归一，一起到广西打游击去罢！”

刘说：“不行的，打游击还有谁强过共产党！为今之计，只有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由你（指白）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还可保全多年来追随你们的部下。这样，你们政治上也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这些人往哪儿跑呢？”

白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

谈到这里我只好说：“好吧，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要再到台湾去呀！”

这时，李宗仁在桌子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

白崇禧默不作声。我们的谈话也就在这样的沉默中结束了。

次日晨，刘斐又一次回到香港。

当时，在香港聚集了不少从大陆辗转而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和其他人士。他们既对国民党的前途灰心失望，又对中共政权不甚了解而心怀疑虑，处于一种惶惶不安的矛盾状态。而从北平抵港的和谈代表刘斐和黄绍竑，却成了在香港十分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有位记者采访刘斐，双方的一段对话颇为精彩：

问：来港有何任务？是经过中共同意的吗？

答：没有什么任务。每一个人要离开共区，都得经过共方准许的。

问：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北平情形如何？

答：他们生活得很愉快。

问：你们的活动自由吗？

答：每个老百姓都可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我们当然也不例外。

问：共区分配老婆吗？

答：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怪事，要

不然我怎么分不到一个老婆呢？

问：你们生活费用的来源呢？

答：前次由南京带去的光洋还没有用完，并且中共帮助我们解决住和吃的问题。

问：你们在北平有何活动？

答：没有值得报告的活动。邵力子先生比较忙，他有时还亲自到车站去迎接来北平的民主人士。如前次郭沫若等由苏返平，他就去迎接过。又最近陈嘉庚等来平观光，他也去迎接。邵先生是很热情的一个人。

问：你是否与黄绍竑先生一同回北平？

答：这个你去问黄先生好了。

作为和谈代表，黄绍竑和刘斐终生不能忘记在双清别墅与中共毛泽东主席的一席长谈。他们为未能说服李宗仁、白崇禧响应中共的和平建议而抱憾，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冀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尽一点菲薄之力。这个契机终于出现了。

44位国民党要人的政治声明，成为“香港起义”的标志

1949年4月22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即将崩溃之前，曾有一个紧急大撤退的通知送到了在南京的每个立法委员手中。但并非所有的立法委员都参与了这次大撤退。其中有一批人南下到香港，脱离了垂危的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他们是立法院主和派的张潜华、黄统、谌小岑、金绍先、陈汝舟、李宗理等人。

抵达香港后，他们急于要与中共驻香港负责人联系，后经《时代批判》编辑董秋水的接洽，张潜华终于会晤了中共代表邵荃麟。

张潜华迫不及待地对邵荃麟说：“现在由于形势的急骤发展，迫使我们不能不与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彻底决裂，公开站到人民方面来。

但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对于人民事业作出贡献？我们很希望得到中共方面的指示，这就是我要求和您会晤的主要目的。”

邵荃麟肯定地说：“你们脱离蒋家王朝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欢迎你们站到人民方面来。至于目前应该做些什么，先不要着急，等两天我再给你们答复。”

两天后，邵荃麟对张潜华说：“立法院既是国民党的所谓民意机关，那么你们就站在人民立场上表示一下政治态度吧，如能联络一些人发表一个声明：一面抨击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祸国殃民制造内战的阴谋；一面申述自己脱离反动政权归附人民的决心与愿望，对于革命事业还是很有意义的。”

正在张潜华等人积极谋划行动之时，黄绍竑到了香港。于是，谌小岑等联袂拜访黄绍竑，并说明以黄的身份和威望领导这次行动，更能引起社会反响。黄欣然允诺，并提了一个重要的建议：不必只限于立法委员，举凡在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均在争取之列。

数天后，在黄绍竑寓所举行了一次70多人的聚会。

这时，刘斐刚抵香港，随即应邀参加。黄绍竑简要地介绍了北平和谈及李宗仁拒签协定的经过，不禁为被关死的和平大门而扼腕叹息。紧接着，刘斐就自己的感受谈了中共统战政策，他举了很多事例说明了中共的豁达大度和宽广的胸襟。其中特别提到了毛泽东主席“不打清一色，要打平和，只要和了就好”的即兴所言。

这次集会，最终孕育了一个被称之为“周三座谈会”的决定，即每星期三聚会一次。这样，在香港的一批国民党人就被组织起来，而总召集人就是被公推的黄绍竑。

“周三座谈会”的参与者决定发表一个政治声明，公开阐明他们同

蒋决裂的政治态度。这就形成了以后震惊朝野、影响巨大的《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的声明。

声明的最后是这样说的：“忠于主义、忠于人民的国民党的同志们，我们应当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重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对于现阶段的革命有所贡献，才可以创造国民的新生。”

在这声明上签名的有：黄绍竑、刘斐、贺耀组、龙云、罗翼群、刘建绪、李任仁、胡庶华、舒宗鑑、李觉、周一志、李默庵、潘裕昆、覃异之、张潜华、谌小岑等44人。

这个政治声明，在当时又被称之为“香港起义”。它寓意从蒋家王朝中又分崩出一批主持正义的力量，预示着逆潮流而动的国民党政府的败落和消亡。

面对国民党的开除、通缉，黄绍竑一笑置之，无所畏惧。这天，他接到了继任中共驻香港负责人饶彰枫的邀请，到《华商报》总经理邓文田家晚餐。到了邓的住所后，发现刘斐亦应邀抵达。席间，饶彰枫满面笑容地告诉黄绍竑、刘斐：“周恩来副主席今日来电，邀你们二位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我听听你们的意见。”黄绍竑、刘斐闻之兴奋异常，欣然允诺。

几天后，黄绍竑和刘斐秘密乘船到山东青岛登陆，转赴北平。

轮船在月夜中北驶，黄绍竑和刘斐凭栏远眺，只见海天开阔，波影粼粼。刘斐情不自禁地吟起唐诗：“月下飞天镜，云生织海楼。”黄绍竑随之脱口：“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然后，两人相视畅怀大笑……

（责任编辑 凌 辰）

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

——中国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能保持金牌第四名吗？



● 笑 非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整整走过了 100 年征程。在这辉煌和坎坷、荣耀和衰败交织的历程中，奥林匹克运动逐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奥运五环旗成为全球各民族共同的旗帜。国家不分大小、民族不分强弱、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四年一次聚集一堂，进行文明的大交流，展示各自国家的经济基础、文化特色和体育实力。

现代奥运会已经超越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种族肤色等差异，在一个友好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检阅每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国运昌，体育盛，全球百年奥林匹克史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一个国家在奥运会上体育竞争力的强弱，也成为反映这个民族盛衰的一个窗口。因此，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

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不惜花费巨大人力、财力、物力，以期在 4 年一次的奥运会上争金夺银，为自己的国家争得荣誉。

在百年奥运史上，中国跻身奥运殿堂的年头并不短。但在旧中国，奥运会带给中国人的是耻辱而不是荣耀。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开始扬眉吐气向奥运会进军。许海峰在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枪声，实现了中国人在奥运会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在 1984 年前将近 90 年的奥运史上，中国选手未获一块奥运会金牌；而在最近十余年的三届奥运会上，中国健儿一共夺得 36 枚金牌。尤其在体育好手聚齐的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中国选手一举夺得 16 枚金牌，成为世界体育三

强之后“第二集团”的“领袖”。

全世界感觉到了中国向俄罗斯（原苏联）、美国、德国体育三强的挑战，听到了中国迈向世界体育强国的脚步声。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后，一向长期对中国体育抱有偏见的西方记者，也不得不对中国体育的突飞猛进表示惊讶和佩服，并预言目前只有中国才具备向最近 20 年来一直雄踞奥运会金牌榜前三位的苏（俄）、美、德挑战的实力，并认为这一天已经不会太遥远了。

刘长春孤身闯洛城

中国人辛酸奥运史

1896 年，经过法国教育家皮埃尔·顾拜旦等人的不懈努力，第一

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奥林匹克发源地希腊雅典举行。组织者并没有忘记遥远而又神秘的东方中国，派人向中国清朝的光绪皇帝送来了奥运会参赛邀请书，但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及其随从，由于搞不明白“奥运会”是洋人搞的什么新花样，而放弃了参赛权利。

此后，由于军阀混战，中国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派出运动员去遥远的欧美参加这一和平的聚会，使奥运会赛场上迟迟没有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1924年，中国派出三名网球手到巴黎奥运会上进行了表演；1928年，宋如海作为观察员出席了阿姆斯特丹奥运会。

1932年，原中华体育协进会拟派选手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但国力衰败的旧中国政府不愿承担参赛费用。而日本一手扶持的伪满洲国却抢先报名参赛，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闻讯后从东北潜逃至北平。为了挫败日本企图把伪满洲国塞进奥运会的阴谋，张学良将军资助8000银元，加上协进会的集资，一个六人代表团终于作为中国第一批奥运会正式参加者，踏上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洛杉矶。

但是，国运衰微、经济凋零的旧中国是无法在奥运会上昂首挺胸的。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注定了在奥运会上要成为欧美人的陪衬和嘲笑的对象。

唯一的参赛者刘长春，在比赛中“惨不忍睹”。这位全国短跑纪录保持者，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早早就被淘汰。

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带给国人的竟是如此巨大的耻辱。这不是刘长春个人的悲惨遭遇，而是旧中国国力衰败的一个缩影。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派出69名运动员（其中女子2人）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七个项目的比赛。除符

保卢在撑杆跳高预赛中达到及格标准外，其余均在预赛中被淘汰。

1940年第十二届和1944年第十三届奥运会，因二战而被迫取消。1948年，战后伦敦再燃奥运圣火，中国派出33名男运动员，参加了篮球、足球、田径、游泳、自行车5个项目的比赛，预赛即全军覆没。至此，在旧中国派出选手参加的3届奥运会上，选手们连奖牌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就告别了奥运赛场。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宣布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但遭到国际奥委会一些人士的阻挠。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严正声明：台湾当局“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参加任何国际体育组织会议及体育活动，更不允许它盗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及中国奥委会的名义进行非法活动”。在世界舆论和友好人士的支持下，国际奥委会终于在比赛开始前两天，做出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参加比赛的决议，但仍遗憾地同时邀请台湾选手参加奥运会。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组成了40人的体育代表团奔赴芬兰参加奥运会，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在奥运村冉冉升起。中国选手只赶上了奥运会男子100米仰泳比赛，吴传玉游出了1分12秒3的较好成绩。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了太平洋里，开始了进军奥运会的征程。

但是，这一历程却意外地艰难曲折。由于国际奥委会一些人士强行把台湾的体育组织塞进国际奥运会，中国奥委会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开幕前夕，临时决定不参加该届比赛。此后，中国基于同样的理由，没有参加1960年罗马奥运会、1964年东京奥运会、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和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

1979年11月，在联合国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八年后，国际奥委会通过了“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规定台湾选手必须用“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参赛，不得使用它当时使用的旗、歌和会徽。

在台湾选手所参加的墨尔本、罗马、墨西哥城、慕尼黑四届奥运会上，杨传广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获得了十项全能银牌，这是炎黄子孙在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奖牌。杨传广继而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又获得了十项全能的第五名。女选手纪政则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获得了80米栏的铜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成为世界体坛一支重要力量。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没有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选手参加奥运会，奥运会是不完整的全球体育盛会。

但是，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举行前夕，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美国、中国等几十个国家抵制参赛，中国重返（夏季）奥运会赛场的日子又推后了四年。不过，中国当年派出选手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冬季奥运会。这是新中国首次组团参加冬奥会。

许海峰奠定奥运里程碑

中国人巴塞罗那扬神威

1984年7月28日，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当包容225名选手的中国代表团在五星红旗的引导下步入纪念体育场时，全场欢呼声四起，美国观众纷纷起身向来自大洋彼岸的客人挥手致意，庆祝东方的巨人事隔多年后重返奥运赛场。同时，中国、罗马尼亚等国没有跟随苏联等东欧国家的做法抵制奥运会，无疑也博得了美国和世界人民的好感。

回首往事，让人感慨万分。1932年，也是在洛杉矶纪念体育场，刘长春孑然一人，惨败而归；52年后，早

已扔掉了“东亚病夫”帽子的中国人重返这个体育场，他们要用自己的实力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崛起。

这一刻过早地到来了！在普拉多射击场，从安徽供销社走出来的枪手许海峰获得了男子自选手枪的冠军，实现了中国人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这也是本届奥运会产生的第一枚金牌。富有戏剧性的是，原本产生首枚金牌的男子自行车项目却落在了男子自选手枪的后面，使这项巨大的荣誉落到了许海峰的头上。

这也许是历史要成全饱经磨难的中国人，让全世界在这辉煌的瞬间聚焦于中国人身上，并提醒人们中国将成为奥运战场上的一支精锐之师。

中国代表队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一共获得 15 枚金牌，与许海峰的金牌几乎含有同等“含金量”的堪称栾菊杰所获的女子花剑金牌。

击剑，在西方意味着地位与实力，象征着传统与文化。在奥运史上，西方人从来不让奥运击剑金牌旁落。但是，一位中国姑娘却在洛杉矶剥夺了西方人的优越感，在一群西方女子的包围圈中孤剑杀出，登上了奥运会击剑领奖台。

当西方人看着他们的女剑手在领奖台上无奈地站在栾菊杰的下面时，心里一定会有异样的感受。当栾菊杰夺得奥运会击剑女花金牌后，无疑也告诉了全世界：西方人能做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没有哪一个奥运项目的金牌会永远与中国人无缘。

在男子 60 公斤级举重赛中，中国选手陈伟强和中国台北选手蔡温义分获金、铜牌，两岸同胞第一次同时站在了奥运会领奖台上。中国选手李宁在体操赛中夺得三金二银一铜，成为本届奥运会获奖牌最多的选手。

88 年里，中国人没有能力获得一项奥运冠军；而在洛杉矶的十余天内，中国人却胸挂 15 枚奥运金牌

而归，在奥运金牌榜上名列第四。这种巨大的反差勾勒出中国社会近一个世纪来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历史轨迹。

四年后，奥运圣火在韩国汉城再度燃起。这是十余年来东西方体育强国再次同场较量，是奥运史上水平最高的一届盛会。由于强手纷至，加上中国选手表现不佳，中国队在此届奥运会上只获得了 5 枚金牌，在金牌榜上退居第十一位。

最让国人感到痛心的是，中国女排在半决赛中以 0：3 负于苏联队，三局得分均未过 10 分，其中第一局居然吃了个零蛋。从 80 年代初起，中国女排在六七年的时间里“五连冠”，“女排精神”也成为鼓舞全国人民的动力，“振兴中华”的口号一时响遍大江南北。

但是，中国女排在后几年缺少居安思危的意识，不思改革和进取，终于在汉城喝了自酿的苦酒。

同时，首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在汉城三战皆输，未进一球，也让深爱足球的国人痛感失望。

汉城奥运会爆出的最大丑闻是，加拿大短跑选手约翰逊因被查出服用类固醇而被取消了百米金牌，但另一个同样巨大的新闻则在 7 年后才引起了人们的震惊。

在汉城男子跳台跳水争夺中，中国小将熊倪在最后一轮得分略少于美国选手洛加尼斯而屈居亚军。当时人们纷纷指责裁判明显偏袒洛加尼斯，使这位美国跳水名将得以保持两届奥运会获 4 块金牌而功成身退。

洛加尼斯赛后抱住他的教练，泪水夺眶而出。由于在几天前的跳板预赛中，洛加尼斯不幸头撞在了跳板上，不得不头缠绷带带伤比赛，终于夺得两项冠军，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他在为自己来之不易的金牌而激动。

其实个中奥秘只有洛加尼斯和

他的教练才清楚。在汉城奥运会前夕，洛加尼斯得知自己与同性恋伙伴一样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犹豫再三，决定向世人隐瞒真相，带病参加奥运会。偏偏在奥运会上又血染碧水，洛加尼斯不顾其他跳水选手有可能受感染的危险，继续保持沉默。

七年后，尽管熊倪等人表示了大度和宽容，洛加尼斯也袒露了自责和悔恨，但这位美国选手毕竟给奥运史上留下了一块污点。

洛加尼斯是中国跳水选手唯一没有在大赛中战胜过的外国选手，这是中国跳水界多年来最大的遗憾。从人均得金牌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跳水队是我国各项目中成绩最为出色的一支队伍。

中国军团虽然“兵败汉城”，但庄泳、杨文意、黄晓敏夺得三枚奥运游泳银牌，预示着中国人在最重要、最基础的田径和游泳项目中已经甩掉了落后帽子，开始向世界高水平挺进。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实现了“奥运家庭大团圆”，所有世界高手，包括许多职业选手都聚集一堂争夺金牌。可以说，巴塞罗那奥运金牌是近几十年来“含金量”最高的金牌，不折不扣地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中国运动员获得了 16 枚金牌，虽然看上去比八年前的金牌数只增了一枚，但从这些金牌的结构和夺取的难度来看，显然中国体育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

中国游泳女选手庄泳、杨文意、钱红、林莉获得了四枚金牌；陈跃玲夺得女子 10 公里竞走冠军。中国选手在游泳、田径两大项中首获奥运金牌。

在世界体坛，游泳和田径向来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体育实力的标志，因而有“得游泳、田径者得天下”一说。中国选手此次出征巴塞罗那，

由于在这两个基础项目中得到了五枚金牌,加上以16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四,从而理所当然地充当了苏(俄)、美、德三强之后“第二集团”的“领袖”。

在中国队的16枚金牌中,飞碟女枪手张山夺金牌可谓最富情趣。以后要是拍卖金牌,恐怕谁的金牌都不及张山的“值钱”,因为这枚金牌已是“全球孤本”。

张山参加的是飞碟双向,这是一个开放性项目,男女均可参加。这种表面上的公平掩盖着实际上的不公平竞争,因为竞技体育发展至今,大概除了艺术体操和平衡木之类,很难有女子可以在同一个项目中与男子对抗。可张山偏不信这个邪,愣是挤在一堆男枪手中间,手起枪响,枪响靶碎,把所有的男人们都比试了下去。

这些西方男枪手对这位长相俊美的中国姑娘佩服得五体投地,也顾不得输给一名女子回国后如何交代,便兴高采烈地把张山给抬了起来,让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动人的瞬间。

由于以后的奥运会射击赛取消了男女混合项目比赛,因此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出现的“巾帼压须眉”一幕就成为奥运史上的绝唱。中国人为自己创造了这一“奇观”而感到自豪。

体育改革硕果累累

亚特兰大再度出征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体育界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兴建了一批高质量的体育场馆,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改革开放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当代中国形象。

之后北京又开始申办2000年奥运会,最后仅以两票之差而未能

获得举办权。第一次申办就能获得如此多的票数,在奥运史上尚不多见,这表明众多国际奥委会委员都相信中国已有足够的能力举办奥运会,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体育实力都赢得了世界的承认。

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体育界加大了改革步伐,以改革体制、转化机制为核心,实行体育的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

体育系统着力改变过去那种多头领导、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情况,实行管理机构实体化。到目前为止,国家体委已有41个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转入实体化管理,成立了足球、乒乓球、登山、棋类、网球等14个运动管理中心。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国家体委把足球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把足球推向市场,实行职业化。经过4年的改革,足球界普遍成立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各层次俱乐部,建立了注册制、转会制、合同制、聘任制。俱乐部也由早期的企业与球队的“联姻”变为如今两位一体的经济实体,在运作过程中也按照经济规律运行。在最近两年的职业化主客场制甲级联赛中,足球界获得了大量社会资金的投入,摸索出一套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管理体育的成功路子,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对中国足球感兴趣的球迷。

虽然中国足球在冲击1994年美国世界杯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两项大赛中失利,但中国足球通过改革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为其他项目的改革趟出了一条道路。

继足球之后,篮球、排球等项目也开始进行类似的改革,期望在改革中求生存、求发展,从而全面提高中国体育水平。

1995年是中国体育界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国家体委推出了“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经国务院批准后颁布实施,同时《体育法》也生效实施。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体育的战略调整,同时也表明中国体育走上了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经过建国以来47年的努力,中国体育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方面来考察都有了质的飞跃。据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介绍,目前我国体育界的干部、教练员、科研人员和新闻工作者等有将近14万人,体育教师大约有32万人,行业体协和基层体育干部五万多人,兼职裁判员20万人。另据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我国体育场馆的人均占有面积,由解放初的0.01平方米增加到目前的0.5平方米,增加了50倍。

此外,中国选手还屡夺世界冠军,屡破世界纪录。光在“八五”期间,中国选手就共获世界冠军466个,376次创造了世界新纪录。

在中国体育崛起之时,人们迎来了奥运会百年大庆。在亚特兰大的这次盛会,无疑将考验和检验近四年来中国体育的实力,并最终确定中国体育在世界体坛的位置。

最近二十余年,奥运会一直是苏联(现俄罗斯)、德国(包括前东德)和美国三足鼎立,无人具备向三强挑战的实力。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三强金牌数都在30枚以上,而处于“第二集团”领袖的中国队金牌尚不足20枚。

曾经有人猜测俄罗斯从前苏联独立出来单独组队参加奥运会,实力会大打折扣。但事实证明俄罗斯在经过社会制度变革后较好地保留了原有的体育基础,在经过了短暂的成绩下滑后近来开始呈复苏势头,在去年国际大赛上所获冠军数已经压倒了德国队。

反观中国体坛,虽然经历了1993年辽宁女子中长跑队的崛起和1994年中国游泳女队出征罗马世界锦标赛的辉煌,但此后这两支女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低潮。因此,



1984年,许海峰夺得中国奥运史上第一块金牌

中国队在亚特兰大将无法取代俄罗斯跻身奥运三强之列。今年奥运会无疑是美国队一马当先,德国队和俄罗斯队将为争夺金牌榜次而展开角逐。

如此看来,中国队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目标只有一个:保住上届金牌榜的第四名,再次充当“第二集团”的“领袖”。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年初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一目标,并表示虽然难度很大,但仍有实现的可能。

所谓的“第二集团”,一般指有实力夺取5—20枚金牌的代表团,大致有中国、古巴、意大利、韩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匈牙利等十来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体育运动水平相差不多,谁临场发挥出色,就可能跻身六强,否则就会落到十名之外。

中国队此次出征亚特兰大,能否保住上届名次,关键仍是看游泳和田径两大项。

中国游泳界在经过去年的沉寂

后,今年在奥运会选拔赛上依然表现出相当的实力。不仅乐靖宜等名将依然状态颇佳,而且一大批新手脱颖而出。由于中国女子游泳的起点很高,这些年轻小将中的佼佼者凭其成绩都有可能到奥运会上拼抢奖牌甚至金牌。

但近几年来,除了美国、德国和匈牙利游泳女将保持高水平外,澳大利亚、南非和日本都有高手阻碍着中国姑娘游向冠军领奖台。在游泳项目中,比较彼此的成绩是一回事,而同池竞争又是另一回事,一切都得等到奥运会上才能得到答案。在此想说的是,我们不必对中国游泳女将寄予过高的“期望”,但也切莫低估了她们的实力。

随着辽宁女子中长跑队的几番波折和马俊仁教练的因病住院,中国田径队在奥运会上的前景不如游泳队。但王军霞毕竟还在天天练习,再过一二十天说不定又会在亚特兰大给人们一个惊喜。

此外,中国田径队在男女竞走、女子铅球等方面都有与世界顶尖高手抗争的实力。

中国队在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射击等项目夺金牌希望甚大,在女子柔道、赛艇、男子举重等小项上也有夺金牌的可能。但是,这些项目毕竟是“金牌小户”,且选手们成绩相对稳定,金牌数不会有大的出入。因此,中国奥运选手在游泳和田径项目上的表现好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队能否完成保住上届第四名的任务。

中国早已洗刷掉了“东亚病夫”的屈辱,并正在朝着“世界体育强国”的目标迈进。尽管征途坎坷,但中国人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日子已经不会太遥远了。亚特兰大将再次证明中国人的决心和能力。

(责任编辑 方实)



谢子长 1933年摄于北平

谢子长之子

谢绍明

是怎样继承父业的

● 青 霞 炳 书

年逾古稀的谢绍明，身板强健坚实，眉宇间闪烁着一般青年人投身大事业时才有的那种刚毅顽强的热情。这不禁使我们时时联想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黑暗的中国大地上，进行殊死斗争的一个身材瘦削但却像雷电一样强悍的人，那是他的父亲谢子长将军。

反动派要斩断谢家“龙脉”

反逼出又一个革命者

1927年10月，谢子长和唐澍等发动清涧武装起义；1928年春夏，谢子长与刘志丹、唐澍等组织渭华暴动；1932年初，谢子长与刘志丹、阎红彦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3年底，正当陕北革命武装斗争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谢子长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为西北军事特派员，负责领导西北革命武装斗争工作。

1934年7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被任命为总指挥。农历六月初六，游击队打进安定县城，打开监狱拯救难友，大大地扩大了红军影响。继而谢子长率部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师，任红四十二师政委。

国民党地方军阀仇视陕北革命，对谢子长恨之入骨。他们对谢子长无可奈何，便把仇恨转嫁到谢家老小身上。1932年寒冬，地方军阀井岳秀的军队三番五次地

开进小小的枣树坪，闯进谢家，抓走了谢子长的二哥和两个侄子，二哥被折磨死在监狱里。他们还扬言把谢姓的革命者统统杀绝。

这话传到谢子长耳朵里，他气愤地说：“共产党人就像毛脑柳树一样，割了这茬又长一茬，白军越抓人越杀人，恨他们的人就越多！”

果然红军的队伍在谢子长领导下，越打越大，越战越强。

愚蠢的敌军据风水先生的占卜，在谢家脑畔山腰中央挖下一条深深的壕沟，用以“斩断”通往谢家住宅的“龙脉”。

敌人的图谋无疑是徒劳的，斩“龙脉”的结果，是又造就了一名年幼的革命者，谢绍明随父加入了红色游击队的行列。

1934年夏，正当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8月，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激战在清涧河口。身负重伤后，谢子长坚持指挥战斗，直至把敌人的进攻粉碎。

1935年2月，谢子长的伤势急剧恶化，于2月21日与世长辞，时年37岁。为了纪念谢子长创建陕北根据地的业绩，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把他的家乡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在枣树坪修建子长烈士墓，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毛泽东并亲笔

为子长墓题写了碑文。

谢子长之子谢绍明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锻炼成长。1939年,在延安干部子弟小学,经两位党员教师介绍,谢绍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由于他在大生产运动中劳动出色,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1940年,因为学习、工作和劳动表现出色,谢绍明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1944年,谢绍明又以模范学生的身份,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大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谢绍明成为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往东北的第一批干部中的一员,随一中队爬山涉水到达热河省赤峰市。谢绍明担任了第二区区委书记。

赴苏深造一心献身国防工业

埋头攻关忘掉妻子住院分娩

为了给行将诞生的共和国培养一批高层次的建设人才,1948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选派谢绍明、李鹏、邹家华、刘虎生、叶正明、叶正大、林汉雄、肖永定、罗西北等21名同志赴苏联学习。谢绍明任党支部书记。谢绍明因病回国后,由李鹏同志接任支部书记。

1954年,谢绍明第二次留苏。他以一个航空工业工厂副厂长的身份,带领十几名中国航空工业的技术和管理干部,在古老的伏尔加河沿岸的喀山市和莎拉多夫市两家著名的飞机制造厂,学习和工作一年多。

谢绍明回国后被任命为沈阳一一九厂厂长,作为第一代航空工业的创业者,披荆斩棘,投入了战斗。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一一九厂研制导弹自动驾驶仪的工作正在紧要关头,谢绍明数次组织攻关小组冲刺,却又屡屡败下阵来。性格倔强的谢绍明,气头上来,一连几个月死守在厂房里,连一日三餐都托人从集体食堂往回捎。他的妻子陈苏林在医院生下儿子,谢绍明接到护士的报喜电话,竟心不在焉地说:“儿子!什么儿子?”待他反应过来,想起是他们的儿子谢明降生了,才十分尴尬地对护士说了许多道歉的话。

1963年,地对空战术导弹的心脏——自动驾驶仪终于在一一九厂研制成功。用于实战,多次成功地击落了入侵我国领空的U-2无人驾驶飞机。它使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着实慌了一阵子。

1975年,谢绍明由国防工办点名调入北京,参与了国防工办主持制定的《战术导弹十年规划》。1981年谢绍明调入国家科委,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党组成员兼科技管理局局长,负责全国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的工作,为1985年正式出台的《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方案》,倾注了他三年的心血。

为科技体制改革保驾护航

仗义执言“戴晓钟案”平反

1985年初,谢绍明改任中纪委派驻国家科委纪检组的组长,他把为新的科技体制的运行保驾护航,视为组织给予的新的历史使命。谢绍明清楚,中国太大,事情太复杂,政治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潜伏着的阴暗的、消极的东西,随时都可能跳出来,腐蚀我们的肌体,干扰我们的进程。

果不出所料,1986年5月,发生了浙江省杭州市的“戴晓钟案件”。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要宋健同志查处。谢绍明被派往杭州调查。

戴晓钟是浙江民办科研机构——浙江精细化工研究所所长。他原是一个省级科研单位的工程师。1983年,他和13名同仁毅然辞掉“皇粮”,创办了精化所。经过几年的奋斗,先后开发出多项实用技术成果,在全国范围内与数百家企业建立了有偿情报、咨询、培训、新产品技术转让等协作关系,实现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戴晓钟及其精化所的所作所为,本来符合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则和精神,但杭州市公安部门却以“从事科技投机倒把活动”为罪名,要逮捕戴晓钟,查封精化所。

谢绍明在杭州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建议杭州方面不要抓人、封所。然而,他遭到了拒绝。在谢绍明回京后不久,戴晓钟被逮捕。

谢绍明气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地方官员,竟这样敢于置国家政策和法纪于不顾。他想起父亲谢子长等老一代革命家,一腔赤诚为人民,同人民鱼水不分,所以深得人民拥护。至今,子长陵园仍嵌刻着1946年中共西北局送的挽联:“一心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



谢绍明(中)1949年在莫斯科大学与苏联同学合影



谢绍明与妻子陈苏林(1953年)

谢绍明越想越气,现在杭州市公安局的作法,已使问题超过了是否违背国家政策的范围,而成为一起相当严重的法律案件。

谢绍明认为不能坐视,他让科委技术市场办公室派人到北京政法大学请了律师,赴杭州为戴晓钟进行法庭辩护,驳得起诉人无言以对。

但是,戴晓钟仍继续被关押。

谢绍明又就此案向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发出呼吁。

1988年8月10日,在社会各界的敦促下,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公开审理“戴晓钟案”。法庭当庭宣布戴晓钟无罪释放。

戴晓钟事件的公正处理和公开报道,为全国科技工作者在科技市场上的搏击,提供了舆论的和法律的支持。其意义和价值可想而知。

大别山区贫困触目惊心

科技扶贫闯出一条新路

1984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指出:“还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仍未摆脱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国家科委参与了大别山科

技扶贫开发工作,并为国家机关支持贫困地区提供一条新的路子。

1986年8月,谢绍明与当时国家科委主管扶贫工作的副主任郭树言同行,去了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

大别山区面积74000平方公里,人口2500万,是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起家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史上,这里与井冈山、延安有着同样的光辉。

早就听说大别山穷苦,但谢绍明怎么也没有料到,这里比陕北还要穷苦。

当时正逢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中秋节,然而在英山县,在当年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驻地,谢绍明在一户农民家里,见到的是政府救济的一碗豆渣和半条小鱼。瓦罐里放块黑乎乎的猪皮,就是一家人半年的食油。很多农户连灶都没有,烧饭就用几块石头支起一只破锅。

从英山县乡下归来,谢绍明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他想起1935年陕北梨果飘香的季节,在中共西北特委所在地延川永平镇,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情景。那些威武的将士就是来自这大别山的啊!他们南征北战,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培育过这支革命队伍的大别山区,如今还是这样穷。

从参加这次考察后,一种羞愧不安的心情,一种负罪感,一直在啃噬着谢绍明的心。到1988年谢绍明改任国家科委顾问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科技扶贫工作。

从此,他一年四季,不论严寒酷暑,一直为扶贫而奔波。他和科委科技扶贫团的同志们几乎遍访了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所有的贫困地区,从北方边疆的赫哲族地区,到天涯海角的黎族地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他们反复深入贫困山区,甚至是连马车道也没有的穷乡僻壤,去考察自然资源、水源、环境、气候,以便发挥科委的科技优势,因地制宜地帮助当地确定开发项目。而且觅寻投资,引进技术,示范推广,直至推动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和企业联合。

大别山地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自然条件的桑蚕、茶叶生产带。这里水量充足,土质肥沃,气候温暖而润湿,又具有山水相依的综合效应。但这里养蚕制茶还是古老落后的传统方法,蚕种孵化不是放在怀里捂,就是放在锅台上炕;茶叶只能粗加工,售一两元钱一斤。

扶贫团请来湖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主任龚信文,河南省农牧厅高级农艺师梁长俭等同志,为群众引进蚕桑良种,开发、传授优质蚕桑技术。近年有些蚕户已经用了最新式的波浪式的塑胶线架养蚕法,它通风好,产量高,丝质好。而且逐渐形成“一条龙”生产,建立了缫丝厂、丝织厂、真丝针织厂、丝绸服装厂,使大别山区的丝

绸制品打入了国际市场。

湖北省农科院著名茶叶专家刘复秋，英山县科技副县长、茶叶专家刘付璆，手把手教茶农制茶。制出上等“天堂云雾”茶，一斤售价800多元，提高效益几百倍。

湖北麻城市有位被农民称为“枸杞市长”的朱一恕。他在宁夏搞了近20年的农业及园艺生产，1985年被调回湖北农学院园艺系任系主任。1986年在国家科委科技扶贫计划的感召下来到麻城市。在他担任麻城市科技副市长期间，他和他的夫人、湖北农学院教授马爱茹，收集当地的野生枸杞种子，与宁夏枸杞种子进行多种杂交试验，成功地筛选出“湖北杂交枸杞和三倍体宁夏枸杞”种。至1995年已推广到5000多亩，为当地农民带来了相当高的经济收入。

一份情真意切的考察报告

千百万人捐赠衣物献爱心

1994年八九月间，中央各机关、团体，军委各单位，北京及各省、自治区党政军民学，曾掀起一个向贫困地区群众献爱心捐赠衣物的活动。这一声势浩大、牵动数百万人爱心的义举，就源于谢绍明同志的一份报告。

1993年10月，受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陈俊生的委托，谢绍明带领一个调查小组到湖北郧阳地区和大别山黄冈、安庆地区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走访调查。沿途的所见所闻表明，贫困地区部分群众急需衣物，在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同时，应采取措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因此，谢绍明在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中，建议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出面，组织一次向贫困地区群众捐赠衣物活动。

邹家华副总理看了报告后，于1月20日批示：“请俊生、榕基、李鹏、泽民同志阅示。此材料十分真切，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省市也还有一部分农村相当贫困，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就更宽，程度更深一些。很有必要要求各地付出更大的注意力落实这项工作。筹集衣物帮助贫困地区过冬这件事也很有必要。”

江泽民总书记在两次重要会议上，很动情地讲到这个报告，总书记说：国家科委谢绍明同志给中央写了个报告，真切地反映了贫困地区的情况。希望各方伸出援助之手，开展扶贫济困活动。

在中央机关的捐助活动中，谢绍明带领国家科委领先行动。

1994年“五一”节前，谢绍明刚刚从外地参加一个科技扶贫会议回到北京，立即带上由国家科委系统捐助的17000多件衣物、47000元现金、500多册图书和3000多件文具，直奔大别山中的湖北孝昌县小悟乡赈

济扶贫。

别小看这个小悟乡，仅土地革命时期，就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3000多人在战斗中牺牲。有10人成长为功垂共和国革命史册的将军。他们是刘震上将、卢南桥少将、刘振国少将、胡静迁少将……可是这里的老百姓，至今还居住在国民党、日本人轮番焚烧过的又黑又破的房子里。

4月25日，天刚下过雨，曲曲弯弯的泥泞的山路，走一步滑两步。谢绍明和湖北省陈水文副省长带着随行人员，走家串户，把一包包衣物亲手送到贫困户手中……

就在这次从北京出发到湖北之前，谢绍明还收到一封河北省阜平县政府的来信。

信上说：王快村郑新妮小朋友已入学，4万元捐款修理了校舍，建立了基金会。他们代表全县人民感谢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关怀。

阜平县曾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的驻地。聂荣臻元帅曾在这里度过了辉煌的11年。彭真、吕正操、杨成武、赵尔陆、程子华等许多党政军领导人都在这里工作、战斗过。它也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走出陕北的第一驻地。如今，这里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的扶贫点。

1993年春节刚过，谢绍明和国管局包副局长一同到这个县考察。在王快村的一个半山坡上住着一位60



谢绍明陪同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中)，在延安南泥湾视察马海毛羊饲养基地(1991)



1995年，谢绍明视察陕北佳县百万亩红枣基地

多岁的老人。在攀谈中谢绍明得知，老人因贫穷无力娶妻，鳏居数十年，50多岁才娶了一个聋哑多病的妻室，生了一个女孩，叫郑新妮，9岁了还没有上学。

谢绍明掏出随身带的仅有的150元钱，递到老人手里。老人一再谦让：“这怎么行啊，让您破费！”谢绍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关心这位老人，更疼爱他们的孩子。

触景生情，这与1934年农历十一月，谢绍明的父亲谢子长将军在陕北小界岭村的一桩事，何等相似！那是谢子长负伤后，为躲避敌人袭击转移驻地时，在农户薛殿革家小歇。谢子长见薛家五六口人，炕上竟没有一床被子，便吩咐警卫员把担架上的被子留给薛家。薛殿革坚决不收，谢子长则坚持说：“留下吧，留下让娃娃们有个盖的！”

谢绍明颇有感慨地说：“中国的老百姓有多好啊！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地为老百姓办事，那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党性，也丧失了做人的最起码的良心。”

返陕北赴湘赣矢志扶贫 传捷报奏凯歌告慰前贤

谢绍明为科技扶贫，曾七次返回诞生养育他的陕北

故土。

1988年的陕北就给他一种强烈的感觉：与战争年代相比，这里虽已发生明显变化，但总的印象依然是贫困。途经佳县黄河畔红枣基地，见树上的枣子约30%以上生了虫，严重影响枣子的产量和质量。他与科委扶贫办公室商量后，决定把陕北红枣列为国家科委的科技扶贫项目。于是，从1989年开始，国家科委从河北涞县聘请了一批专家，专赴陕北黄河畔上，帮助枣农务枣，使虫枣已降低到3%左右。

1995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清涧枣飘香》一文，文中说：战争年代，革命老区清涧县的大红枣儿曾养育过无数革命战士。目前，他们献给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的已不再是红枣儿，而是用红枣儿精制成的“北特牌”红枣汁，用它来向出席大会的各国姐妹们献上一份爱心，一展革命老区的丰采。这里所说的“北特牌”红枣汁，就是枣农脱贫后，对大枣这一产品深加工的结果。

经考察论证，国家科委与陕西省共同确定，到1996年在黄河沿岸的8个县将建立起百万亩红枣基地。同时建立起百万亩仁用杏基地。

1989年，谢绍明陪同郭树言副主任代表国家科委，率一批专家学者，带着科技项目，再一次踏上陕北的黄土，出席振兴革命圣地延安的科技扶贫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延安市南泥湾马海毛羊饲养基地引起了与会者的特别关注，被认定为是一个科技扶贫的好项目，国家科委当即表态，投资50万元解决其生产和经营困难。至1994年，这个饲养基地已有纯种安哥拉羊700多只，各种杂交羊5万只。计划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成一个百万只中国马海毛羊群、年产2000吨的马海毛生产基地，并形成相应的加工能力。

1990年，他又陪同蒋民宽、朱丽兰副主任再到延安、榆林地区，与陕西省科委、陕北建委及一批热心老区开发建设的科技工作者，共同研究，共商陕北扶贫开发大计。随后一个重大举措出台：由国家科委扶贫办掌握的每年1000万元的星火扶贫贷款，在今后将以延安和陕北的科技扶贫开发为主要投向；除此之外，国家科委将从其他资金中每年再节余出250万元，专门支援陕北科技扶贫开发。

1991年6月，谢绍明陪同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前往延安和陕北考察。从毛乌素大沙漠包围的塞上古城榆林起程，沿西包公路向南逐渐深入陕北群山苍苍的腹地。他们发现，陕北老区要脱贫，领导干部需要一种观念意识的转变。于是，在宋健主任的倡议下，山东省和陕西省共同确定，在经济发达的山东两个地区与陕北两个地区之间实行干部挂职交流，一边帮助陕北扶贫开发，一边培训提高陕北干部的管理水平和科技素质。

此后的三年间,两省共交流干部 324 名,培养各类技术人才 2071 人。筛选合作开发项目 659 项,包括橡胶、塑料门、电焊条、木制系列产品、塑料大棚蔬菜,以及塑料大棚养鸡一条龙生产等。

井冈山地区自然条件比陕北、大别山好,经过 10 年的科技开发,经济发展喜人。井冈山市粮食人均 800 斤,经济收入人均 800 元,已跨出贫困区。永新的桑田由原来的 2000 亩发展到 4 万亩,并引进新品种建成了一批优质桑园。

1995 年,永新县又提出了一项蚕桑系统工程——“四 A 工程”,使蚕桑生产科学化、规范化,推广烘茧、缂丝新工艺,达到丝绸质量总体提高。遂川县则与丝绸之



谢绍明在父亲谢子长陵园

乡的杭州丝绸公司正式联营,建立起了缂丝厂、纺织厂、服装厂。

TIPS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设立的全球性技术贸易信息服务网络。它在中国的机构就设在科委信息所。1992—1993 年,科委即帮助湖南平江、茶陵、炎陵、汝城、桂东等五县建立了 TIPS 信息网络。1994 年,又帮助江西吉安地区建立起 TIPS 信息站。以上各县均已配置了康柏计算机、打印机、远程调制解调器。至 1995 年底,两网络已发送信息 1 万多条,已有两条信息得到摩洛哥、西班牙等国家的采用,其他尚待反馈。因而可以说井冈山地区的科技信息交流,已跨入了计算机时代。

中国科技扶贫拉开的浩荡战线,及其所创造的突出成绩,震撼着、激奋着中国大地,也点燃了一大批关心祖国发展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的赤子之心。

1992 年,香港学者协会特别组织了“大别山区考察团”,对国家科委的科技扶贫计划及具体工作作了实地考察。考察团团长、香港浸会学院理学院吴清辉教授,在《科技扶贫——大别山区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些因‘科技扶贫’带来的个别经济发展现象,更重要的是‘科技扶贫’的构想及内容看来都是有实际基础的。”

1993 年,香港学者协会还特邀谢绍明等赴港,介绍大陆科技扶贫开发的开展情况,并与该协会商定,由该协会特意设立“振华科技扶贫奖励资金”。1994 年度、1995 年度曾分别颁发了个人服务奖及项目奖。1996 年的第三届科技扶贫服务奖,比第一、二届的奖励面和奖励金额均将扩大一倍多。

全国的扶贫攻坚,正在加大力度,加快速度,迅猛地向前推进。其科技扶贫开发,已凝聚为势不可挡的巨流。在这股巨流中,我们这位老当益壮、誓将贫困在中国根绝的谢绍明同志,正在执著地、一如既往地向前跨越。

(责任编辑 洛松)

○ 广 告 ○

治疗外阴白斑,解除难言之隐

外阴白斑系外阴营养不良障碍症,主要症状为外阴瘙痒,粘膜、皮肤变白,萎缩或角化增生,久之阴道萎缩造成生育困难并影响正常性生活,外阴癌 50% 来源于外阴白斑,已往多采用冷冻、激光或手术切除等措施,但这是以破坏女阴肌肉组织为代价的权宜之计,痛苦大且复发率高。

外阴白斑专科主任高莹创建以中药为主的无损伤疗法治疗男女外阴白斑及各种外阴搔痒症,无痛苦,无损伤,方法简便,可带回家自治,此疗法 1994 年通过郑州市级科研成果鉴定,1995 年又获科学技术进步奖。

地址:郑州市伏牛南路 60 号郑州市中医院汝河分院

电话:(0371)8982686—3216

乘车路线:从火车站乘 102、103 路电车到汝路站下向西 20 米即到。(豫中医广证字[95]第 198 号)

北京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大三条 5 号

乘 105、107、111 路电车,22 路汽车新街口站下车即到

电话:(010)62252417

邮编:100035

碧血丹心的 郭化若 将军



● 周而复

周而复(左)和郭化若在庐山(1962年)

灿烂的晨光透过玻璃窗照着书桌,我正在聚精会神伏案写作,书桌上的电话铃声叮叮地响个不停,放下笔,拿起听筒,传来低沉而凄凉的悲声:“我是郭化若的儿子,叫郭延秋,我爸爸于11月26日4时17分逝世了,特向您报丧……”我问他家里设了灵堂没有,他说,设了,便告诉他准备去吊唁。

放下听筒,重新拿起钢笔,却再也写不下去了,往事潮水一般地涌上心头。

1938年夏天,我从上海到了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在一次集会上见到他,当时他刚刚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不久。他虽是参加长征的红军老干部,但是面目清秀,文质彬彬,博览古籍,谈吐文雅,粗粗看上去是一位文人。但他的确是一位军人,曾经担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代参谋长,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参与运筹帷幄,是叱咤

风云的人物。他对文艺有兴趣,虽然是初交,但我们谈得来,十分融洽。

1931年4月间,王明控制下的党中央,派中共中央代表团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排挤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正确领导,改组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化若同志从代参谋长调任秘书长,继又调任军委二局局长和红军军事学校任职,离开军事指挥机关了。1932年7月,他到红校,就在大会上宣布开除他的党籍。真是晴天霹雳,使他如坠五里雾中,莫名其妙,从此灾难和难以忍受的痛苦不断降临到他头上。

为什么忽然开除他的党籍?当时王明等人搞肃反扩大化,认为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托派等的“反革命组织遍布于赤区”,到处乱捕乱斗乱杀。事后他回忆当时情况:“他们为什么抓我的托派呢?当时有两件事:一件是三军团有位师长叫李匠才,1930年打长沙后被

认为是托派,把他杀了,抄出了我写给他的一封信。但实际上信的内容是一般问候,毫无政治内容。第二件是1932年红校在审理‘托派’时,有人诬供我是‘托派’……案子报到王明的代理人那里,他说:‘王明早就感到这个人不可靠,认为是混进党内的。’‘大人物’说我是‘混进党’的,自然要开除出党……”

1933年10月,红军军事学校改为红军大学,他虽然仍在红大任教,可是政治上的打击使他抬不起头来,他埋头工作,研究战术,关心苏区的发展。他还关心着当时被排斥住在瑞金城郊东华山小庙养病的毛泽东,常去看望,写了一首充满同情和感慨的七绝:

西风落叶总无情,
谁夺燕军乐毅缨?
小寺却非楼百尺,
更深听雨夜清新。

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他经历了

双重坎坷曲折艰难的道路。拟定参加长征干部名单时,红大某些人想把他留在苏区,幸亏红大训练部长钟伟剑说话,才列上他的名字,编在干部团当参谋。团长陈赓同情地对他说:“你是一个方面军的代参谋长,被分配来当团的参谋,委屈你了。”他想自己被开除党籍,没人管,更没有人敢于接近他,能担任团的参谋,已经是对他信任了。出发前发服装,就没有发给他,陈赓代他去领,说是发完了。发布鞋的时候,也没有给他发一双。他于是请人做了一双麻草鞋,脚后跟正患溃疡,行军一天,脚后跟磨破,化脓流血,迈一步,痛一步,咬紧牙关忍痛跛行,紧跟红军长征。八千里路云和月,终于到达遵义,休息了几天才治好。所有红军的干部和战士全靠两条腿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化若同志因为脚磨破了,腿也没法依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长征全靠一片心”——一片碧血丹心。

他和红军一同跨越大雪山——夹金山。没有到过雪山的人,很难想像雪山的情况和登雪山的艰难,请读他吟咏《雪山》:

海拔六千米,
途中亘一山。
冰天又雪地,
行人叹路难。

夜来狂风奔怒吼,
雹飞如弹又如斗。
风雹扑人人欲倒,
坚持勇进更抖擞。

他和红军一同跨越草地。草地是一片茫茫的沼泽地。“半天云雨半天晴,处处软泥处处坑;失足坑深不知底,无人无法助攀登”(郭化若:《七绝·草地》)。草地,到处埋藏着死亡的危险,一旦失足陷在坑里就再也起不来了。

英勇的红军和化若同志无视死亡的威胁,“坚持勇进更抖擞”,胜利走出草地。

自然界的雪山走过来了,还有政治上的雪山横在他的面前。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成立工农红军学校,分配他担任训练处长。他有想法:头上戴着“托派”帽子,党籍已被开除,这个处长怎么当呢?不如当个教员算了。他去找毛主席想改变一下工作,正好周恩来也在,毛泽东见他欲言又止,看出他的心情,便说:“化若同志,你的历史问题会弄清楚的,不要顾虑太多,去了,要发挥你的作用。”周恩来也鼓励他去:“你是去抗日的学校,很重要嘛,现在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他没有再提意见,到训练处工作,努力解决教材和训练器材缺乏的困难,专心致志培训,总结军事教育实践的经验,提出意见报告毛主席,受到重视,把长信交给红大讨论,并说:“军事需要你的地方是很多的。”

1937年8月22日到25日,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毛泽东曾要郭化若到一一五师担任参谋处长。他考虑到一个戴着“托派”帽子的已被开除党籍的干部怎么能够当好参谋处长?何况又有病,便请求缓去,留在延安学习。他参加毛泽东倡议和领导的哲学座谈会和新成立的“新哲学会”,写了《抗日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方针》和《日本的速胜论为什么必将失败》,还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做了学术报告:《军事辩证法》,把唯物辩证法引进军事领域,受到毛主席鼓励:“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根据毛主席指示,他研究战略问题和抗日游击战争,编写《抗日战争丛书》。

虽然化若同志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但毛泽东同志不但不歧视他,而且信任他重用他,并且关心他的政治生命,要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把他的问题审查清楚。1938年7月17日,他收到陈云同志的信,内容如下:

化若同志:

我代表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你,中央组织部于7月12日正式通过恢复你的党籍。认为1932年在江西红校时,托派分子供你为托派是没有根据的,供词(是)不可靠的。

此致

敬礼!

陈云

7月17日(1938年)

6天以后,他又收到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如下的信:

郭化若同志:

关于你请求恢复党籍的问题,经过中央组织部决定1938年7月12日恢复你的党籍,就是过去被开除时间的那一段仍给你党龄。党认为你七年来是坚持了为党的路线奋斗,并且证明当时有人供你为托派中委的供词是不可靠的。请持这一恢复你党籍之决定转告总支委及本支部,并写在党员登记表上,以作根据为盼。

此致

敬礼!

总政治部组织部

7月23日(1938年)

化若同志被开除党籍7年,背着“托派中委”的政治包袱,凭着一片丹心,继续紧紧跟着党努力工作,迈着艰难的步伐,终于越过政治的雪山,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大人物”给他定的冤假错案,如果不是毛泽东和陈云同志过问,谁愿意又有谁敢给“托派中委”平反呢?

卸下了长达7年之久的沉重政治包袱,化若同志那兴奋、激动、欢快的心情是难于用语言表达的。我们在延安相见时,他都是谈笑风生,学问渊博,毫无惊惧,不愧为杰出的儒将。

1939年秋天,我离开延安,到敌后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作为聂荣臻司令员领导下的一名八路军战士,直接参加抗日战争。1942年12月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

化若同志匆匆见过几面，很少机会深谈。直到上海解放初期，我们又见面了，并且都在上海地区工作。这时，他是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司令员是宋时轮。

总前委给九兵团的任务是：“由姚沟（不含）至裕溪口段展开渡江突击，除一部兵力在芜湖裕溪口至和县段视机渡江控制当涂南北地区警戒南京可能南援之敌，钳制芜湖守敌外，主力由龙王庙至泥叉镇渡江……随后再东进至无锡地区警戒上海方向之敌，待命配合野战军主力夺取上海或单独进占上海，尔后任淞沪警备任务。”

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在国共两党代表共同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年4月20日20时，“百万雄师过大江”。21日拂晓，九兵团有7个师19个团到达长江南岸，攻占繁昌、荻港、旧县、横山等要地，并继续向纵深发展。21日夜在江中，化若同志填了《菩萨蛮》一词，气势豪迈：

素帆百万飞如箭，
乘风顷刻敌前现。
碧水静无波，
疏星夜转多。
弹飞如急雨，
难阻雄师路。
天险说长江，
功成夜未央。

胜利完成渡江任务，九兵团又参加总攻上海市区作战，任务是：“以第九兵团为主全歼浦东地面之敌，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封锁敌人的海上逃路……”在战斗中，九兵团奉命“重新调整作战部署，除以原在高桥作战之第三十、第三十一军，集中全力夺取高桥，封锁黄浦江，并以第二十军全部东渡黄浦江，攻击浦东市区，得手后再西渡黄浦江向市区攻击……”宋时轮、郭化若同志指挥第九兵团和兄弟部队，于5月27日15时完成上海市全部解放的光荣任务。

解放上海，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经告诉我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是瓷器店里打老鼠。上海，当时是中国经济与文化中心，是中国最大城市，也是世界最大的名城之一，市区曾经有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的租界，是繁华美丽的现代化城市，比做瓷器店。国民党汤恩伯奉命率领20万大军（8个军25个师）妄图守住上海。怎样解决和消灭这20万只“老鼠”，是一个空前复杂艰难的问题。中央军委对三野提出要求：既要消灭敌人，又要完整接管上海。也就是说，既要消灭“老鼠”又不能打坏“瓷器”。宋时轮、郭化若指挥的九兵团和兄弟部队一道，采取迂回战术迫使守敌撤出重要建筑物，只用步枪、机枪等轻武器歼敌，不用火炮和炸药，减少城市破坏和人民居住的损失，硬是完成了艰难的任务。打得好，也进得好，一个完整的“瓷器店”落在解放军和人民手里。当然，和上海人民与中共地下党同志的配合与保护也是分不开的。

化若同志一向注意部队的思想工作。进攻上海以前，他又抓紧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第九兵团战士解放上海进入市区露宿街头，没有惊动群众，没住民房，严格遵守纪律，给上海人民和国际人士留下了难忘的良好印象。

上海解放前夕，我随第三野战军华东局进入已经解放的沪西梵皇渡路一带，在圣约翰大学宿营。第二天大雨，愚园路积水成河，我冒雨乘吉普车到南京路和外白渡桥，苏州河那边北四川路还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上海全部解放以后，华东局在原励志社（即三井花园）办公，我在励志社遇到宋时轮和郭化若同志，相见甚欢，紧紧握手，互道别后情况。

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前委原定的计划，第九兵团司令部兼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化若同志兼任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上海军

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兼任上海市长，积极筹建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等单位。上海市公安局组建好以前，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兼管上海地方反特工作。在短短6、7两个月内，他们破获反动组织40多个，如“京沪杭警备总部”、“东南反共救国军”、“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等。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破坏金融市场，淞沪警备区司令部予以围抄打击。6月29日，根据上海市委统一布置，搜捕敌特盗匪和抗拒登记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4000多人。经过宋时轮、郭化若精细地开展反特工作，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为改造旧上海和建设新上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宋时轮同志于1949年7月底率第九兵团进行整训，重新组建淞沪警备部队领导机构，化若同志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贯彻执行“以特反特，以匪制匪”的方针，采取“内线打入，外线攻”的斗争策略，侦破“国民党总裁办公厅”第七组所属的一个特务组织和“反共救国军长江纵队”，以及武装匪特洗劫“鸿生”轮等。在短短的13个月内（1949年5月—1950年6月），化若同志指挥淞沪警备部队破获特务组织50多个，侦破敌特和各类刑事案件3626起，捕获罪犯13000多人。地上的反特工作取得重要胜利，国民党还利用空中残余力量，轰炸骚扰。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任命郭化若为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主任兼总指挥，负责保障上海空中安全，给空中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陈毅领导下，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

陈毅同志还兼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委派我为秘书长，当他的助手。当时各大区都成立军政委员会，华东局统战部和组织部筹组华东军政委员会，由组织部提出党员干部名单和统战部提出民主人士名单，以供筹备机构和大会选举军政委员

会委员讨论。化若同志作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代表,列入委员候选名单,经大会正式选举,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并在第一次会议上汇报淞沪警备部队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略举生产成绩以后,他说:“这样我们部队的生活在物价波动的条件下,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一般机关连队都能做到早餐喝豆浆吃油条,每餐都能吃两个菜,每星期能吃两次肉饺子,一个月能吃2斤多猪肉。我们全军军人都了解国家财政困难,人民负担很重,所以我们不敢铺张,仍然坚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我们部队指战员每月费用包括被服、粮食、菜金、津贴、日用品、水电费等等一起在内,每人约合30个‘折实单位’。如果拿来同上海市的公务员、警察、工人、杂役等的薪金相比,都还少得多,如果同工程师、经理、老板等每月的收入比较,则相差得不知多少倍。我们现在还在提倡节约。我们已节约了百万多斤粮食,准备拿来救济最贫苦的军属、烈属……我们为了节约水电费,在市区内开了353孔水井,连队电灯改用5瓦的灯泡,一般办公室也只用15瓦的。这样我们的水电消耗减少到平均60个人所用的消耗量,只同上海市民一个人所用的相等……”

我听了他的发言,深深感到化若同志保持红军和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培育第九兵团和警备部队,继承艰苦朴素的作风,提高指战员政治素质,形成一支既是工作队、生产队又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斗队,并且在工作(如反特等)和战斗中吸收古代兵法特别是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他在延安接受毛主席给他研究古代兵法的任务,写了文章,以后还把孙子兵法译成白话;他的军事研究工作,在国内国外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1955年6月间,化若同志离开上海,到南京就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分管军事训练工作,我们就很少

见面了。这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1961年,我因患肝炎在厦门鼓浪屿黄家花园就医,请当地著名中医治疗。原中南银行董事长黄钦书的花园左边一幢楼里,不久,便在黄家花园碰到化若同志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绍宽先生。他曾任国民党政府海军部长和海军总司令,一级海军上将。解放前夕,他拒绝蒋介石电召去台湾。福州解放后,他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华东局统战部和组织部筹组华东军政委员会时,统战部把他列入委员候选名单,由大会正式选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我和他是在此次会议中认识的。化若同志和他也早认识。我们三人同游日光岩,在海边散步聊天,话题围绕海军和解放台湾。

中国海军从晚清到北洋军阀,只有3万多吨位。后经陈绍宽所属海军努力发展10年,也不过5万多吨位。陈绍宽认为中国海岸线长达万里以上,保卫海防,要大力发展海军,特别是解放台湾,更要加快发展海军。化若同志关怀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他这次到鼓浪屿治疗神经衰弱疾病,短期休养,还花时间视察海防设施,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身分和指战员见面,指示怎样加强军事准备,巩固海防,争取早日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我们面对台湾大小金门岛屿,化若同志浮想联翩,填了《念奴娇》二阙。《海滨》,其第二下阙是:

起舞,
俯瞰沧溟,
波涛无际,
星斗胸前落。
笑指零丁孤岛上,
巧把瘟神轻缚。
隔夜炮声,
重洋烽火,
四起交相错。
东风万里,
乾坤处处非昨。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解放台湾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最后肯定统一。解放台湾以前,牵制台湾当局和美国军事力量,以支援其他地区和国家,这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巧把瘟神轻缚。”

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我被“打翻在地”,反革命“四人帮”钦定《上海的早晨》为“大毒草”,批判长达10年之久。而化若同志于1966年9月被安排到合肥“休养”,不准离开南京军区的辖区,实际是下放监护,失去自由;3年以后,干脆明文免去他副司令员的职务。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他向叶剑英元帅和毛主席申请恢复工作,经毛主席批示,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分工负责指导编写战史工作。

这期间,我们有10年多时间没有见面,直到我错案平反恢复名誉,先到全国政协后到文化部工作,参加筹组中国书法家协会,我曾到军科院看望化若同志,劫后重逢,互道遭遇,满天乌云消逝,迎来明媚的春光。中国书法家协会除选举产生理事和正副主席外,还设名誉理事若干。我代表书协,邀请他为名誉理事,他欣然同意。他多年从事书法研究,经常临池,推崇“右军笔法空千古”,“铁画银钩惊绝技,顽筋柳骨放奇花”,他便“欲自宋唐追魏晋,攀登拾级愧县差”(郭化若:《洗砚池补壁》)。虽然这首七律,吟咏的是右军书法,实际上也是他自己书法追求的注解。他谦虚称“愧县差”,实际上已形成自己的苍劲书风,达到较高的境界:“笔墨顽如铁,金石掷有声。”

往事历历在目,没想到他突然跨鹤西去。怀念50多年来的某些交往的情景,黯然消魂,展开4尺整张宣纸,写了4个大字:音容宛在。寄托我不尽的哀思。过了两天,我到陈家花园化若同志灵堂吊唁,凝视他的遗容,悲痛不已。

化若同志老伴夏宁欣同志陪我到客厅，我问她化若同志病危情况，原来他以91岁高龄，参加革命工作70多个春秋，殚精竭力，终以心力衰竭离开了。真是“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诸葛亮）。临别，她赠我《郭化若诗词选》、《郭化若书法集》和《郭化若回忆录》等书。

1995年12月8日下午2时30分，我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为郭化若同志送别，见了最后一面，他躺在花丛中安息了！永别了，化若同志！

回到家里，继续展读他的诗词，很少吟风弄月之作，也无个人悲欢离合之情，主要是歌颂革命业绩，如北伐过程、红军战曲、长征风雪、抗日战歌、解放号角、大好河山诸篇都是，咏史抒怀，不愧为革命史诗。其中《七律·征途回顾》：

离家征战几经年，
风雪关山历险艰。
帷幄频传神妙计，
沙场迭显史诗篇。
杯弓蛇影疑难辨，
碧血丹心信且坚。
六十年来多少事，
但留点墨在人间。

这是1992年他88岁所作，可以说是战斗一生的写照，表现了高尚的情操和凌云的壮志，忠贞不屈，百折不挠。纵然“杯弓蛇影”、含冤负屈，被诬陷为“托派中委”长达七年之久，而且“疑难辨”，他“内怀铁石之心，外负陵霜之节”（《北史》），“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宋·赵鼎），“碧血丹心信且坚”，始终如一。即使双脚磨破溃瘍，他也坚持紧跟长征和革命队伍走下去，一直奔波跋涉70多个春秋，到91岁高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真是“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名副其实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碧血丹心，光耀日月，永垂不朽！

（此文为作者悼念郭化若同志所作）

抗日英雄李兆麟遇害始末

● 钟子云

李兆麟同志是在1946年3月9日被国民党的特务杀害的。他是一位坚定而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位坚强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长期抗日斗争中，表现了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他在东北指挥抗日联军和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战中，也表现了他的指挥才能。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无畏，不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我和兆麟同志初次见面，是在“八一五”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上旬。当时，我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命令，带部分干部去哈尔滨市工作。而那时兆麟同志已随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中旬先期到达哈尔滨。他配合苏联红军接收了滨江省地区和哈尔滨市政权，并在苏军帮助下，组织了部分县区的保安部队，协助苏军维持地方治安、生产和生活秩序，受到了哈市及周围地区人民的拥护。我到哈尔滨后，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正式组建了滨江地区（包括哈尔滨市）14个县市范围的中国共产党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并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党委工作纲要（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地区第一次以中共的名义公开发表的文告。此时，兆麟同志被苏军任命为滨江省副省长，同时也任中共滨江地区工委委员。1945年11月16日，滨江地区工委撤销后，正式成立了哈尔滨市委，兆麟同志又参加了市委的工作。与此同时，以陈云同志为首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兆麟同志被任命为北满分局的委员，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和哈市委一起主管哈尔滨和苏军的一些交往工作。在此期间也组建了松江省委和松江省军区，主管松江省所属的14县的工作。

1945年11月下旬，苏军根据雅尔塔协定，准备将松江省和哈尔滨市的政权移交国民党。此时兆麟同志即辞去了滨江省政府副省长的



李兆麟

职务，专职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主要是帮助苏军进行各项工作，同时也在市委做其他工作。

1946年1月1日，国民党正式宣布接收松江省（滨江省改名为松江省）和哈尔滨市的所属各级政权工作，并宣布国民党省市府同时成立。哈市委即决定兆麟同志除专职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外，还以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委代表身份，与国民党的松江省省长关吉玉和哈尔滨市市长杨绛庵公开交往。当时，苏联红军尚留在北满和哈尔滨市。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兆麟同志和哈市委所做的工作。

苏联政府决定，将哈市及松江省政权交给国民党接收后，中共中央北满分局、松江省委、省军区和一切武装部队被迫撤离哈市，转移到宾县和三肇地区。而哈尔滨市委及其所属的一些机关团体，如哈尔滨日报社、市总工会、妇联、中苏友好协会等，都留在哈市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工作。这时兆麟同志除专职中苏友协和市委工作外，也同国民党进行交往。特别是1945年“双十协定”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同国民党进行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其他各方面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因此，我们在哈尔滨市同国民党

交往增多，遇到的问题也很复杂。

国民党在1946年1月1日虽接收了省市政权，但是，实际在省市范围内掌握实权的还是苏联红军。凡一切重大问题，没有苏军的允许他们是办不成的，苏军在市内实行军事管制，他们把松江省和哈市所有省市府机构的实权，都控制在他们在省市府各机关的驻军代表和苏军在哈市所组建的卫戍司令部内。如电话、电报、邮政、电力、文化、卫生、教育、自来水、公共交通、银行等，他们无所不管。

苏军允许国民党接收省市政权的条件，即只是允许他们的100余名文职人员和近300名武装保安部队经过空运来哈市接收。而其余更多的人员，苏军是不允许他们由空中航运哈尔滨的（如开始国民党向苏军要求空运两个步兵旅，随接收大员来哈市接收，被苏军拒绝了），而陆路因我军控制中长路的北段，陶赖昭车站以北的地区，他们是无法通过的。所以国民党接收哈尔滨的省市政权，连他们自身的安全也不能保证，苏军对他们的安全保卫工作也负全责。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接收省市府的各级机关之后，除去公开发布一些公告和无足轻重的法规外，主要是发展国民党员，组织特务组织和地下军，以及进行阴谋暗害活动。而他们所接收的松江省政权，除省政府在哈直接设置的各厅局机构外，其他一无所有。因该省所属松江地区的14县的县级政权都在我军控制之下，国民党无力接管各县工作。因此松江省的14县的党政军工作，仍在中共松江省委和松江省军区领导之下。

在1945年11月23日，中共北满分局、松江省军区由哈尔滨撤离到宾县，继续领导松江省所属各县进行建党、建政、建军、土改、剿匪及反奸除霸等各项工作和斗争，以建立哈市周围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准

备同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

1946年3月，经中共北满分局和松江省委决定，在宾县召开松江省临时参议会，选举了松江省政府委员会，同时建立了松江省的参议会，选出以杜光宇先生为参议会的议长，冯仲云同志为松江省政府主席。以后，松江地区也有了革命的松江省的省级政权，和驻在哈市内的国民党的松江省政府相对抗。

驻在哈尔滨市的市委在中共北满分局直接领导下，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是要和苏军驻哈市的领导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因为在国民党接收哈市政权后，哈市委能公开半公开地坚持工作，是与苏军的热情帮助分不开的。当时，兆麟同志是苏军任命的正式军官（少校），是随红军一起进入哈市的，他对苏军的各级领导都比较熟悉。而我是作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委派代表和苏军进行联系的。以后陈云同志来哈市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兆麟同志和我仍是他们的联络员。凡是遇到和苏军交往中的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陈云同志都派我们进行联系和转达。在这方面，兆麟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次是“双十协定”之后，和国民党进行的两个方面的斗争，一是在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积极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一是在城市与国民党进行各种公开和半公开的斗争。当时在哈市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党需要和国民党公开来往，相互协商在哈市地区一切可以合作的问题。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向我党所组织的各种团体，如：工、农、青、妇和工商会等公开宣传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全国的战争形势等，以广泛争取社会群众拥护我党的方针政策。因此，市委决定由兆麟同志为主，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公开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进行交往，而我以中共哈市书记的身份，有时也和兆麟同志一起，接见他们接收大员中

的主要负责人。而日常更多的和国民党的交往主要是兆麟同志。

1946年1月,国民党接收大员正式接收了哈市的省政权后,我党在全国范围内除对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外,进行着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斗争,就是围绕着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这个主题。各革命根据地都尽量争取当选代表的名额和各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在这个时候,兆麟同志和国民党接收大员接触更加频繁。兆麟同志每次和杨绰庵接头,都是由杨的秘书孙格龄(此人父亲为中国人,母亲为俄国人)负责联系、接待,已来往多次。3月9日,孙格龄以杨绰庵的名义,将他骗到水道街9号后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害。兆麟同志的牺牲,使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英勇的抗联指挥员,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亲密战友,使我党在哈尔滨的工作遭到了重大损失。

兆麟同志在任职滨江省副省长和中苏友协会长的近半年时间,对滨江省和哈尔滨市内主要工商业者和上层知识分子及社会的开明人士做了大量工作。他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噩耗传出后,全市各界人民对国民党的凶恶残暴无不切齿痛恨。在为兆麟同志举行的为期3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和召开的10万人追悼大会上,广大群众为之痛惜落泪。当他的灵柩离开中苏友协机关,由中央大街绕到道里新城大街(现在的尚志大街),近10万名群众在悲痛、愤懑的气氛中,秩序井然地目送兆麟同志的遗体送往道里公园(现在的兆麟公园)。在他被害后不久,即1946年4月27日,国民党的接收大员随着苏军的撤退而逃之夭夭,杀害他的主要凶手除孙格龄外大部落网,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孙格龄诱杀兆麟之后,在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庇护下,秘密逃离哈尔滨市,被护送到国民党统治区(以后据说她定居香港或九龙)故未能将她捕获。



1942年,抗联改编为野营教导旅。图为旅长周保中(前排左4),副旅长李兆麟(前排左2)

杀害李兆麟同志的9个直接主要凶手和暴徒,如孙铁镜、阎宗章、马建胤、高庆三、阎大纬、刘文升等,虽已大部捕获和处决,而在背后指挥这个凶案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余秀豪,因那时他身为哈市公安局局长,又是国民党接收哈市主要成员之一,我们无法拘捕他。致使他得以在苏军撤离哈市时,随国民党其他接收大员一起跟随苏军撤走,此人以后不知下落。

兆麟同志牺牲后,哈市人民以及过去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乃至他足迹所到地方的东北广大人民,都深感愤懑和悲痛。为了对兆麟同志永久怀念,哈市地方党和政府及哈市人民,将道里的水道街改为兆麟大街,道里公园改为兆麟公园,将水道街的小学 and 中学分别命名为兆麟小学和兆麟中学,以示怀念。

我和兆麟同志相处时间虽短,对他作为一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我认为是合格的,从他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组织观念、遵守党纪、观察问题的立场、方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在哈市半年多的和国民党大员接触来往中,对许多重大的原则问题,都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而国民党的当权者及其特务组织,早就预谋杀害他。第一次是在中苏友协门口,特务开枪打死了哈尔滨日

报社李钧同志,他们是把李钧误认为是李兆麟而开枪射击的。以后又用恐吓信(信内装有子弹)威胁他,妄图使他在同国民党接收大员谈判时妥协让步。敌人的这些阴谋都未能得逞,最后才用欺骗的办法诱他出来下了毒手。

兆麟同志在十几年的革命斗争中,无论是抗战初期,还是在以后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和第六军任职期间,以及任三路军总指挥时期,都以优秀的指挥员和思想政治工作领导者而著称。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和广大干部战士及其他许多战友,坚持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领导东北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和日寇浴血作战十余年,给敌寇汉奸以沉重的打击。最后为了聚集力量、保存实力,他带领部分干部战士暂时退出战争第一线。但斗争没有停止,最后跟随苏联红军反攻东北,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东北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最为遗憾的是他未战死在反日斗争的战场上,却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这个深痛的教训,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李兆麟同志的英名永垂史册。

(责任编辑 孙 中)

贺龙和他的 姐姐贺英

● 周保林 罗长江



南昌起义前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

一、晓大义不报族仇

1919年盛夏，与贺龙一起到慈利搞过枪的自家亲戚谷青如，暗中勾结“湘西王”陈渠珍，想杀掉贺龙，拉开队伍搞独立，掌兵权。一天中午，太阳如火。贺龙搞完军训，与大姐贺英在王家大屋营房休息。谷青如见有机可乘，掏出尖刀，正欲动手。被楼上的贺英发现，厉声喝道：“青如，青天白日，你饭吃多了是噉？”谷见势不妙，夺路即逃，慌张中掉出了一把尖刀。贺英从楼上跳下来，拾起凶器。贺龙问她：“是哪个长毛的角色？”贺英道：“除了谷青如还有谁？”贺龙气不过，手提左轮，追了出去，凶手早已逃走了。

谷青如未杀贺龙，贼心不死。农历七月十五日，谷青如收买巫师王朝章，乘贺龙不在家时，聚众烧了贺英的房子，提出要消灭贺子贺孙，把贺家斩草除根。经过一夜烧杀，烧了历史悠久的贺家桥（即贺龙桥），烧

毁房屋两百余间，受害殃及48家，残害致死者30多人，其中贺龙亲属14人。等贺龙与贺英领兵杀回家后，在群众的帮助下，追杀了王朝章等首恶分子。虽然暂时平定了内乱，族人却议论纷纷，说什么“出了一条龙，害得全族穷”，“一人玩枪，全族遭殃”。贺龙含着泪水，强忍悲痛，逐家上门劝说乡亲：“人家不是要我们贺家绝子灭孙吗？断我们的炊烟吗？我们不仅没断后，反而烟火更旺了。”

1919年5月，贺龙为了扩充武装，通过堂叔贺勋臣在沅州镇守使王子涵身边工作的关系，向王子涵说情，要他调拨300条枪和弹药。并派副官贺植卿去送重礼以换枪弹。其父贺仕道怕此事办不妥，决定与儿子贺文掌一同前往。谷青如探知这个秘密，勾结土匪陈继之、柏家厚，埋伏在三人潭的峡谷口前，将贺仕道杀死，活捉到贺文掌后，用甑子蒸得骨肉分离。噩耗传来，群情激愤，都异口同声提出“血债要用血还”。贺英身跨高头大马，双手挥枪，直奔谷家，先砸了谷氏祠堂，弄得谷

家一时惶恐万状。而贺龙却是冷静异常。贺英质问贺龙：“你是有名的孝子，不为父、弟报仇，还待何时？”好一会，贺龙才对贺英说：“我的好大姐，这个仇，我贺龙不能报！”族人几百双眼睛逼视他：“此仇为何不能报？”

贺龙望着大姐，望着族中众人说：“贺谷两姓儿女亲家，世代通婚，已是亲上加亲。如果他杀我，我杀他，杀得个乱七八糟，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到头来是我们自己杀自己，世代代代结冤仇。”一席话把大家说得服服贴贴。

贺龙将一场大型的家族械斗风波平息了。谷家人更加敬仰他，而痛恨谷青如，骂他是谷家的败类。

二、中奸计谷虎丧生

谷绩廷（谷虎）自常德同贺龙被敌军打散之后，他毅然回到了鱼鳞寨，当他的山大王。

由于谷虎一心为贫苦农民谋

利,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他的义旗下,很快有了300多人,200多条枪。谷虎在贺英的建议下,以鱼鳞寨为根据地,采取了有点有面的办法,时而住进县城,时而转战附近的大庸、慈利、鹤峰、石门、龙山、永顺等地。贺英,身着戎装,腰挎双枪,英姿飒爽,每过街穿行时,无数钦佩的目光注视她,称他为“女团长”。

谷虎的强大,使“湘西王”陈渠珍感到不安,传入他耳中是湘西出了一条龙(贺龙),一只虎(谷虎)。便多次派出便衣队对谷绩廷行刺。有次贺龙亲手抓住一个刺客,据刺客交代就是奉陈渠珍的旨意而来。贺龙赶忙将情况告诉贺英,要姐夫多加小心。谷绩廷却说:“我乃湘西的一只神虎,谁敢把我怎么样,他陈渠珍充其量只是条野牛罢了。”陈渠珍见来暗的不行,便明目张胆派兵进剿,幸好有贺英在身边,多次化险为夷。

1922年重阳那天,驻防洪家关的一个姓满的连长,因受陈渠珍的重金贿赂,以过去的交情,请谷绩廷下山赴宴。贺英不放心他去,他却说满是个诚实好人,不顾妻子劝阻,带个随从下山走了。满连长笑中藏刀,在他酒醉之后,又用鸦片招待,被满亲手杀害在床上。

噩耗传来,贺英哭得死去活来。回忆两年前的5月,父亲贺仕道为支持贺龙扩大武装队伍,带着小儿子到别地运军火,父子俩惨遭陈渠珍暗算,丈夫谷绩廷今天又死在陈渠珍的屠刀下,她心如刀绞枪刺般的难受,对天呼叫:“老天爷你为我作主,我要亲手杀了陈渠珍这个魔鬼!”

贺英回到鱼鳞寨,众弟兄将她围在中央,异口同声推选贺英作了鱼鳞寨的司令。贺英当司令的第二天,就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表示做大姐的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干下去。

三、化干戈胸怀似海

1925年初春季节,贺龙驻兵沅州,正准备挥师北伐,却为队伍力量不足,枪弹缺乏犯愁。一天,贺龙与谷敦武、谷青云等几位旅长及幕僚陈图南、严仁珊等商议如何扩大队伍之事。谷青云说,沅州附近活动着一支民间武装,有几百条枪,可惜没有合适的人去召得他们拢。幕僚说:“人倒是有一个,就是只怕师座不肯买账。”

贺龙急问:“谁?”

“这个人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柏家厚。”

就在贺龙沉思之时,几名旅长愤然提出:“柏家厚是师座杀父仇人,恨不能抓来也活蒸了,哪里能够去请他……”还有人提出将柏家厚先抓起来逼他就范,然后再杀掉他。

“不。”贺龙将手一摆,对大家说:“孙中山先生委任我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现在厉兵秣马准备北伐,怎能以个人私仇影响国家之大事,先生之主义?”说罢,将孙中山1921年12月给他写的信拿出来给大家看,只见信上写道:

云卿先生鉴:

周参谋持来大札,备悉一是。边陲久戍,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真可为干城之寄,当勉望于无穷者也。

川中久苦内战,迺来以各将领互开诚悃,共企新图,遂有开发实业计划,前各有书来陈说,文曾力赞其成,不独为弭息内争,昭苏民国之要图,而给养有恃,简练益精,一俟会讨有期,建瓴而下,且可襄成大业,幸协图之。

我驻闽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须出讨。驻桂之张、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遁。望秣马待时,共戡大难。此复。

即询 戎绥。

大家见贺龙如此博大胸怀,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贺龙令通讯员取来笔墨信纸,亲笔给柏家厚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现革命已进入高潮,希你同我们一道参加北伐,并请将近那支武装拉入编内,你看如何……”

柏家厚见信后,始而惊愕,继而大受感动,对送信幕僚说:“请转告贺师长,他这样宽宏大量,不计私仇旧怨,家厚敢不尽心力以效犬马之劳?一定不负师座委托。”

柏家厚几经努力,终于把那支队伍拉了过来,他本人和那支队伍一同参加北伐,贺龙还让柏家厚当了团长。柏家厚念贺龙不仅不杀,反而委以重任,作战英勇,屡战屡胜,几次受到贺龙嘉奖。

贺龙部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一路上节节取胜,赶走了唐荣阳,就任了沅州镇守使。贺英闻讯北伐胜利,信心百倍,带上由她联络的各地武装进驻桑植县城,赶走县官,打开城门,各界人士以隆重的仪式,欢迎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第九军第十五师进入桑植。商界人士,还抬来了巨匾,上书“仁义之师”四个金字,还请当地才子廖茂才作了一副对联,嵌在金匾两旁:

“贺来其苏箪食壶浆以迎,龙行于野大地草木皆春”。

贺龙当即张出了安民告示。从第二天开始,收拾残匪,痛歼“神兵”,赈济灾民,维护治安,并对奸污民妇的贺占卿当众处决,此举深得民心。柏家厚对贺龙说:“如此看来,你硬是一条真龙啊!”贺龙笑道:“我要是条龙的话,还是少不了大家为我涨水啊!”

身为大姐,贺英只是对贺龙居然能够容忍,并且重用有杀父杀弟之仇的柏家厚,实在无法苟同。就是贺家家族也表示反对。夜深人静,贺英与贺龙灯下对坐,贺英开口了:“云卿你倒好,当了师长,当了镇守

使,可把祖宗都忘了。”贺龙说:“我的好大姐,祖宗我忘不了,更不会忘记我尊敬的父亲,我此次回来就要给他老人祭坟。”

贺英面带怒色:“没忘就好,那干么起用仇人?”贺龙说:“大姐你想,我贺龙从两把菜刀起家,哪一步不是靠大家的力量去度过难关?要不是大家为我出力,我就有三头六臂也干不了。如果我杀了谷青如,谷家就会反对我,他们就会横站起,与我们为敌;如果我不起用柏家厚,他会将那支队伍拉过来为北伐出力吗?”

贺英是个明白人,见弟弟这么一说,也当然理解了贺龙的一片苦心。

就在北伐取得重大胜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叛变革命,扬起屠刀,砍向革命人士和兴起的军队队伍。贺龙气得连饭也吃不下,骂道:“他老蒋搞什么鬼?”

四、去找汪精卫评理

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回到武汉寓所。他送走贺英等姐妹后,边抽烟边在房间里踱步,心中说:“讨袁战争流产了,护法战争夭折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眼看又要归于失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我贺龙下一步该怎么走,走向何地?”

突然,一阵急骤的警车啸叫声。他打开窗帘,借着灯光,发现警车上抓的全是工人。贺龙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始而惊,继而怒,愤然对警卫员说:“走,找汪精卫去!”刚出门,听人说汪精卫已不在家。贺龙气极了,抓起电话,直接与汪精卫通话,开门见山质问道:“街上正在抓人,而且抓的是工人呀,这件事你知道吗?”汪精卫却毫不在意地回答:“三教九流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

杂嘛,抓几个人算什么?”

“可没有工农大众的支持,我们的北伐战争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吗?”

“你是国民政府的军长,关键时可不能意气用事,一失足将成千古恨,你懂吗?”

贺龙再也不想说下去,“啪”地一声搁了听筒,由于未放稳,听筒悬在空中晃荡。他怒气冲冲地骂道:“他汪精卫不知在搞什么鬼?”其实贺龙哪曾知道,他早成为汪精卫的眼中钉了,敌人正在背后策划如何干掉他。

五、“子弹杀不死贺龙”

范二楞奉命前往刺杀贺龙,谁知贺龙睡觉奇怪,睡着了却像张飞一样,眼睛是睁着的。范二楞来到了贺龙面前,迟迟不敢举刀,刀在手中颤颤难落。当他刚要刺下去时,贺龙一个翻身,脸已朝外,微光下双目闪闪发亮。范二楞以为贺龙醒了,匕首“铛”的一声落在地上,这才将贺龙惊醒。贺龙发现地上的匕首,一切都明白了。他知道这里面必有后台,下床将范二楞扶起,反而安慰他说:“别怕,有话慢慢讲吧!”范二楞只好如实交代说,是一个他不认识的黑大汉指使他干的。贺龙对他吩咐了一番。

范二楞向黑大汉回话说:“这事我不敢干,他是一条真龙,两目发光,我一看骨架子都散了。”黑大汉说:“尽说鬼话,看我去取他的首级。”又对范二楞说:“你看那对面是谁?”范二楞一掉向,黑大汉将他一刀杀了。然后提起手枪直奔贺龙卧室。警卫洪长林把守甚严,黑大汉便取出催眠药朝洪吹去,顿时将洪熏倒在地。黑大汉一进贺龙卧室,只见贺龙睡在床上,一件大衣盖在上面,他朝被子连开三枪,然后动手去掀

被子。这时,有人用扇头敲了他一下,他吓得浑身一紧,回头一看是王炳南,还没回过神来,贺龙从屋角里闪出来下了他的枪,讥笑道:“这子弹不假嘛,么子杀不死贺龙呢?”

翌日早晨军训完毕,正欲解散,贺龙突然来到操场,放大嗓门对全体士兵说:“我们十五师出生入死北伐河南,威震逍遥镇,不少弟兄浴血沙场,长眠于地下。可是,参谋长却居然打起我脑壳的主意。”全场官兵惊愕,感到突然。参谋长陈图南强装镇定:“军长,我跟随你多年,忠心耿耿,你怎么可以加害于我……”

贺龙一扬手:“带刺客!”王炳南押上黑大汉。陈图南在铁证面前,浑身如筛糠一般,瘫软在地。王炳南指挥两个士兵将他们拖走,“砰砰”两枪结束了这两个败类。

六、回故乡东山再起

陈策勋、陈黑早对贺龙怀恨在心,这次贺龙处决了他的叔父陈图南,更是仇上加仇。他知道不是贺龙的对手,决定对贺英下毒手。他们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向贺龙家乡反扑。

1927年10月,陈策勋调动了600多人围剿贺英,他们高叫着:“不抓到贺英决不收兵!”贺英骑在一匹大马上,双手挥枪,指挥队伍边走边打,进入割耳台贺英外婆家隐蔽下来。

贺龙于南昌起义之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组织的安排,带上部分骨干力量回老家组织武装。

大家一起来到洪家关。贺英见贺龙那衣衫褴褛的样子,十分心痛。贺龙说:“大姐,不瞒你说,如今老弟是个光棍司令了,一无人,二无粮食喽!”

贺英追问:“你讨蒋的人马呢?”

贺龙答道:“南昌起义失败后,

人马死的死，散的散，我只好和逸群到上海去找共产党。”

贺英要贺龙脱下破烂的衣衫，为他缝补，边缝边继续问他：“如此看来，你现在是一无所有了。”

贺龙拍拍自己的头：“我头上还有一顶红帽子。”贺英一时未弄明白，两眼呆呆地望着他的头顶。贺龙兴奋地说：“如今的贺龙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周逸群对贺英说：“大姐，我告诉你，云卿是在蒋介石举起屠刀砍共产党脑壳时加入共产党的。当时党内不少人退党、叛变，而云卿却在这时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要求入党。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就凭这一点我作了他入党的介绍人。”

“你们这次回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此次回来是受党组织的派遣，要在湘鄂边区拉队伍，搞暴动，红色割据湘鄂西。”

一会儿，贺龙要召集的人在贺氏祠堂都来齐了。先是周逸群在马灯下向大家作鼓动工作。这时，贺龙站起来对大家说：“告诉你们一件事，逸群已写信回家，将房屋田地全部交给穷人了。”众人都用惊奇的目光望着周，周接过话说：“俗话说，孽财归孽路，破衫归当铺。闹革命就要彻底，留个尾巴干什么？”

贺英霍地站起来：“我把自己的队伍全部交出来，作我一点见面礼。”周逸群与她热情握手：“党太需要你这个礼物了，谢谢你，好大姐。”

他的话刚毕，王炳南进来了，对贺龙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回桑植拖队伍，这次听说你们来了，我把队伍都带来了。”贺龙急切地问他：“多少人枪？”王炳南说：“380个兄弟，170条长枪，9支短枪，还有80匹骡马。”贺龙抓住他的手，连说几个“好”字。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贺龙：“严司令准备投奔你来的，途中被陈黑绑

了。”

贺龙拍案而起：“不幸这个丧门星，没人敢参加桑植起义了。”

七、单骑孤胆会陈黑

掌灯时分，贺龙头戴草帽，腰缠手中，身藏短枪，要去会陈黑。贺英、周逸群觉得他这样去太危险，要他带个帮手去。贺龙说：“他陈黑非常狡猾，我那样做，能进去吗？我自有机办法的，放心吧！”贺英没法，只好对周逸群说：“我们接应他吧！”

陈黑的驻地营房门前，一盏马灯闪着光亮，哨兵在转悠。贺龙大摇大摆地向哨兵走去。

警觉的哨兵，端起长枪，喝问：“什么人？干什么的？站住！老子开枪了。”

贺龙凑上去神秘地说：“我是洪家关的人，贺龙要偷营了，我有重要情报报告陈副团长。”

就在哨兵进去报告之时，贺龙一个箭步跨进了第二个哨卡。那个哨兵欲要问话，贺龙抢先说：“我有急事找陈副团长，别罗嗦。”那个哨兵以为是上司微服私访来了，也不敢多嘴。

陈黑吸过大烟，正在瞌睡，迷迷糊糊只见一个陌生人闯进来，吓得一惊，本能地伸手去取挂在墙上的短枪。贺龙眼疾手快，早已夺枪在手，然后摘下草帽，陈黑定睛一看，来人竟是贺龙！连忙下床跪在地上直呼：“军长饶命！”

贺龙玩着手枪：“你不是天天要捉我贺龙吗？今天我亲自送上门来，任你处置吧！”

陈黑赶快叩头：“请军长息怒，那纯属谣言，我们兄弟都是你的部下，怎会干那个伤天害理的事呢？”

“你愿干坏事？”

“小的不敢。”

“那就干点好事喽！”贺龙敏捷

地摘下墙上的几支手枪：“这几支家伙送给我行吗？”“行，行，行。”“那陈家坪的严司令呢？”“他被关在房子里的。”“放掉他行吗？”“放，马上放。”

贺龙说：“既然如此，你陪我走一趟吧？”陈黑从地上爬起来：“这就去，这就去。”

陈黑上前，手提马灯。贺龙在后，短枪顶住他的屁股。

贺龙轻声对陈黑说：“要他们都滚开。”

陈黑挥手喝道：“快走开，挡在这里干什么？”贺龙给严司令松了绑，又将草帽摘下，使严认清他的面目，严司令扑过来，泪水落在他肩上。贺龙将缴来的手枪给他一支：“我一定替你收拾这个坏蛋。”

不料陈黑趁机操起板凳，砸了马灯，从后门溜走，边逃边叫：“抓贺龙，抓贺龙！”贺龙后悔大意失荆州，拉起严司令夺门而跑，陈黑的营房枪声四起，四处叫喊抓贺龙。这时，前来接应的贺英、周逸群带着人马，接上了火。陈黑不敢恋战，只好收兵。

由于严司令领头，几天洪家关已集合了3000多人的大队伍，一个个头缠红巾，腰系红带，大刀柄上吊着红绸，好不威风。贺龙带头唱着贺锦斋作的《起义歌》：“老子本姓天，家住桑鹤边。有人来抓我，除非是神仙。刀口对刀口，枪尖对枪尖。有你就无我，你死我上天。”

1928年3月30日，特工委将起义部队召集于洪家关整编，将“劳农军司令部”改为“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贺锦斋任师长，编两个团，贺植如、李云卿分别任团长，还编六个中队，由王炳南、贺炳南、刘玉阶、文南甫任中队长。4月2日，工农革命军由贺龙指挥，揭竿而起，后分三路向县城进发。县城守敌陈策勋、团防局头子张东轩及县长陈佐卿抵挡不住，只好连夜逃出城门。工农革命军不到一

个小时,攻占了桑植县城,一面绣着镰刀与斧头的红旗飘扬在桑植的上空。

八、反围剿绝处逢生

4月3日,久雨天晴。特工委在桑植县城隆重举行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桑植县革命委员会”诞生。全县上下,一片欢腾。

4月15日,敌独立三十五师师长陈渠珍令向凤翔、姜文周两个团和四十三军龙毓仁旅,分别向桑植县城和洪家关进发。贺龙急忙召开迎战工作会。周逸群用棍子指着军事地图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只有在梨树垭、双溪桥阻击敌人,才能保住县城,保住洪家关。”贺龙一声不响地抽烟。贺英望着周逸群说:“把梨树垭的战斗任务交给我们几个姐妹吧!”周逸群说:“看军长的意见。”贺龙点点头说:“让王炳南一同去守梨树垭。”

下午1点左右,战斗打响了。王炳南与贺英死守梨树垭,贺龙亲自与贺锦斋领兵战斗在双溪。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国民党部队军官威逼敢死队拼死冲锋。他们仗着大炮的优势,疯狂地向贺龙部队开火。突然,一颗炮弹落在离贺龙不远的地方爆炸,警卫洪长林一把推开贺龙,炮弹炸开一片泥土,落在他们身上。接着又是一颗炮弹落在贺龙面前,不等它炸响,贺龙就将其一脚踢开:“牲口让路!”

有信来报:洪家关失守了,敌人进关后烧杀淫掳,鸡犬不留,并扬言要将贺龙绝子灭孙,将贺氏祠堂打个稀烂。义军伤亡很大。针对这一情况,贺英主动向贺龙提出,她决定为起义部队作好伤员的转移工作。征得贺龙同意后,她便采取边战斗边撤退的办法,往她的外婆家乡——鹤峰割耳台转移。贺龙领着工农革命军退到凉水口、罗峪一带。周逸群与贺锦斋留在原地指挥。穷凶极恶的敌人,紧追不舍,周逸群、贺锦斋只好退到深山老林的苦竹坪。

5月初的一天,天下大雨,山洪爆发。工农革命军已处于粮尽弹绝之境,部队伤亡惨重。追赶来的敌人,叫喊着:“抓住贺龙,抓住贺龙!”贺龙沉着迎战,突然,一颗子弹飞来,把军帽打飞。他火了,从战士手中接过机枪,一阵猛扫,打退了追兵。雨越下越大,敌人无法再战,贺龙得以脱险。第二天,陈策勋在追究谁让贺龙逃脱的责任时,那个军官说:“贺龙差点被我捉到,可就在这时,涨大水,他变成一条真龙腾飞了。”

贺英将主力部队交给贺龙以后,其主要任务一是牵制敌人,使贺龙他们摆脱尾巴;二是做好伤亡人员的安置工作。她神出鬼没地出现在某个地方,有时骑着大白马,身挎双枪,公开和一些地方武装进行谈判;有时化装成卖针线的小贩,串乡走寨,或突然出现在大户人家小姐家中,通过小姐引见,会见团防老爷;有时扮成农村妇女,割牛草,或扯猪草,攀岩越涧,钻山入林,进入绿林好汉的窝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投靠贺龙;有时又女扮男装成富商,与一些阔老板交往,乘他们不备时,掏出短枪,顶住对方的背逼他交钱……因此,敌人都畏惧她三分。可贫苦人民都喜欢她,亲切地称她“贺司令”或“贺大姐”。

贺英以割耳台为据点,将20多人的小队伍,都训练成为轻骑兵、神枪手,人人使双枪、跨骏马,经常活动在桑、鹤边界。心狠手辣的敌人追不到贺英,就将贺英的干将徐焕然的妻子抓走,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要她交出贺英的下落。徐妻宁死不开口,惨遭敌人杀害。徐焕然闻之悲恸欲绝,伏在贺英胸前大哭,贺英也流下了泪水,安慰他说:“此仇我们报定了。”果然第二天,贺英只身一人,闯进匪巢,取了两个凶手的首级,为徐妻祭了坟。

(责任编辑 丁 末)



贺龙与家人合影

饮誉中外的正义法官

梅汝璈

● 王俊彦



梅汝璈法官

功昭于世

梅汝璈 1904 年 11 月 7 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县朱姑桥梅村。1924 至 1928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就读，取得法学博士学位。1929 年游历欧洲回国，先后在山西大学、天津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讲授英、美法律、民法概论、刑法概论等课程。1933 年至 1934

年，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1935 年至 1946 年春，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兼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副主任及《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并曾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及司法部法官训练所，讲授英、美法律等课程。

1946 年春至 1948 年底，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1948 年 12 月，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梅汝璈看透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本质，在东京发表公开声明，拒绝到任，设法与中共地下领导人取得联系，走上光明之路。

1949 年 6 月，梅汝璈秘密由东京到达香港，立即与中共驻香港代表乔冠华取得联系，由乔冠华安排，在香港 4 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明确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之情。经乔冠华等人安排，梅汝璈化装成英籍货轮“大中山”号的验货员，于 1949 年 12 月 1 日深夜，乘一艘小划子登上英籍货轮，开往青岛，转赴北京。

到达北京后第三天，他就得到大红请柬，请他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

梅汝璈有幸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那动人的丰采，热情洋溢的讲话，都使梅汝璈终生难忘。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周总理竟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刚从东京、香港回到北京的他：“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大家知道，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了将近三年，对侵略我国的大战犯给予了严正的判决。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周恩来的崇高赞誉，激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使梅汝璈热泪盈眶。

梅汝璈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担任新中国外交

部顾问兼条约委员会委员,被推选为外交学会常务理事和法学会理事;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1959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任过政协国际问题组副组长,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对日和约组召集人、日本问题组组长及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中埃友好协会理事、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委员,还被聘为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

1957年,他在外交部老专家座谈会上坦率地向中共进言:党的领导是不容置疑的,这几年的工作成绩也是显著的。但是,党领导一切并不等于党包办一切,党的领导应该和行政管理分开。党应该给人民代表大会以实权。奉苏联为神明,把苏联专家的话当作金科玉律,这是严重的教条主义。

在当时的极“左”环境下,他因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当时他年甫六旬,从1962年9月开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共50万字,预计1968年告竣。岂料1966年6月动乱骤起,梅汝璈因在国民党政府任职而遭受审查批斗,所有文稿都被当作罪证予以没收并横遭批判。他原订的写作计划无法继续实施,许多没来得及抄录的手稿和资料都踪迹杳无。老先生本人也于1973年4月在抑郁中悄然辞世。

直至1988年6月,梅先生倾尽心血撰写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并有倪征璈、王铁崖两位法学界巨擘热心作序。倪征璈在序中写道:“梅小璈(梅汝璈之女)君前来嘱我为梅先生遗稿作序。我对40余年前事恍如隔昨,遐想联翩,借此寄语东京旧雨,望各珍重,为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到最后息。如有机缘再能叙首一堂,共话当年崎岖道路,为梅先生此稿续裘补遗,宁非理想中事!”

团结作战

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当年42岁,中国其他司法人员多为20多岁的小伙子,都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满腔报国之心。但到东京一看,由于当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不重视搜集日本战犯的罪行材料;美、日右翼势力又极力包庇日本战犯,使日本战犯极为猖狂。中国司法人员处于有冤无法报的境地,便都把希望寄托在梅法官身上。倪征璈回忆说,由于梅先生年岁比我们大,早已是久负盛名的博士,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又为人正直,有事都愿同他商量,梅先生就成了中国司法人员的核心。

派往东京盟军总部的中国联络官王将军和在东京考察的中央大学顾校长,举办小型宴会,鼓励梅先生和中国司法人员的正义之举。酒过三巡,王将军拿出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献给梅汝璈。

梅汝璈晓得赠送此剑的不同寻常的意义,激动地深施一躬说:“常言道,‘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是我非壮士,受之有愧。”

顾校长赶快讲明赠剑的深刻含义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璈双手接过宝剑,猛地拔剑出鞘,看着寒光闪闪的剑锋说:“中国戏文中常说‘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这些日本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之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梅汝璈把中国司法人员召集到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以民族大义鼓舞士气说:“这班日本战犯,高唱民族优越的论调来毒害日本国民,挑起远东战火,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死于他们之手,如今面对法庭,他们还不认罪。我等受亿万同胞之托,理当郑重执法,决不能放松警惕,否则就无颜去见江东父老!”

梅汝璈带领中国司法人员,分头到盟军总部、日本图书馆、日本外务省等单位查阅档案和报刊资料;还派首席秘书裘绍恒回国搜集证据,带回证人;又秘密制订审判方案。为防止日本侍者偷听,特意把重要战犯编了代号,如把板垣征四郎称为“板老四”、“板完”;把土肥原贤二称作“土匪”、“土老二”,从而为开庭审判准备了充足的“子弹”。

为国奋争

在东京法庭上,美、英等帝国主义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总想降低中国的地位,在法官座次安排上绞尽脑汁,玩弄诡计,设想出按国名英语字母顺序,或按法官年龄等方案来实现他们的阴谋。

梅汝璈半认真、半开玩笑提出中国的意见说:“我看依照日本投降书上受降签字的顺序安排座席最为合理。如果庭长和大家都不赞成这个办法,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梅法官的话引起哄堂大笑。东京法庭庭长韦勃笑着说:“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进行拳击比赛。”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1 国法官合影。前排坐者(自左至右):帕特里克勋爵(英)、克萊默将军(美)、韦勃爵士(澳)(庭长)、梅汝璈博士(中)、柴阳诺夫将军(苏);后排立者(自左至右):巴尔(印)、罗林(荷)、麦克杜哥(加)、柏奈尔(法)、诺斯科夫特(新西兰)、哈那尼拉(菲)

梅汝璈也笑着回答:“假设不照受降签字的顺序,我认为这是唯一客观可取的标准。纵使我被置于末座,也当心安理得,并且可以向我的政府有所交代。他们决不会对我感到不满,如果他们要让中国得到较高的席位,就必须派一个比我肥胖的人来替代我。”

梅汝璈就这样以灵活战术,达到使中国排在第二位的目。但在 1946 年 5 月 2 日,东京法庭进行“预演”时,庭长却宣布英国排在中国之前,顿使十国代表感到愕然。中国、加拿大最为愤慨,梅汝璈首先表示反对说:“这个安排是荒谬的,它既非按照受降签字的顺序,又非按照联合国安理会五强排列的次序,亦非按照一般国际会议以国名字母先后排列的次序,用意何在,殊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并不拟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

梅汝璈说罢,愤然离开预演场,回到中国法官办公室,脱下厚厚的黑色緞制法袍,挂在衣服架上,以示坚定

的决心。此举大出英、美法官预料。

韦勃庭长见加拿大法官也提出抗议,感到事情难办,就赶快跑到中国法官办公室,陪着几分小心说:“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要英、美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律程序熟识一些,纯粹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着想,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联和法国之上,是五强的中坚。”

梅法官振振有辞驳斥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居中的必要!假使有的话,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的法官又被挤在两边呢?”

韦勃知道中国当时与苏联关系非常对立,又以此为借口劝道:“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法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对你将是很愉快的。”

梅汝璈一眼就看穿了韦勃庭长的不光明磊落的用

心,正色驳斥说:“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非常沉重而又严肃的任务,决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至于说到俄国人,我们中国人并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厌恶或者害怕他们。我觉得我们这位苏联同事有说有笑,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庭长韦勃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威胁说:“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于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

韦勃这话确实厉害,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确实使梅汝璈心寒,但他置个人荣辱于不顾,正颜厉色回答:“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决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它应有的席位竟会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日本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真正是盟军最高统帅做出的。”

梅汝璈边说边故意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做出急于要返回帝国饭店的样子。韦勃被抓住了把柄,只得央求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十分钟我就回来。”

十分钟后,韦勃回来花言巧语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个会讨论一番。”

梅法官一眼看穿了韦勃的诡计,毫不让步说:“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师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奇,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座席的顺序,但是我们法庭之所以设立以及它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按照受降国家签字先后的次序安排席位,是唯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事我已在法官会谈中提过多次,多数同事们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再看开法官会议是不必要的。唯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决不参加。至于我将来怎样办,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它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请它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

梅法官说罢,又故作要离去之状。韦勃见他的计谋又遭破产,只好拦住梅法官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就来。”

不到十分钟,韦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对梅汝璈说:“大家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的次序进行。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

梅汝璈这才去参加预演,但仍担心韦勃打着麦克阿瑟的旗号再硬性改变。到1946年5月3日上午9时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时,韦勃庭长正式宣布:“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以后行列和座席的顺序就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进行。”

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特意讲到他争座次之目的:“我们在这里较详细地叙述了一下法官席位的斗争,其目的不是要夸大斗争胜利的意义,而是要从这个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和得出正确认识。首先,必须认识到: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排场的明争暗斗是经常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地位、荣誉和尊严,不能把它当作细枝末节,以为无关宏旨而淡然置之。其次,必须认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虽一跃而跻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但是它依然到处遭受压制和歧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和剥夺。在腐败无能的蒋记政府统治下,中国一直处于这种境地。这就说明,在那时要维护中国权益便需要进行更坚决更艰巨的斗争。最后还要认识到的是:在进行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中,立场必须合法合理。站稳了合法合理的立场之后,便应该有寸步不让、坚持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当然,也要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后果,临机应变;如果有勇而无谋,仍然是无济于事甚至败事有余的。”

严惩祸首

梅汝璈重任在肩,不仅为祖国争第二名的审判座次,而且力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日本战犯的审判权。

梅法官深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庭规规定,每个甲级战犯都要有确定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而检察官对所审战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梅汝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争到对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的审判权之后,又争对板垣征四郎的审判权。检察长季南把板垣分给了菲律宾,不同意再做改变。由于梅汝璈、向哲浚再三与季南争论,才使板垣征四郎最终掌握在中国司法人员手中。

由于梅汝璈等人和各国法官的长期奋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8年11月12日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通过美国律师罗甘、

史密斯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麦克阿瑟命令延缓执行判决,并将他们的申请转到美国最高法院,而后者竟予以受理。

梅汝璈认为,这是无视盟国权利的越权干预行动,而且这两人得以幸免后,其他5名战犯也将获释。对此,梅汝璈挺身而出,在东京发表公开讲话说:“如若代表11国的国际法庭所做出的决定,还要由一国的法庭重新审理,不管这一法庭有多高,也不禁会使人担心,任何其他国际行动都同样会受到一个国家的任意重审和改变。”

在梅汝璈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下,美国最高法院于1948年12月20日发表驳回判决书称:“为上诉者宣判罪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系由麦克阿瑟元帅所成立者,而麦克阿瑟则为联合国远东盟军最高统帅。职是之故,不论美国政府所属之任何法院,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上诉者所下之判决与宣告,一概无审查、承认、排除或使其无效之权限。”

这样,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才于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

再审战犯

1956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中国人民最高法院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准备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特请梅汝璈为顾问。

梅汝璈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认为这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对日本战犯的严正审判,与美国控制的东京审判大不相同,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更不可同日而语,一定要审出中国人民的风格和水平来。

他作为沈阳、太原两个特别军事法庭的顾问,废寝忘食地工作,日夜搜集资料,总结东京审判的经验与教训,向法庭司法人员传授法律知识,提供审判经验,讲解日本情况,帮助制订审判方案,解决审判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受到人们的称赞。

1956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17名日本战犯的判决宣布后,梅汝璈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中国国际法学家资格,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新华社和各大报刊以显著地位刊登,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梅汝璈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是正确的,最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于17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判决也是正确的,本人完全同意。毫无疑义,中国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处理是严正的,同时也是非常宽大的。不但对于极大部分在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中罪行较轻和悔罪表现较

好的可以免于起诉、释放回国,而且就是那少数罪行严重、交付审判的分子也将获得从宽判处。我国特别军事法庭最近宣布的判决对他们不但没有判处死刑,而且也没有判处无期徒刑,仅仅判处了不同年限的有期徒刑。就是这少数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战争犯罪分子,如果有良好的表现,将来也可以获得提前释放。这种宽大的处理是人民中国伟大胸襟和高度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同时,它也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和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利益的。这种史无前例的事情只有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才有气魄做得出来。

梅汝璈说: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我们这次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判决虽是十分宽大的,但是作出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的侦查、公正的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获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它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同时也照顾到法律正义的要求的。

梅汝璈接着说:不必讳言,60年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人民所欠下的血债确实是算不清的。他们在中国所犯的罪行是数不胜数、书不胜书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长期侵略,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着极其惨重的损失。远的且不谈,只就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止,仅在这八年之中,我国人民所遭受的生命损失、财产损失价值是难以数计的。1937年冬南京沦陷后六个星期,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为证据确凿、有案可稽的被屠杀的中国人民就在20万人以上,全部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其中大多数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对日本战争罪犯们的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中国人提起来是没有不切齿痛恨的。

但是,梅汝璈说,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以上了,在这十年中,国际局势和中日关系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在我国羁押的日本战犯并不是发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而且他们在长期羁押期间,极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觉悟和转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对他们采取宽大处理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为了和平的长远利益,我们应该着重看到未来,而不要只看到过去。我们这种处理表示着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极端豁达的胸怀和愿意同他们友好合作、和平共处的真诚愿望。

梅汝璈最后说:总的说来,我国政府的宽大措施,对于增进中日友好和保卫远东和平不但不会带来丝毫损害,而且会产生一定有利的影响。同时,这样处理对于进一步地和缓国际局势和进一步地打击战争阴谋,也会产生一定有利的影响。

(责任编辑 焕 然)

有关记述长征故事的故事

● 辛 平

长征是一首不朽的史诗，历史记下了创造这一史诗的每一个人。曾为介绍这一史诗给世人的人，不是也很值得记述吗！

一、第一份记载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文献

1935年3月29日，红军在夺取了泸定桥之后，党中央的部分领导在泸定县境内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泸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人。会议分析了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向北走雪山草地，与四方面军会合；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事实上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只是一个名义，其真实目的是派时任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适当时机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以便使共产国际及时了解解除军事顾问李德指挥权的原因和中共领导层的变化，并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不久，陈云根据会议决定悄悄离开长征队伍，由地下党组织安排，秘密经成都转重庆，然后乘船直下上海。

陈云于8月5日抵达上海，在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下，乘船赴海参崴，于8月20日抵达莫斯科。但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在这一天闭幕。陈云已来不及向大会汇报。后又由于王明的阻碍，陈云难以让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陈云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他假托一个国民党被俘军医的口吻，化名施平，写下了自己在长征途中八个月的经历，全文共四万五千字，取名为《随军西行见闻录》。《见闻录》不仅记述了中央红军远征所走过的地方，进行的战

斗，遇到的困难，而且还讲述了红军的俘虏政策、群众工作、组织纪律、民族政策等等，还特别对几十位红军领袖和将领的机智、勇敢、坚毅的品格和朴实、廉洁、民主的作风，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与国民党军进行对照，形成鲜明的反差。但是全文却只字未提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变化，这或许与当时的环境有关。

《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2月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全民月刊》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它为国际了解中国共产党起到了积极作用。1937年3月，在国内出版的《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一书中收录了此文；此后，民生出版社和陕甘人民出版社于11月、12月先后出版了单行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文没有再次出版，直到1985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

《随军西行见闻录》因为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没有受到后来的一些历史因素的影响，因而成为研究党史和现代史的可靠文献。

二、长征勇士写成的第一本长征故事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结束。然而，早在是年春，红军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围追堵截抵达陕北的消息便出现在上海的《字林西报》上，这篇报道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红军穿越半个中国的远征，并将这次远征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因为《字林西报》是英国人于1850年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曾被视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喉舌，所以当时红军内不少人认为：“这位帝国主义代言人虽然是在破例地惊叹红军的奇迹，但他也是在恶笑红军的‘粗陋无文’。”于是红一方面军便有人动议编写一

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这个意见马上得到许多人的赞成。“当时的计划是预备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的日记,由几个人负责写。但被指定写的人偏忙着无时间,一直延宕到8月……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而采取更大范围的集体创作,于是发出征文启事,并又从组织上和个人关系上去发动计划中必需的稿件。”

征文启事由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发出后,征编人员曾一度担心,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和紧张的战斗中,红军指战员能否对这个启事做出迅速的响应。事实很快就消除了他们的顾虑:8月中旬开始收到来稿,接着,稿件如潮般涌来,到10月底已收到200余件,50余万字。这使负责编辑的同志兴奋不已,为了尽快成书,他在这些参差不齐的稿件中选出了30万字编辑成册。但是,这些一时赶就的稿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文字表述上都不能尽如人意,当时的编辑遗憾地说:“然而看一看目录,却使人有极大的不满,这里所有的还不到我们生活过的和应该写出的五分之二;然而我们不能再等了,环境和时间都不容许我们了。”因为此时大家开始陆续奔赴前线,编辑委员会的人本来就是从各单位抽出来的,此时也随着部队出发了,最后只剩下一个身有残疾的同志坚持完成了这项任务。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的正式出版却推迟了5年半,直到1942年才由总政治部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在延安出版。在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本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珍贵的历史价值的《红军长征记》一书(原名《二万五千里》),从1937年2月22日编好直到现在,已经五年半了,其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他的工作,无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这是始终使我们放心不下的一件憾事。”

导致这一憾事,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这便是第二次国共合作。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其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蒋介石就国共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国民党方面放弃武力摧毁红军的计划,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讨论两党合作抗日问题。1937年2月12日,国共两党在西安开始了首轮较高层次的谈判。3月下旬至4月初,谈判进入最高层次,由周恩来与蒋介石直接对话。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国共谈判带来的变化有如下描写:“四、五、六月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区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五星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红军长征记》,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为什么选择1942年来出版这本书呢?原来,这时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在整风文件中特别指出,党的高级干部要着重对于党的历史进行学习、研究和讨论,以便

从中吸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于是借阅各种党史资料的人多了起来,《红军长征记》也成为大家借阅的重点资料,当时延安只有一份手稿,一方面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容易损坏和遗失。为了使这份资料既能满足整风运动的需要,又能将之长久保存下来,中央决定正式出版此书。在出版说明中就如何使用和保管这本史料特地做了说明:“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此书编辑时,国共还没有实现第二次合作,因此在语言表述上仍明确地表示出对国民党的仇恨情绪;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实现,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此书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发放面,故使此书印制的很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鉴于《红军长征记》经过战争年代的颠沛已经所存无几,为了使这本珍贵的史料能够保存下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经请示,将之作为党内参考资料重新印行,并根据原书“是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同志们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集体写成的”这一原因,将书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分三次刊登在印有“党内文件,不得外传”的《党史资料》上。因为这是作为“党内文件”而印制的,所以发行面仍很小,又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能够保存下来的亦不多,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见到了。

此书的作者在全国解放后,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党和政府及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他们是董必武、李富春、陆定一、谢觉哉、徐特立、张云逸、谭政、王首道、耿飈、刘亚楼、邓华、杨成武、陈士榘、肖华、周士第、黄镇、廖志高、莫文骅、王辉球、舒同、李一氓、贾拓夫、童小鹏……在这些人中,今天仍在世的已经屈指可数了。

三、第一个向世界报道

红军长征的外国记者

在《红军长征记》编好之后,编者自豪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现在这部破世界纪录的伟大史诗,终于由数十个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写出来了,这是使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失惊的,同时也是给了他一个刻苦的嘲弄。”这个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显然是指为《字林西报》写报道的那位西方记者。

那么,这位西方记者又是谁呢?据我所掌握的资料看,应该是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曾在她所著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写道:

“193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在上海我的朋友鲁迅的家里,我会见一位作家,他是作为中国红军的代表刚从西北来的。他参加了那史诗般的长征,这个整个军队穿越过一万两千英里的平原、大河和高山的历史性的行军。”“一连好几天,每天晚上我都同他坐在一起,把他的谈话记录下来。他的叙述虽然是平静和真实的,但是却充满了无数难以令人置信的艰苦的不屈不挠的图景。”

从这一段记述中不难发现,史沫特莱是在1936年春天了解到红军长征的全过程,而不是某些片断,所以她才能将长征表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这与《字林西报》上那篇报道的发表时间和语言表述非常一致。《字林西报》自1850年创办,一直在上海编辑出版;史沫特莱于1929年到上海后,便与《字林西报》发生了联系。因此,这篇报道出自史沫特莱之手可能性最大。我因为没有查到《字林西报》上的那篇报道,故不敢过于武断,只好待有机会时再查考。

那么,史沫特莱所说的“中国红军的代表”又是谁呢?当时为史沫特莱充当翻译的路易·艾黎在《鲁迅回忆片断》一文中说:“那个晚上令人心神激荡,尤其是当冯雪峰讲到张国焘同毛主席和朱德将军从川西阿坝藏族地区的卓克基来到上游两河口会面的故事时更叫人神往……我有时被某个字眼难住,冯雪峰就生起气来,怒冲冲地说:‘他连这样简单的事都翻不出来!’于是鲁迅会站起身来,给大家倒茶,说些鼓励的话,我们又接着谈下去。”路易·艾黎的回忆是准确的。1936年4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赴上海筹组中央驻上海办事处(8月他被任命为副主任,主任为潘汉年)。他到上海后,因工作关系,先住在鲁迅家里,史沫特莱便是在冯雪峰到上海的初期听到了那些动人的故事,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文章,除了在《字林西报》上发表外,还将稿件寄往莫斯科,发表于《国际新闻通讯》,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冯雪峰自己也曾同别人谈起过此事。林秋若在《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一文中说:“有一次,我同雪峰同志聊天,谈到1939年5月我在新四军军部看到史沫特莱的情况时,他告诉我,1936年他刚到上海不几天,就在鲁迅家里会见了史沫特莱,同她整整谈了两个下午,除了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更多的是谈红军长征的经过。”林秋若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谈到:“后来我从郭静唐同志那里听说,史沫特莱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红军长征消息的外国记者,她的这个报道,便是雪峰同志向她介绍红军长征经过后写成的。”

史沫特莱是一个十分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她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非常大的贡献,把她同《字林西报》相提并论实在是一种误解,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红军长征记》的编者也无从考证“这位外国记者”

的政治倾向。但是,由于被称为“帝国主义代言人”的文章,而引出了洋洋30万言的《红军长征记》这部珍贵的史料,无论从何角度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好事。至于史沫特莱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讲述。

四、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外国牧师写了第一本关于长征的书

1984年,全美作家协会主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撰写一部关于红军长征的著作访问中国。3月9日,索尔兹伯里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采访了军事科学院院长萧克将军。萧克派人取来两张大地图,一幅挂在一个架子上,供来访者观看,一幅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以备讲解来访者提问中所涉及到的地名和地理。没想到,谈话却从地图上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1934年10月,红军第六军团(萧克时任军团长)攻占贵州黄平县老城,并在城内的一所教堂里找到了一张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萧克等军团领导如获至宝,因为红六军团从湖南进入贵州时,用的是旧中国中学课本上仅有20平方厘米大的小地图,图中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根本不适合行军打仗之用。现在得到一张约一平方米大,并标明所有乡镇和山川的省图,萧克等人能不兴奋吗?可是红六军团中却无一人懂得法文,这又成了难题。幸好教堂中有一位牧师既懂法文又能讲一点汉语,于是萧克便与这位牧师连夜将地图上的法文地名全部译成中文,整整一个通宵两人都没有合眼。索尔兹伯里的夫人夏洛特听到这里非常关切地说:“那位牧师一定是同情你们的事业的?”萧克爽朗地笑着说:“那位牧师听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是红军,准确地说,他是被‘软禁’了。”

这位牧师叫勃沙哈特,瑞士人,20年代初被教会派往中国传教,与勃沙哈特同时被“软禁”的还有另一位牧师阿诺利斯·海曼。

1934年11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军长贺龙,红三军改编为红二军团)会师后的一天,勃沙哈特看见一位形象威武、留着胡子的军人,便好奇地向旁人问了一句:“他是谁?”有人答道:“他就是贺龙。”“贺龙”这个名字勃沙哈特好像在哪里听说过,他仔细地在记忆里搜索,终于记起他的朋友贝克尔医生曾讲起过为贺龙的侄子治病的故事。于是他打定主意,请贝克尔出面向贺龙讲情,以求释放。贝克尔接到勃沙哈特的信之后,果然不负友人之托,几次派人带信给贺龙,但均被贺龙婉言回绝了。勃沙哈特感到失望,只好跟着红六军团到处转战。时间长了,勃沙哈特对红军产生了好感,他知道红军不愿让

他离去,是因为需要他做翻译。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根据红军总司令部电令,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在出发的第一天,阿诺利斯·海曼被释放了,而勃沙哈特则被留下来,随红军长征,一直到1936年4月12日,前后在红六军团共呆了560天。4月11日下午,萧克设宴请勃沙哈特吃饭,在询问了勃沙哈特的健康状况之后,萧克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这一消息使勃沙哈特非常高兴。他离开红军后,去了昆明,立即着手写作他在红军中的这段经历,书名定为《抑制的手》,并于1936年8月在英国伦敦出版。这本书比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最早的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还要早出版10个月,此时斯诺还在陕北苏区采访呢。

那么为什么《抑制的手》在国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呢?其实这本书出版后也很受欢迎,不仅很快重印,而且还在瑞士出版了法文版,后来因为战乱,该书的英文版被毁,未能再版;同时,也由于该书只描写了红军的一部,勃沙哈特又没有很多机会与红军的高级将领交谈,因此写的大多是一些见闻和感受,使该书的价值受到影响;再加上随之而出的《红星照耀中国》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使《抑制的手》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成为一本十分罕见的书。直到1978年,在出版商的要求下,勃沙哈特又重新撰写了这一段经历,定名为《指导的手》,先后出版了英文版和法文版(法文版书名为《导手》)。

1985年,索尔兹伯里通过一位记者了解到勃沙哈特的住处,11月,他携夫人到英国,专程拜访了住在曼彻斯特郊区的年近九旬的勃沙哈特,并带去了萧克将军的问候。

五、第一本使世界为之 一震的有关长征的书

我曾在一本大部头的长征史中见到这样一段描述:“史沫特莱另一部主要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是继斯诺以后较早将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人民的一部书。”

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因为在《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出版前三年,《中国红军在前进》(英文版)就已问世。事实上,斯诺之所以产生采访陕北的想法,还是拜读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之后的结果。

斯诺与史沫特莱是朋友,但是斯诺对红军的了解却远逊于史沫特莱。这是因为:(1)斯诺长期在北京执教和

作新闻记者,北京不是红军的活动区域。而史沫特莱所在的上海,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日起就成为党的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在很长时间内处于指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地位,时有红军将领往来。(2)斯诺没有机会接触红军的将领和具有特殊地位的民主人士,他自己曾说:“我在到西安府之前(指1936年陕北之行)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红军战士。”而史沫特莱则有机会同这些人在一起,她与宋庆龄、鲁迅、冯雪峰等人有着特殊的关系,并曾通过他们接触到一些红军将领。(3)在思想倾向上,史沫特莱比斯诺更激进,她还是上海的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30年代初期,史沫特莱曾多次接触过到上海办事或养伤病的红军指挥员,从他们的口中她了解和认识了红军,并着手写作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而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开篇所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有不少就来自于前书。

那么,斯诺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走向陕北的呢?在许多资料中都没有讲清楚,斯诺在当时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其中的细节,在他的著作中甚至没有提到他去陕北的前期准备工作。

1936年3月,斯诺就考虑作一次采访红军的旅行,希望大卫·俞(即俞启威,亦即黄敬)给以安排,大卫·俞没有满足斯诺的这个要求。斯诺试图通过大卫·俞了解红军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但一无所获。斯诺终于想到了宋庆龄,他说:“如果能有人帮忙,那只能是孙中山夫人了。”4月,斯诺为实现去陕北苏区的心愿,专程赴上海找到宋庆龄。他向宋庆龄表达了希望得到帮助,促成陕北之行的愿望。这时还有一个曾向宋庆龄表示准备到陕北参加红军的美国青年——即后来成为著名医学专家的马海德博士。马海德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30年代初,我那时作为一个青年医生初到上海,她(指史沫特莱)给我巨大的影响,她像火一样激励着以路易·艾黎、汉斯·希伯、魏路诗等为首的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使我们了解中国真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以及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于1936年决心参加中国红军,也受到她的很大影响。”由此可见,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都与史沫特莱有关。

那么,如何安排斯诺和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呢?许多资料上都说,宋庆龄从上海地下党那里得知,陕北发来秘密电报,邀请一个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苏区去。宋庆龄很快为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做出了安排。

事实上这里还丢掉了—个细节,如果不搞清楚,就无法说清为什么陕北在邀请一位西方记者的同时,还要邀请一位医生同行,陕北为什么偏在此时发来这样一份电报?据林秋若讲,冯雪峰曾亲口同她谈起过此事:“长征结束后,周(恩来)副主席叫他到白区(上海)建立电

台,从此白区和中央的联系就方便多了。”冯雪峰在其一份材料中也写道:“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当时周恩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总理是解放后的官称)亲自交给我的,并交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名字。”这与林秋若讲的都是一件事。由此可知,与陕北中央联系的电报必然要通过冯雪峰才能沟通。而事情怎么会那么巧:斯诺和马海德刚提出要去陕北,陕北就来电报,主动邀请一位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这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原来,宋庆龄在了解了斯诺和马海德的愿望之后,通过雪峰同志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代表中央表示欢迎,雪峰同志便将中央的意见请宋庆龄先生转告斯诺”。而后做出具体安排的仍是冯雪峰,他派党内秘密交通董健吾——即斯诺反复提到的“王牧师”去完成这项任务。此后兵分三路,斯诺由北京出发,马海德由上海出发,两人在郑州碰头后再到西安等候;董健吾则择期抵达西安与他们会面。三个人的接头信物各不相同,董健吾与马海德各执半张5镑面值的英镑,斯诺则带了一张由北方局出具的介绍信。他们在西安顺利地接上了头,在陕北派来的人护送下,斯诺和马海德戏剧般地进入了陕北苏区,这一情节在《西行漫记》中有非常生动的描写。

斯诺最先见到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便是周恩来副主席,周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所说的报告就是冯雪峰从上海发给中央的电报,在确证了斯诺确实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记者之后,中央才下决心邀请他到苏区采访。这一炮能否打响,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中共中央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并非是随便找一个外国记者就行。斯诺曾猜测有关他的“报告”“来自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总部”,这只猜对了一半,在北方局向中央报告斯诺的情况之前,冯雪峰已经根据宋庆龄的介绍,把他推荐给了周恩来。周对斯诺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表示了共产党对斯诺的信任。

周恩来还亲自为斯诺安排了92天的旅程,尽量满足斯诺所提出的任何要求,使斯诺顺利地完成了陕北之行的采访任务。由此可见,中共对斯诺此次陕北之行的重视程度。斯诺也确实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的期望,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成为由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外国记者撰写的第一部关于红军及其长征的历史书籍,它如同一扇充满阳光的窗户,使世界重新发现和认识了中国。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的序言中说:“《西行漫记》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认真地读过这本书,为此还三次接见了斯诺。

六、第一本由外国人撰写的 全景式反映长征的著作

1942年2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接见了斯诺,希望斯诺能到美国空军情报部门工作。斯诺本人还是想做战地记者,婉言谢绝了罗斯福的美意。此后,斯诺作为《星期六邮报》的驻外记者,在欧亚战场穿梭采访,报道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新闻。

1944年,斯诺在苏联前线采访时认识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并很快成为好朋友,索尔兹伯里早在几年前就已读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他一直为里面的故事而激动不已。在采访的空隙,斯诺常常同索尔兹伯里谈起中国、谈起红军、谈起长征,这些谈话点燃起索尔兹伯里希望到中国去采访的愿望,他尽力争取到报社的支持,计划在莫斯科的采访结束后,便动身去中国。然而由于计划的改变,索尔兹伯里不得不放弃了中国之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索尔兹伯里一直在寻找中国之行的机会,但是,几年后由于共产党取得了最后胜利,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中国之行像一个随时可以启动的机关留在索尔兹伯里的脑海里,他一直忘不掉老朋友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所写下的那句话:“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1972年2月15日,斯诺不幸去世,他未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他最有把握完成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索尔兹伯里“热望实现斯诺未完成的目标”,此时恰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之时。是年,索尔兹伯里有幸与谢伟思一道访问了中国,他们联名向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提出“沿着毛率领红军进行长征的路线采访,并撰写长征纪实的建议”。但他的请求未能获准。事实上,他的请求假如获准,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此时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就是被限制了行动自由,或是在某地劳动改造,即便是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也未必能向他讲述多少他所希望听到的故事。

在中国粉碎“四人帮”之后,索尔兹伯里又开始不停地向中国政府申请,时间一天天过去,一晃就是几年。1980年索尔兹伯里作为旅游者又到过一次中国,但这与长征采访毫无关系。索尔兹伯里并未因此而灰心,他继续申请。1983年8月,他在《中国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71岁的原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和他的妻子,在中国乘公共汽车、飞机和吉普车到过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几段路。这一消息使75岁的索尔兹伯里感到异常兴奋,他马上给中国驻美大使馆写信,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为他提供这样的机会。信还没有发出,中国驻美大使馆

就打来了“中国政府欢迎索尔兹伯里访华”的电话。从索尔兹伯里第一次提出申请到正式获准,其间共经过了11年。

患有心脏病的索尔兹伯里开始了中国之行的准备,他的妻子甚至以为他发疯了——当年红军中年龄最大的被称为几老的也不过60岁左右,而索尔兹伯里马上就要76岁了,同时还带着心脏起搏器,这简直是一次性命之搏。她不想让丈夫去冒这个险,但她无法劝阻,因为她知道,丈夫正是用“生命”换来的这一次机会——为此他等待了11年。1984年2月29日,索尔兹伯里携夫人登上了飞向中国的班机。

索尔兹伯里的这次采访,几乎同斯诺当年的陕北之行一样,受到中国共产党高规格的接待,他几乎采访了所有活着的红军高级将领、了解到他所能了解到的一切;他还被获准“可以随意使用各种物力、档案和史料”;并走访了许多党史界的专家,搞清楚了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在他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实地考察和沿途采访时,中央军委派出军事博物馆馆长(长征史专家)秦兴汉,外交部派出最好的翻译张援远陪同,使这次“长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长征”到达会理时,索尔兹伯里的心脏病发作了,他感到非常精疲力竭,并说,他无法完成这次旅行了。若不是在随行医生的精心照料下,使索尔兹伯里得到及时的治疗和休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能否获得巨大的成功,甚或能否问世,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事后,他的妻子感动地说:“她们救了哈里森,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假如她们不在会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事。”后来,这两位医生同索尔兹伯里夫妇告别时,索尔兹伯里的妻子与她们拥抱,流下了感激的泪水。这也算是中美两国友谊的一段佳话吧!而拖着病体的索尔兹伯里此时仍然满脑袋都是长征,他终于坚持走完了全程,历时74天,行程约12000公里。他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向世人证明:“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他感到无比的自豪,宣称“没有一个中国人或外国人进行过这样的旅行,近期内也不大可能有人这样做”。我相信索尔兹伯里说的话,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们曾试图这样去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完全程,不论用什么方式去完成;今天大家又都在忙着新长征,没有时间去作这样的尝试,更为可行的倒是用长征的精神去激励新长征的人们。

此后,索尔兹伯里经过一年的笔耕,终于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写作,1985年10月该书在美国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美国《时代》周刊摘登了该书的部分章节,并加了这样一段编者按:“每一场大革命都要有一个经受和最终克服困难的主要象征。两个

世纪前美国人作战时心中想着瓦利福奇的艰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人们崇敬的象征是1934—1935年的长征。”

(附记:本文写完后,尚未寄出,偶见1996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载:“追寻先辈足迹,继承光荣传统,‘军民重走长征路’队伍启程”的消息,这个消息很令人振奋,它将打破索尔兹伯里的预言。但是索尔兹伯里已经无法得到这一消息,因为他已于前年离开了人间。)

七、关于第一部长征小说及不该发生的故事

198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登出了这样一则消息:“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第一部描写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在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前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时距红军长征已逾50年,在这样长的时间里,竟没有人将中国革命中这最壮丽的一章用文学的手法再现于世,不能不叫人感到深深的遗憾。

其实,这里所说的“第一部”,仅仅是指正式出版物而言,那么,未能成为出版物的“第一部”又在哪里呢?读者也许早就发现前面的故事几乎都同冯雪峰有关,而冯雪峰本人又是亲身参加长征的唯一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作家,为什么他没有撰写一部关于长征的小说呢?

公允地说,想以长征为素材写成小说并公之于世的,冯雪峰恐怕是第一人。还在长征路上,冯雪峰就已经开始收集素材,他耳濡目染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一种创作的冲动缠绕在他的脑际,可是当时的条件不允许他写。

1936年4月,冯雪峰奉中央之命,赴上海筹组中央驻上海办事处。此后,冯雪峰一直忙于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和组织文化战线进行统一战线的宣传等工作。他虽然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但他只要见到熟人,便把长征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凡是听他讲过故事的人,都被那壮烈的场面所深深地吸引。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冯雪峰让妻子带着子女先回老家,自己留在上海坚守岗位。9月中旬,冯雪峰给潘汉年写信请假,准备写作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请假获准后,冯雪峰搬到许广平家住下,边看书边拟定写作计划。是年底,冯雪峰因身体欠佳,回到家乡——浙江省义乌县神坛村,一边养病,一边秘密进行地下工作,一边写作他久久构思的长征小说。为了写好这部书,冯雪峰几次改变写作计划,将不满意草稿投入火炉。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小说仅写了5万余字,书名暂定为《红进记》,后改名为《卢代之死》。1939年1月,冯雪

峰接到陕北中央的来信,催他速启程回陕北根据地。冯雪峰认为,写作这部书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准备将书稿完成后再回陕北,并去信续假。在此之后,冯雪峰加快了写作速度,终于在1940年11月完成了《卢代之死》的初稿,共50余万字。

1942年2月26日,冯雪峰在家乡被捕。在狱中,他一直念念不忘这部书稿,准备出狱后继续修改完成这部初具规模的著作。经过党的多方营救,1942年11月冯雪峰由宦乡、郭静唐做保,得到保外就医(当时冯患有严重的肋骨结核症)的机会。1943年3月,冯雪峰通过同乡送信给妻子,不久,终于阖家团聚。他见到妻子后,急切地打听书稿的下落,得到的回答却是:家乡已沦陷一年多,书稿已在颠沛流离中不幸遗失。冯雪峰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非常难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雪峰在担任许多重要职务的情况下,挤出晚上的睡眠时间,重新写作《卢代之死》。经过七年的辛勤笔耕,到1957年再次完成了《卢代之死》的初稿。遗憾的是,在这一年冯雪峰被错打成“右

派”,他只得中止这部书稿的修改工作,将书稿锁入箱底。

1961年11月,《人民日报》上刊出摘掉冯雪峰“右派分子”帽子的通告。冯雪峰这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完成《卢代之死》的修改工作。可是,正当冯雪峰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准备动笔的时候,有人却以组织的名义通知他,写作可以,但是像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伟大的革命题材,你不适宜写。不言而喻,冯雪峰虽然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依然是摘帽右派。从性质上讲,同戴帽右派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冯雪峰由此意识到了什么,因此,这一次他没有把书稿重新锁入箱底,而是将之投入火炉,亲眼看着自己的心血化为灰烬,使这部可能成为传世之作的书从此在人间消失了。

《卢代之死》在白色恐怖下夭折固然使人痛心,但在极“左”思潮中天折则更令人痛心。痛定思痛,我们应该吸取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责任编辑 萧 徐)

大渡河边的战前动员

● 李水清



李水清将军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名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心情感到格外激动。特别是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战斗,更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是在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当时我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任分队长。一天,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同志把我叫去,当面向我交代任务,他操着江苏口音说:“红一团在杨得志团长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敌人两个连,并缴获了一只渡船,控制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正准备组织渡河战斗……”接着他又讲了这次渡河战

斗的重要意义,他把拳头一挥,提高嗓门说:“强渡大渡河战斗,不但关系到红军渡河的成败,而且关系到长征的成败,关系到将来中国革命的成败。因此,军团首长决定由你带领宣传队迅速赶到红一团,向渡河部队进行慰问,并参加他们的战斗动员……。”

这是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感到很高兴。回到宣传队,我把朱瑞主任交代的任务向宣传队的同志们进行了传达,大家听了个个摩拳擦掌,兴高采烈,立刻整装出发。我们赶到红一团,杨得志团长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并和我们一一握手,他笑呵呵地说:“欢迎你们来。”这时,一营营长孙继先也在一旁,我们互致

问候后,孙营长随即带领我们到了担任突击队任务的第二连。连长熊尚林同志是江西永新人,他出身贫苦人家,比我大两岁。我首先转达了军团首长对二连指战员的问候,然后把朱瑞主任讲的这次渡河战斗的重大意义,原原本本地向他们进行了传达,并鼓励说:“军团首长对你们非常信任,对你们渡河成功充满了信心,希望你们坚决勇敢地完成这次战斗任务!”熊连长立刻带头宣誓般地高声说:“坚决完成任务。”挑选出来的渡河勇士们也都高声复诵着……我看着这些充满激情的战士,随手向他们发了慰问品,每人一条印着“祝君平安”的白毛巾,一个搪磁碗。慰问品虽然不多,这在当时物资贫乏的条件下,可以说已经是很贵重的奖赏了。连同连长熊尚林共发给了17位勇士,还给了营长孙继先一份。勇士们接过慰问品,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发完慰问品后,二连连长熊尚林带我们来到渡场,只见大渡河地势十分险要,两岸高山耸立,峡谷陡峭。安顺场这一段河宽100多米,水深流急,浪声轰鸣。蒋介石就是妄想利用这一天然屏障,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南岸,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当年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的义军就在此被清军消灭)。安顺场街上到处写着活捉朱德、毛泽东的标语。我们看了都很气愤地说:“看看究竟谁活捉谁!”

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开始了。在团轻重机枪和军团两门九二步兵炮火力的支援掩护下,连长熊尚林手举驳壳枪指挥渡船,17勇士乘一只小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一面射击,一面在浪涛中颠簸着冲向对岸。这时,勇士们在神炮手赵章成的支援下,噔噔两炮把敌人的碉堡炸上了天。17勇士乘着小船,终于登岸成功。敌人见红军冲上岸滩,慌忙把手榴弹、滚雷像冰雹似地往下扔。勇士们利用岸边石阶作掩护,向敌人

冲杀。这时,赵章成又连发两炮,正中敌群。经过激烈战斗,击溃了守敌,控制了渡口,转入巩固滩头阵地,终于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为红军主力渡河扫清了障碍,为红军长征北上打开了突破口。这次战斗的胜利正如动员时所说的,它不但粉碎了蒋介石妄图置红军于“石达开第二”的美梦,而且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揭开了光辉一页。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第一次见到熊尚林同志时,他那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世界上有些事真是巧得很。1938年我们在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时,上级派熊尚林同志到我营当营长,我是教导员,我们并肩带领部队作战,又相处了两年多。他确实是个好同志,政治坚定,思想意识好,组织观念强,作战勇敢,善于团结同志。1940年他调到平北工作,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为祖国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每当我回想起这些,回想起在

那艰苦峥嵘的岁月里,特别是在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光荣地献出了他们年轻宝贵的生命,心情总是感到不能平静,总感到有一种责任,那就是要用长征的革命精神教育我们的后代,使其发扬光大。在那万里征途上,条件那么艰苦,环境那么恶劣,为什么我军能够战胜敌人,夺取胜利?就是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正确;靠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党支部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靠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原则;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我退出领导岗位后,虽然年事已高,但只要有人要求我去讲革命传统,我都高兴地答应。

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描绘出九五计划的宏伟蓝图。只要我们继续发扬长征精神,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任何敌人,把我们繁荣昌盛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更加美好!

(责任编辑 王 恂)

○ 广 告 ○

钢笔书法高效速成法面向全国招生

钢笔书法高效速成法是本校最新研究成果。您想拥有一手潇洒的书法吗?不管年龄大小,或经过多次练字失败,本校保证您很短时间练好四种实用书体。庞中华、路放等硬笔书法家执教,每天练一小时,每月批改作业,全国近100万学员已成功。

长期函授招生。速成类教材:楷书学50天,行书30天,仿宋、隶书各15天,学杂费共50元;系统类学6个月,68元,学各种书体。可任选一类学习即可。收款后寄发全套教材和校徽等,学完发钢印证书。早一天学习,早一天成功!

邮编:610072

电话:(028)7745535

联系老师:罗兰 张平

汇款请寄:成都市一环路西三段7号 西南硬笔书法学校发行处

珍贵的长征记录

● 谢景星

1937年，红军总政治部编印了《红军长征记》一书。谢觉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真是蛮子》、《抱岷岗的一夜》、《卓克基土司宫》等文章，为人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经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同意并推荐，特转载谢老的这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真是蛮子》一文，是谢觉哉在1935年5月随中央机关纵队通过凉山彝族地区时的一段经历。文中说到，他在汉人居住区的大桥市，看到一本《越旧志》，从中得知这一彝族聚居地区，正是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地，山上“蛮子”可能就是汉时孟获的后裔。从而得知这个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变迁，仅保留其残种于高山丛岭之间的“蛮子”，对四川军阀刘文辉有刻骨的仇恨，而对纪律严明、尊重“蛮子”风俗习惯的红军，表示了忠诚的迎送，还有不少“蛮子”参加了红军，说明彝族同胞爱憎鲜明。

《抱岷岗的一夜》一文，写的是长征途中红军经过四川邛崃山区原始森林时，找不到路，山高又陡又滑，正如谢老在1937年8月9日的日记中所述“攀石如猿上，趋蓬似鸟藏”的极其艰苦的生活。重读此文，可以激发后人的革命斗志。

《卓克基土司宫》是一篇纪实性文章，其中精辟地论述了当地土司对藏族同胞的压迫和藏族同胞反压迫的光荣传统。

1945年，谢老读完包括他自己写的这几篇文章在内的《红军长征记》时，在他10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回忆抢乌江，抢娄山关，抢泸定桥，抢安顺场，抢腊子口等英雄事迹，殊怆恻。”并赋诗三首，其中一首是：

“重读《长征记》两函，雪山草地旧曾谙。

索桥抢渡悬崖扑，多少英雄血未干。”

（谢景星：谢觉哉同志的侄孙，曾在军委任秘书）

《红军长征记》上有我几篇短文，录如下：

● 谢觉哉

真是蛮子

长征路上碰到的弱小民族，最令我感兴味的是蛮子山上的蛮子。——从大渡河南至小金川草地拉子山等地，我们都喊做蛮子山，其实大渡河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的民族是番，不是蛮——蛮子山原属越旧县。我在路上拾得一残本《越旧志》，载有许多诸葛亮征蛮古迹。疑山上蛮子当是汉时孟获之后。不到两千年，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千里沃壤，悉为汉人所有，蛮人仅保其残种于

高山丛岭之间。我从山下大桥市（汉人居留地的终点）听到汉人对蛮子的憎恨，在山上看到蛮子的悍直。眼前恍惚展开了一幅强食弱肉的图画。

传来命令：要过蛮子山了，各人带足四天干粮，要露营，要尊重蛮人习惯，不进蛮人房子，不和蛮妇谈话——蛮俗认为妇女与外人交接是大耻辱——如有事进蛮人房子，不得用脚踏他架锅子的石头，这是他们所敬的神。



在延安时的谢觉哉

又说前路部队派人和蛮人头目假道，三个部落欢迎我们，其它两个跑了——五个部落人口约万人。

炎热的晌午，到达大桥，市民言：“蛮子凶得很，常常下山抢掠，遇单身旅客连裤子都剥去，说不定还要杀伤。不久以前刘文辉派一团人来打，打个大败，姓李的团长打死了。希望你们把蛮子杀绝。”出市即无人烟，约十里上山，转几个坡，见十数蛮兵，裹头跣足，持梭标，也有几杆旧式快枪，人高大如山东佬，每人头上顶一张红军布告，并有一面红旗，在路上欢迎我们。欢迎的仪式，不是拍掌呼口号，而是伸着手向我们讨钱，给两三个铜子，就欢喜得了不得。

山上有些可耕的地，但蛮人不知耕种，仅产一种很小的马铃薯，煮熟给我们吃，一百钱两个；也有抱鸡来卖的，五毛钱一只。讲到穿，鞋袜终年不要，每人披一件毛毯，像毛布袋一样粗。据《越旧志》上的考据说即禹贡上

“西夷只贡”的“织皮”。

沿途都有蛮民来看，有的蹲在山上，有的蹲在路旁，有的讨钱，有的不讨。一老蛮妇似是酋长夫人之类，系百褶白布裙，跣足。两耳各垂杏子大的红珠，披的不是毛布，而是细毡，提一小女孩，有同志给她一块饼干，欢跃接去。

前面山上似乎来了一个人，越近越像，是一个一丝不挂的男子，说是被蛮子剥去了，而是血流满面，这样的人碰到两三个，可见蛮子打劫是事实。

我们在山上走三天，第一晚露宿，第二晚大雨，幸一能汉语的蛮子引我们到一岩旁的房子歇宿，有几间平房，似乎是蛮子中的土豪。

山上气候较寒，由南上山不觉得高，由北下山，似乎有一二十里，而且很陡，下山约五六十里即安顺场临大渡河了。

蛮子体格很健，面目也不凶恶，大概太穷了，所以打劫。平情而论，汉人抢去他几千里的平原，他制汉人几身衣服又算得甚么。同时，我觉得蛮子所以能保全一线种族，还是靠着他能够有野蛮的抵抗。诸葛亮大概是看中了这一点，知道越压迫他会越反抗，所以不得不擒了又纵。举个例子，在西昌的一个镇上经过，有一石碑是咸丰年罚夷人建立的，上称某月日有夷人某上街喝醉了酒，和人家吵闹，因此罚夷人头目出钱十串给武庙演戏，议定以后夷人不得在街上喝酒，日落即需归山，不得在市上歇宿。并罚夷人头目立碑认错，这和帝国主义对付殖民地不是一样吗？那里的夷人不反抗，所以现在不仅没有夷人上街喝酒，似乎连夷人也在若有若无之间了。蛮子就不然，如有蛮子上街被欺侮，他就非报复不可，山下汉商、汉官尽管恨他，却也不敢轻易惹他。

记得经过安龙时，和一小学教师谈话，据称安龙五万多人口，夷人（苗）占三分之二，夷人居多，汉人居城市，夷人富的读书的大部改装改姓，不承认自己是夷人，这是加进了汉族土豪劣绅的群，为剥削夷人的帮助者，与中国的汉奸无异，然而蛮子中间没有这种东西。

然则，对蛮子怎么办呢？

这不容易吗，当我们对他宣布民族平等，他即欢迎我们，毫无猜忌，且不少加入红军的，蛮子真可人哉！

抱 栋 岗 的 一 夜

在岗下水子地停了一天了，说是前面部队走不通。第二天午前九点出发，不一会，大家依树偃息，敌机来了又去，我们终是蹲着不动。

快正午了，才开始蠕动，呵，原来是上山！陡的草壁，

窄的之字路——这样的路不是走过很多吗？为什么这样慢？转过一坡，就只能一脚跟一脚，树木渐丛杂，因终年不见日的缘故，土都成了黑泥，手攀着树根或枝，足踩着泥里的小石。太陡了上不去，握着小竹，掉下涧里。从这

个石上缘到那个石上，又到树林里来了。有些密箐，像竹枝扎成的门，弯着腰走进，有新砍伐的刀痕，原来是先头部队开的。在山下，土人说：“可以走，不过难骑牲口。”那知道根本没有路，只有些攀藤附葛的痕迹。

看看天晚了，据说到山顶只有一十八里高，但是走不到。前面传来了声音：“宿营呀，宿营！”怎么宿法？捡得三四尺可以放下东西的平面就是好的，大家知道这样是不容易过的，非有火不行，枯枝倒是不少，一下子这一堆那一堆的火着了。我因为掉过了队，被丢在后面，虽然相隔不过二三十丈，但要下去找，多难，况且黑烂泥上也无法睡觉。天公偏不作美，下起雨来，雨滴在树上哗哗啦啦的流下，人们都打着伞，戴着笠，烤着火。我借得一洋磁盆垫坐，许多同志打着鼾，我是彻夜没有睡。

很想弄点水喝，炊事员同志点着火，下涧取水约半点多钟，携上一桶水，正架着烧，不幸泼了。但是天刚亮，

他们也煮好了两桶包谷糊糊给我们喝。

“走呵，似乎有了点日影，到山顶就好了。”爬上山顶一看：哎哟，路是有的，满是泥泞，陡处呢，谨防“坐汽车”！（跌翻滑下的称呼）稍平处呢？泥深没膝，泥中的石头不见了，有几匹马陷在泥里出来不得。

怎么走法？为要绕越泥潭，有时下涧，缘着圆石头走；有时攀树上岩——在涧不可下、岩不可攀的地方，就攀着路旁树或竹枝跃进。行行重行行，太阳当顶的时候，居然出了森林，望见许多人马在山下河里洗衣煮饭。路上泥没有了，但很滑。不幸得很，我偏偏在出森林后，坐了两回“汽车”。

到河里洗去脚腿上的泥，渴得很，一同志拿茶壶在烧水：“给我一碗罢？”我说。他就倒上一碗，怪浊的。谁知煮的是骡子肉，没有盐，可是味特别鲜，至今还记得。

卓克基土司宫

卓克基是清高宗劳师伤财、费几年工夫才克服的所谓小金川的七大土司之一。土司宫设在几条河的汇流点，前临急流，后依峻岭，一个石块砌成的四方桶子，高达七八丈，宽广约十丈以外。前栋两层，后栋、左栋、右栋均四层，屹立万山中，俨然一西式建筑。

下层：上栋是大厨房，巨大的锅子几十口，左右为马厩及下人的住室等，中间的坪颇大。第二层大概也是些下人的住室及收藏食物器具被服的屋子，有一些高大的土棚子。第三层就美丽了，玻璃窗，雕刻而坚厚的木门与木壁，右栋数室，陈设颇精。有状若货架和壁相联的架子，分许多格，格内陈设一些玉如意、小玉佛、铜佛、瓷佛及其他古玩等。有床作长方形，木池无架；有精致的书桌，都是坚木做的。这大概是土司的卧室。左栋为两大厅，有木坑桌凳，壁饰都雅致。上栋为佛室。第四层上栋为大佛堂，有几面大鼓，藏经很多，用架处置，黑底白字，像我们裱制字帖一样，但白墨发光坟起，纸亦坚致；佛幡很多，绸质的。壁画年久熏黑，看不清楚。佛堂外围有很多木轴可转动，这是转“藏经”的，但上面已没有经。右栋一小佛堂，左栋是新装饰的佛堂。壁画新鲜美丽，马、象、狮、虎、英雄、甲冑等宗教图画栩栩如生，连屋顶都是这种神秘的美术。我们看见的除达维喇嘛寺伟大的美璧的壁画外，要算这里。前面一小客室，题“蜀锦楼”三字，是一位曾在广州大元帅府做过事的过客题的，还题了一首不大佳的旧诗。前面坪台可容一连人的操练，屋顶佛幡颇多，有高达三、四丈的。

现任土司索观瀛在成都大学读过书，刘文辉送他两

架机枪及若干步枪。又卧室内有几部《三国演义》以及蜀锦楼的题字。可见此人已有几分汉化^①。我们先头部队派人向他假道，被他杀了，因此把他打了一下。他索领百多番兵，窜入深山。我们因其反动，把他财产没收。但宫里许多古董器具，群众不敢要，我们不能拿，仍是原封不动。

宫旁有一碉，系石块垒上的塔，比屋还高，各层有高尺许的洞，即炮眼。这样的碉，番地颇多。圣武记上说，碉怎样险，攻碉怎样困难。有一封奏折上说：番人十多天可建一碉，而官军攻下一碉，需时月余，牺牲士兵，常至数百。但实际这种碉，不像国民党筑的碉——在山顶及要害地，而是同内地土豪家筑的避土匪打劫的楼子，我们在云南扎西地方看见很多，湖南也有叫做箭楼，可以防小匪，不可以御大兵，红军经过番区，没有据碉来防御我们的。

番人种的地都是土司的，要向土司纳租。什么都派差，土司烧的柴，吃的肉，甚至门前守卫的都由居民轮派，见了土司要跪，等他过去了才敢起来。至于土司对地方做了什么，只看土司宫前一条木桥万古流芳的捐名碑上第一名索长官捐大树两根，其余是该村各户捐派的，看那些名字知道这里有少数汉人寄居。

（责任编辑 刘家驹）

^① 这里说的“汉化”，是指四川军阀刘文辉等人常把土司邀去成都，一住几个月，吃花酒、坐汽车、看电影，使他们乐而忘归。同时还赠以枪支弹药，使其死心塌地地归顺。

从60年前拍摄的毛泽东照片说起

——红军老战士钱江忆长征

● 钱听涛



这是一张毛泽东东征回到保安(今志丹县),住在一家三孔窑洞前拍摄的照片。摄影时间是1936年7月中下旬,地点是中央军委毛泽东生活和办公的地方。摄影者是当时的军委青年干部钱昌鑫和邹毕兆。钱昌鑫后来改名钱江,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今年81岁高龄了。

钱江同志告诉我,这是他珍藏的几十张革命历史照片中最珍贵的一张,那时照相机极为罕见。1936年7月13日,美国记者斯诺在保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照了30卷胶卷的相片,最有名的是斯诺把他的八角帽戴在毛泽东头上所照的那张。钱江的这一张也摄于同一时间,可能比斯诺的那一张还早一点,但从来没有发表过。

钱江同志是我尊敬的革命前辈,我们称他钱政委。他向我缓缓叙述了60年前在长征路上一件件永远难忘的往事。

毛主席又过问红军工作了

长征开始时,钱江在军委二局已工作了一年多,他常常见到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就是见不到他经常思念的毛主席。他当时并不知道,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主席被排挤出党和军队领导岗位的详细情况。长征开始后,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跟随以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的干部团行动,钱江则编在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的二大队。这支有8.6万多人的队伍,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继续其错误领导,采取甬道式队形大搬家,队伍迤逦达200余里长。为了保卫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及后方机关,英勇的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于11月底强渡湘江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队伍一下子减到大约3万人。毛泽东多次提出的正确意见被否定,一直到12月11日在湖南通道召开会议讨论改变行军方向后,才开始有了一点转机。以后又通过12月14日黎平会议,1933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决定进军贵州,抢渡乌江,占领遵义,召开遵义会议后才发生根本的转折。

钱江记得过了湘江进入湘西后,已传来毛主席又开始过问红军工作的消息。有一天,毛主席派人送猪肉来慰劳当时工作和生活都处于困难状态的二大队同志,使他惊喜万分。钱江心里想,只要毛主席能过问红军的工作,情况就会慢慢好起来。他对毛主席有坚定的信念,也有深厚的感情。

他想起1930年10月刚参军时,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公务班当公务员,在卫生所当卫生员,经常看到毛委员。有一次,毛泽东在同医务所老医生闲谈时,邹南山医生开玩笑说,钱江长得像贺子珍,可以做贺子珍的弟弟。毛泽东笑着说,是很像,那就做她的小弟弟吧。一时在总司令部竟传开了这个“消息”。1931年9月,钱江被

调到宣传队当宣传员，不久就被送到无线电学校学习。钱江去向毛泽东和贺子珍告别时，毛泽东和贺子珍亲切地和他谈话，鼓励这个从小失去父母、受尽苦难的红小鬼学好技术，说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技术工作，还亲自剥柚子给他吃。钱江深深地感到红军是为穷人谋利益的队伍，毛主席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大众的大救星。

遵义会议后，红军开始打胜仗，特别是四渡赤水，使钱江感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当时毛泽东经常找二大队领导曾希圣了解情况，布置工作。钱江在中央苏区时，就听刘伯承参谋长讲，毛主席重视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说红军和蒋介石军队打仗，好比玻璃杯中“押宝”，看得清、押得准、赢得了，就是因为有了这项工作。1935年1月下旬，钱江在土城收到曾希圣转来的毛主席的一个手令，下令二大队要控制龙云系统的电台。可见毛主席早在札西会议以前，已有打算进入云南了。以后红军终于跳出重围，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绝处逢生。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领导坚信无疑，就是在这种生死艰险的体验中产生的。

钱壮飞失踪之谜

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在隐蔽战线上的“三杰”。特别是1931年4月，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向蒋介石告密，企图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幸而这一电报被打入中统特务机关头子徐恩曾身边当机要秘书的共产党员钱壮飞获悉，他连夜派人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转移，才使敌人计划落空。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在80年代被拍成电影《金陵之夜》。它的导演则是钱壮飞之子、北影厂的著名电影工作者、与钱江同名的另一个钱江，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钱壮飞在这次事件后再不能在白区工作了，党把他立即转移到中央苏区。因为他学过医、行过医，就分配到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卫生所当医生。钱江这时正在当卫生员，驻在建宁的康都圩。他对这位从白区来的比他大20岁的大知识分子既敬仰，又有点神秘感。但是不久就发现这个大医生看病认真细致，对伤病员和气耐心，写药方工工整整，很快就亲近起来。

1931年秋，在白区中央特科工作的胡底、李克农先后来到苏区。1932年1月，周恩来也来了。周恩来认为，这位1925年就入党，在保卫工作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钱壮飞，放在卫生所当医生不合适，就把他调到中央苏维埃政府邓发担任局长的政治保卫局工作。一年多以后，中革军委加强机关建设，在前后方均成立了军委二

局，钱壮飞又调任后方军委二局局长。1933年6月，钱江也调到同一单位，又在钱壮飞直接领导下工作。秋天，前后方军委合并，曾希圣任合并后的二局局长，钱壮飞改任副局长。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不仅懂医、懂无线电，而且擅长书法、绘画、演戏。长征开始后，工作极端紧张，敌人前堵后追，头上还有飞机盘旋。只要有一点空闲，钱壮飞就给大家讲故事，使大家得到一点休息。晚上躺在空旷的地方，他就指着星星讲星座，讲太阳系的行星、恒星，大家听得出神。就是这样一个敬爱的领导者，在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军委副秘书长（一说副参谋长）还未到任，却发生了突然的不幸。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绕过了一个个暗礁，取得了一个个胜利。3月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宋美龄和美国顾问端纳也来了。红军日夜兼程，突然向南急进，通过了敌军周浑元部在鲁班场一带设置的封锁线，贵阳兵力空虚，蒋介石又急调滇军来驰援。

在此之前，3月31日，军委纵队第二次渡过乌江，为了让别的部队先过浮桥，已到了早晨八九点钟，正是敌机来袭的时候，部队都分散隐蔽。这时，钱江所在的二大队才由沙土镇出发到牛场。途中，钱壮飞一个人去躲飞机，等到队伍过了乌江，才发现他没有来。领导立即派人在周围寻找，并且报告了周副主席；但是敌情十分严重，队伍在急行军，怎么也不能回过乌江去寻找。就这样，钱壮飞永远失踪了。附近都是深山密林，大家估计是遇到地主武装民团被杀害的。直到80年代，息烽县委党史办还专门为此作过调查，在一些老人中也听到一些传说，但对钱壮飞如何牺牲的情况始终无法得到确息。钱江对这位老领导的牺牲十分悲痛，长久地怀念他。

周恩来也一直怀念这位老战友，寻找他的遗属。抗战期间终于在重庆找到他的儿子钱江和钱锺，钱江当时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不久皖南事变发生，周恩来把他们兄弟两人送到延安。钱江进了鲁艺，钱锺进了自然科学学院。解放后，两个钱江相见了，共同怀念钱壮飞的革命业绩。钱壮飞的家乡浙江湖州专门派人，到钱政委处了解钱壮飞在苏区和长征中的情况，为钱壮飞烈士立传纪念。

最紧张的一夜

1935年6月17日，钱江翻过雪山，到达懋功的达维镇，终于和四方面军的战友会师了。钱江感到特别高兴。以后，在毛儿盖住的时间比较长。8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路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跟随徐向前、陈昌浩为首的前敌

总指挥部行动，下辖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是右路军；红军总部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及军委纵队的另一部分作为左路军，都应穿过草地北上。军委二局在右路军，从8月21日到27日，走了7天才走出茫茫草地，经班佑到达巴西。巴西是一些藏民村落，二局住在前敌总指挥部同一村子南面的一所房子里，参谋长叶剑英在总指挥部住，军委直属队分布在附近。红一军由林彪、聂荣臻率领已经北上，只有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驻在另一个村子里，相距有几里路。

在巴西住下后，钱江听到传说，张国焘不愿意北上。周围的同志都私下议论开了，主张跟毛主席北上，不愿意南下再过草地。9月9日，参谋长叶剑英忽然来到二局，通知曾希圣局长，说毛主席指示要二局随同中央立即北上，秘密作好出发准备，同时，要求曾局长带上一科的正副科长曹祥仁、邹毕兆，立即先到三军团驻地去，留下的同志准备待命。叶参谋长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密。钱江等听到通知后既紧张又喜悦，大家立即悄悄地把器材、文件和生活用品收拾好。

10日凌晨，按照预定计划迅速行动，拂晓前就到达三军团驻地。不一会，就见叶参谋长自己牵了马也赶来了，并且开玩笑说：“我开小差来喽！”钱江等都开玩笑答复叶参谋长：“那我们是开大差来喽！”以后才听说，这天晚上参谋长的马未卸下鞍，走时连警卫员也没有惊动。不久天已大亮，钱江等前去与其他军委纵队的同志汇拢，见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过一会，毛主席、彭老总、张闻天等领导也走来了，看到大家十分高兴。毛主席向大家讲了简短的话。大意说：“我们执行中央的决议，继续北上，张国焘决意南下到天全、芦山去，而且还企图阻挠我们北上。现在我们只好带着一、三军先行北上，开辟一条康庄大道。南下是错误的道路，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同志将来还会走上我们开辟的这条路。”说完，大家就急急上路。第二天到了俄界，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

一匹老黄马

爬雪山，过草地，在风雨侵衣、野菜充饥的艰难困苦中，周恩来来到毛儿盖突然患了来势凶猛的阿米巴肝脓肿。8月7日毛泽东去看望他时，发现傅连璋已到左路军红军总部去了。他焦急地立即派人到红一军请来最好的医生，经多日抢救，才脱离危险。但极度虚弱的周恩来，却不得不过草地。彭德怀要参谋长萧劲光设法。后来陈赓自告奋勇，与杨立三等组成一个担架队，硬是把周

恩来抬过了草地。

长征刚出发不久，毛泽东发现他的警卫员吴吉清患疟疾发高烧，便下令让吴吉清坐上他的担架，自己步行。刚过泸定县就要翻越大雪山，国民党飞机把毛泽东身边警卫班长胡昌保炸死了，毛泽东悲恸地双手抱住胡昌保平躺下，用自己的毛毯盖在他的遗体上。

9月11日，到达俄界的当晚，军委二局又发生主要技术干部之一李力田在行军中丢失的事件。李力田在巴西时患病已经很重，据说是9月11日要紧急行动，只好抽调人员搞了一副担架抬上他。结果在紧急行军中，连人带担架都不见了。曾希圣立即把此事报告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非常重视，并来了解二局人员的情况。当他知道二局还有其他病号行军困难后，就下令拨一匹老黄马供二局病号使用。

钱江这时正病得厉害。他在过彝族地区时就开始腹泻，在毛儿盖又误食毒菌，一直在带病值班。领导上就把老黄马分给钱江。9月14日离开俄界，沿白龙江走到麻牙，9月16日从麻牙出发，经花园向车眼（离腊子口约10余公里）前进时，全走的是大山的半坡，羊肠小道，崎岖不平。开始时钱江还舍不得骑老黄马，只把毯子放在马背上，让马在后面走。当天下午六七点钟，风雨交加，天黑得早，山路更难走。钱江受了冻，腿抽起筋，膝关节也无法打弯。再向前走全是下山路，山石高大，长满荆棘。这时他独自一人，全身湿透，寸步难行，已经掉队。他心里想，就是在山里冻一夜，也活不成了，难道只活20岁就要死在这大山里吗？正在绝望之时，听到后面忽拉忽拉的响声，一看，竟是老黄马走来了。钱江自言自语地说：“谢天谢地，来了救星，今天有你就有我，我非骑你不可了。”他费尽全身力气，蹬上路旁一个树桩，爬上马鞍，死死地趴在马鞍上，任凭老黄马驮他下山。两旁荆棘划破了脸、手和腿，痛得钻心，全都顾不上了。下了山，已是深夜，见到前面有灯光，想必是自己队伍，想要大声叫一下，但一点发不出声。总算走来了个饲养员，帮助钱江下了马，他竟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他才挣扎着进了屋。事后钱江多次说，没有毛主席给的这匹老黄马，他是必死无疑，白龙江这一晚，他终身难忘。

出了腊子口，进入甘南。钱江还是拉肚子。身上长了虱子，又臭又瘦，两眼像金鱼似的鼓起来。过了六盘山，走到铁边城，快到吴起镇时，忽然毛主席骑了马在后面走过。见到钱江时，毛主席停来说：“你不是钱昌鑫吗，怎么病成这样子，是什么病呀？”钱江见了毛主席，像见了亲人一样，只是花花地落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毛主席要警卫员扶钱江上他的担架，钱江坚决不肯。等了好一会，毛主席只好安慰他，说快到根据地了，就慢慢走吧。

钱江回忆起61年前这段往事，依然非常动情。

（责任编辑 王 恂）

我与“武生泰斗”厉慧良 的40年交往

● 冯其庸

回忆起慧良与我的交往，已经整整40年了。我是1955年看他的戏，并与他结交的。那次他在北京演出了一段时间，我是每场必看，并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高度赞扬慧良的文章。有一天，慧良来看我，那时我住张自忠路3号人民大学宿舍，五层楼上。慧良来畅谈甚久，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拿高登》里的“醉打”的场面。他说有的老专家、老观众认为传统的《拿高登》原是“醉打”，没有必要增加这些场面。他问我，我是什么看法。我认为这出戏里增加“醉打”的许多身段和场面，是这出戏的创新和发展，既丰富了表演，也丰富了人

物性格，而且完全符合情节，高登是个恶霸，也是个酒色之徒，既有了色，岂可没有酒。有酒有色，而且至于大醉，这才是高登，以前没有让他喝醉，这正是不足之处。岂可因为过去没有而不准现在新创？何况演出的效果特别好，观众的情绪热烈。慧良听了我的分析后，觉得非常有理，就决定这样定下来了，而我们的交往，也从此开始了。以后每逢慧良来京演出，必通知我，我也一出不落，总是全看。

我记得1962年慧良来京演出，在慧良之前，武汉高盛麟来京，剧目中有《洗浮山》、《长坂坡》、《连环套》。这几出戏我都看了。高盛麟是有名的杨派武生，常在南方，此次来京，形成了北京戏剧界的一个高潮。我对盛麟，也是十分钦佩的。记得1947年我在上海时，就非常喜欢他的戏。所以盛麟这次在京演出，对后来慧良的演出，既是增加了气氛，更是增加了“压力”。

慧良这次演出的剧目，有《长坂坡》、《挑滑车》、《拿高登》、《闹天宫》、《嫁妹》、《火烧望海楼》等。后一出是现代戏。尽管《长坂坡》已由盛麟示范在前，几乎是崔颢题诗，难以为继。但慧良自有自己的戏路和绝招，“枕戈待旦”一场，赵云“主公且免愁肠，保重要紧”一句道白，于苍凉道劲中饱和着一腔忠贞的感情，真是声情并茂。当时即有人评价：深得杨小楼神韵。后来在糜夫人投井一场中，赵云于措手不及之际，抓帔、倒插虎等一连串连续性的高难度身段动作，慧良演来，依然节奏紧凑而动作利索干净清楚洒脱，如行云流水，真是神来之笔。看过盛麟这出戏的老戏迷，无不称赞，有的则直认是杨派神韵！慧良的《拿高登》，出场就与众不同：背向观众，反手握大纸扇贴背拍扇，一足独立，一足弯举，踩着锣鼓点子一足移步，自帘门口直到台口，然后大转身亮相。慧良这一亮相，每次都全场彩声轰然。后面“醉打”的身段，更是淋漓尽致，层次分明。开始是目光斜视，用眼神来表示对敌手



作者与厉慧良摄于乙亥元月二日

的轻视和鄙视。继而交手之后，突觉来者不善，大敌当前，一惊而吐，随即酒醒。其呕吐理须等细节，简练而传神，平添不少生活真实。接着再开打，便是一番生死搏斗，从眼神到动作，都贯串着一股拼死挣扎的狠劲。所以看慧良这出戏，并不是单纯看他的身段动作和开打的种种架势，更重要的是让你看到角色的心理，随着情节的变化而发展。到80年代慧良再演这出戏时，其背向观众独步出场一段，已改为正面出场。我很为此惋惜，曾问过他。慧良笑笑说，已经30多年过来了，体力毕竟不如当年了！然而，我看他“逛庙”一场，在帘门口大喝“闪开了！”一声，如闻惊雷，然后趟马，几个大圆场，其慑人的气势，简直如同猛虎下山，依旧不减当年之勇。

慧良的《嫁妹》，同样是他的杰作，甚至可说是戏中的“神品”。这是一出悲剧中的喜剧，于凄惨苦楚之中深含着人情味。这出戏，处处透露着矛盾的对立而又统一：以一群“鬼”而充满着人情味；在一副丑陋甚至可怕的面貌下却深藏着一颗善良的心；是一副粗犷凶狠的架势而却动作妩媚天真，惹人喜爱；在表面的鬼气森森下却给人送来了琴剑书箫、平安吉庆……所以这出戏旧时常在岁首迎春时演出，以示吉庆。慧良这出戏，重在舞蹈身段和场面的安排，每一个场面都是一种塑型的美，装饰的美，而每一个身段，都是姿态横生，妩媚动人。要说中国戏剧中的塑型美，这出戏恐怕是很突出的。犹记得1955年慧良演这出戏时，有一个场面，众鬼簇拥并高举钟馗，这时台上暗场，一束灯光打在钟馗身上，钟馗高举牙笏，穿一身大红袍，灯光下帽翅摆动，两眼炯炯有神，远看宛如悬挂在大厅中的一幅朱笔写意大钟馗，神彩飞动，栩栩如生。慧良的这些精彩场面还有不少，不能一一缕述，而这一切都是慧良的新创造，与原有的传统程式，有显著的不同。

1962年慧良在京演出后，戏剧界的评价是很高的，尤其感到每一出戏，都有他自己的神韵，给人以有不尽之意，而这一点正是武生戏最最难能可贵之处，也正是这一点，标志着厉慧良在长期的博采众长、不宗一派的实践中，已经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流派——厉派。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慧良来京演出了现代戏《六号门》。之后，过了不知多少时间，我就得不到他的消息了。1966年，那场空前的风暴席卷天下的时候，我听到不少有关他的可怕的消息，以后不久，我自己也受到了意想不到的风暴的席卷，之后就再也无法听到他的消息了。有一天，忽然慧良的儿子——厉钢铁来找我，我这才知道慧良因事入狱，但并没有死；还知道钢铁考取了戏校，又因为他是厉慧良的儿子被取消了入学的资格。我真为他可惜，他的身材和嗓音是多么好啊！他到我家来，我就爱听他的说话。然而就连他，后来也永远没有

了消息！

1978年，慧良终于出狱了。是由冯牧首先告诉我的，而且在将要出狱之前冯牧就告诉了我。因为我们只要见面，就常常会想到慧良。1984年，慧良重新在北京登台，剧目中有《长坂坡·汉津口》。我们大家为他担心，20年不演，这次重登舞台，能否拿得下来。但演出的结果，却比较满意，除了嗓音已大不如前外，其他功夫没有搁下，依旧拿得起来。当时我看过他的《长坂坡·汉津口》后，非常高兴，曾题了三首诗：

一

二十年来不见君，
依然蜀汉上将军。
秋风匹马长坂上，
气压曹营百万兵。

二

豪气多君犹似云，
沙场百战见精神。
当阳桥下秋风急，
跃马横枪第一人。

三

熟读春秋意气高，
汉津渡口待尔曹。
莫愁前路风波险，
自有青龙偃月刀。

这三首诗写出后，我用毛笔写成条幅送给了慧良，但寄给几家报刊都不敢发表，一直过了很久，大约有一年多，才在上海一家报上发表。

1985年，我因事到上海，恰值慧良在上海演出，那天恰好又是演《长坂坡·汉津口》。关良先生的学生曲章富来告诉我，关老也去看戏，问我是否一起去，我当然非常高兴，特别是关老特为慧良画了一幅他的《长坂坡》的赵云，同时也为我画了一幅《拿高登》里的高登。那天我们到剧场晚了一点，只见剧院门口挤满了等退票的人，戏演得十分精彩，彩声满堂而且不断，比起1984年出狱后初次在京演出，可以说是一次极大的跨越，我看他的《长坂坡·汉津口》，实在应以此演出为典范。到谢幕时，竟谢了30多次。有的观众送上去的软匾是“武生泰斗”，慧良连声道谢，有几位观众一起送上去的软匾却是“空前绝后”。慧良看了，连忙请他们拿下来，说决不敢当，而且也决无此理。在慧良的坚决要求下，终于把这幅软匾收了起来，没有挂出。这时我与关良先生和曲章富同志一起上台，向慧良赠画并一起拍照，慧良见关良先

生和我到了台上,特别高兴,但那天实在太拥挤了,关老身体又不大好,所以没等慧良事完,我们就告辞出来了。

之后,慧良与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每到北京,不是用电话告诉我,就是直接来看我,但经常是先来电话,跟着人也来了。1994年他去安徽拍电视剧《程长庚》,临行之前给我来了电话。到这年的4月14日,他寄给我一张他饰米喜子的剧照。这年的10月1日,他又寄给我他在上海为梅、周两位大师纪念演出《战宛城》的剧照,照片背后写着是这年9月18日出演的。特别是1995年春节前,他来京参加春节联欢节目,打电话告诉我住西直门宾馆,我随即去看望他。见面后非常高兴,他说等任务完成后再去看来。到了旧历的年初二,他真的与他的夫人一起来了,因为以前他曾与他夫人一起来过,所以很容易就到我住处了。那次我们一起拍了好多张照,因为正是春节,来客很多,所以坐了不到一小时,就辞别了。行前还谈到他的身体情况,他说还好,我看他精神很足,兴致很高,所以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意外。他与我是同年,反倒是他嘱咐我保重身体。谁知这次分别,竟然成了永别!

我是3月1日读《新民晚报》才得知这一消息的,我看了报纸,实在不敢相信。我给他拍的照片还刚刚洗出来,还没有来得及给他寄去,照片上他多么有精神,我哪里能相信呢?我立即拿起电话,给他家里挂了一个电话。电话是他儿子接的,告诉我他父亲是2月27日去世的,现在正在给我寄讣告。我听了这话,再也不能不相信了,我怀着巨大的悲痛,打电话告诉冯牧,谁知冯牧也在医院里,小玲告诉我,冯牧已经知道了。我在悲痛之余,拿着刚刚取回的照片,久久不能平静,我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

匆匆过客喜盈门,
摄得梅花已断魂。
无限浮生沧海意,
为君一展一泪零。

3月2日我去辽阳开会,我在沈阳给慧良家里发了一个唁电,送了一首挽诗:

霹雳惊雷报,伤心泪雨纷。
从今长坂上,不见汉将军。

我多么想赶去天津送别慧良,但我在辽阳正主持会议,无法分身。事后我听说,全国和国外去的唁电就有成千份,送的花圈也上千,特别是沿路送殡的队伍愈走愈长,不断有人自动加入,竟达数里!这实在是“空前”的。在上海演出时,慧良不准观众用“空前”的词来形容他。但是现在这“空前”两字已是事实,而丝毫也不是形容了。我认为这么多的唁电,这么多的花圈,这么长的送殡的群众队伍,这就是对慧良的最崇高的评价,慧良塑造的艺术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前些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评价慧良的艺术。我说第一是新。慧良的艺术,充满着创新精神,一出传统剧目,到了他的身上,就会推陈出新,放射出前所未有的新的光辉;第二是美。慧良创造的角色,他让观众欣赏的,不仅仅是他的功夫、架子、身段,而更是他所塑造的完美的艺术形象。任何人看了他的戏,无论是赵云,无论是高登,无论是钟馗,留在脑子里的首先是完美的艺术形象,而不是他的一招一式。第三是神。慧良所演的这些角色,这些艺术形象,没有一个不是神完气足的,而且没有一个不是给你留下无穷的韵味的,这一点,其实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我曾经用王羲之的书法为比喻,来形容慧良的艺术,诗云:

字到钟王有几人,
纵横挥洒见神均^①。
为君一语千秋评,
君是右军劫后文。

王羲之世称“书圣”,他的书法,不仅有神,而且有韵。他的书法,尤其是以《丧乱帖》、《二谢帖》、《孔侍中帖》等为极致,因为它纵横挥洒,不拘绳墨,而皆臻极致。这个极致是什么,就是神极而韵!

我曾经说过,厉慧良是我们时代的杨小楼。什么叫“我们时代的杨小楼”?这就是说,不是原来杨小楼的翻版。如果说以当年杨小楼的一招一式去绳墨厉慧良,那就失之千里。每一个时代的艺术,总是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和美学内涵的,唯其如此,艺术才能日新又新,不断发展。即使杨小楼在今天,也决不会墨守成规!理解了这一点,那末再来欣赏思索慧良的艺术,把他称作是“我们时代的杨小楼”,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现在广大观众和戏迷们又为慧良起了一个别号,叫“当代武王”。仔细品味,这句话的意思,也与“我们时代的杨小楼”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但平心而论,“当代武王”四个字,更富有现代精神。“当代”,当然就是“我们的时代”;“武王”,当然是“武生之王”,也就是武生的泰斗,武生的极致。这不等于说是武生中的杨小楼吗?

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是神极而韵。厉慧良的艺术,到了晚年,同样是潇洒自在,神极而韵,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总结厉慧良一生的艺术,到了晚年,确实可以说是“尽得风流”,“神极而韵”了!

(这是作者为魏子晨撰写的《慧良传》而写的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 洛松)

^① “均”即古“韵”字,平声。此处必须押平声韵,而“韵”字是仄声,故用“均”字而不用“韵”字。

契丹一代巾帼英主萧太后

● 王兴文 关玉华

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后妃何啻数千,一部廿四史《后妃传》就占了很大篇幅。她们之中贤愚不等,良莠不齐。辽朝景宗之妻、圣宗之母萧绰,史称承天皇后(也就是历史故事《杨家将》中的辽国萧太后),她辅佐病弱的景宗,决断军国大事14年,又监护年幼的圣宗,临朝摄政27年,对辽代的有效统治长达40余年。在她统治期间,主张改革,倾向汉化,对宋用兵,使辽朝达到鼎盛时期,完成封建化进程。是辽代一位明达治道、习知军政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代巾帼英主。

一、步入宫闱 初露端倪

承天太后,姓萧,名绰,小名燕燕,是辽朝北府宰相萧思温的小女儿。萧思温共有三个女儿:素素、丽丽、燕燕,一个养子萧海只。在这四个儿女中,要数燕燕最为聪颖,有过人之处。萧思温曾观察三个女儿扫地,只有燕燕扫得最干净,萧思温暗想,这个小女儿将来必能成大器。自此燕燕深得其父的宠爱。萧思温在辽穆宗时官至侍中,史书记载,他城府颇深,工于心计,很有政治头脑。燕燕自幼受其熏陶,也锻炼得聪颖过人,处事不惊,临危不乱,善于处理各种棘手的难题。加上她的天姿国色,因此在景宗即位之初,即被选为后宫之妃,并很快得到宠幸,立为皇后,生梁王耶律隆绪。

景宗是辽世宗的第二子耶律贤,他4岁时叛臣察割作乱,世宗遇害,耶律贤被人藏于草堆中才得免于死。但从此却得了风疾,身体羸弱不堪,时常发病。继世宗即位的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子,按辈分来说是景宗的叔父,他被穆宗收养为长子。后来在萧思温等的拥戴下继承了大统。但因迷恋燕燕的美色,纵欲过度,致使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上朝理政日数越来越少,渐渐地政务多由已为皇后、思维敏捷、处理果断的燕燕处理。在这时期,国家的刑赏、政事、用兵追讨等都由皇后一人处决,特别是对契丹贵族内部企图谋取皇位的诸王予以强有力的打击和镇压,这对于稳定大辽国的内部统治秩序、实现

她倾向汉化的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辅佐景宗的14年中,这位年轻貌美的皇后善于把一场场险急的风波,从容化解。置身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一出场她就棋高一招,显示了非凡的胆略和智慧。自此,辽国群臣无不低眉垂目不敢仰视,她的后位也就愈加巩固了。

二、摄行国政 明达治道

公元983年(乾亨五年)35岁的景宗奄然物化,遗诏:长子、梁王耶律隆绪嗣位,这就是历史上的辽圣宗。但圣宗年仅12岁,不能正式当国,燕燕亦奉遗诏以太后身份当国摄政,并上尊号为承天皇太后。承天太后虽然奉遗诏摄政,又干政多年,但形势不容她乐观。当政者孤儿寡母,主少国疑,诸王宗室200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虎视眈眈,内外震恐。尽管她自己宵衣肝食,夙夜忧勤,仍然觉得势单力孤,难于支撑这偌大的局面,形势迫使她必须在大臣中找到可以信赖依靠的力量。经过仔细观察,她选中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和汉官韩德让三人。有一天,把三人召入密室,哭着对他们说:“我与皇帝孤儿寡母,诸王宗室握有实权,非常强大,边防事务还没有头绪,这可怎么办呢?”三人听后急忙跪地回答:“信任臣等,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于是承天太后马上就让他们参与了国家大政。但她又非寻常女子,为了进一步笼络他们,又让圣宗与耶律斜轸当着她的面交换了弓矢鞍马,约以为友;以父皇之礼对待韩德让,宠信备至。在他们三人的鼎力辅佐和帮助下,承天太后施政就更加得心应手。首先她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敕令诸王各归领地,不得私相聚会,违者以谋反论处,然后又对企图谋反的冀王等各个击破,夺其兵权,使这些人再也无力为乱。这样,在她当国摄政,施展政治抱负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就基本上铲平了。

承天太后掌握政权以后,锐意革新,在很多方面取得成效。释放原来为皇帝宫帐(斡鲁朵)和皇族宫帐(横帐)捕鹰、冶铁的奴隶为平民,提高部曲身份;因袭唐代两税法,实行封建赋役制度;减轻刑罚,废除苛政,悉心

听断，亲自处理冤狱，强调契丹与汉人平等。除此外，承天太后从小熟知汉文化，并深受其影响，她深切感到，要使大辽国昌盛，必须克制狭隘的民族观念，下决心向汉人学习。她不顾契丹贵族的反对，大量擢用汉官，重新整编部族，整顿吏治，广建学校，开科取士。为了便于同南朝宋国的交往和贸易，承天太后还做出了历代皇帝想都不敢想的建设中京新城的设想。所有这些，莫说是发生在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偏安的国度，发生在一个年仅30余岁、身单力孤的皇太后身上，就是在泱泱的中原大国为君之道如此者，也是寥寥可见的。

总的来看，承天太后摄政以后，在处理棘手的国事问题上，总能显现出她的神机智略、明达治道。她除旧布新的政策，巩固了辽朝的统治，在辽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辽圣宗时最终完成封建化，出现鼎盛局面，和承天太后先行奠定的基础，以及她对圣宗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在承天太后摄政的27年中，深得大辽子民的拥戴，不愧为一代“国母”！

三、铁腕戎车 澶渊结盟

辽与北宋相邻，两个政权之间的冲突时断时续。宋辽之间的和战关系，对双方都是一件牵动政局，影响立国的大事。

承天太后摄政之初的986年（统和四年），宋朝大将贺怀浦、贺令图父子及刘文裕等相继上书宋太宗，说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大臣韩德让宠幸用事，请乘此机会对辽用兵，夺回已失他手多年的幽、蓟之地。宋太宗闻报后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进军良机。在他看来，夺回失地固然重要，但澶雪前耻（公元979年宋太宗亲征辽朝，大败于高粱河）、重振国威亦是不可小觑的动力。经过一番部署、准备，在这年春天宋太宗就兵分三路大举北伐。东、中、西三路大军数十万，分别由大将曹彬、田重进和潘美、杨业统辖。战争伊始，宋军咄咄逼人，连取岐沟（今河北涿县西南）、涿州（今河北涿县）、固定（今河北固安）、新城（今河北新城）、飞狐（今河北涿源北）、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州）、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等地，大有一举收复幽、蓟之势。

面对气势汹汹、扑面而来的宋军，承天太后指挥若定，沉着应战。以她睿智的谋略和过人的胆识，采取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宋兵连破城池、锐不可挡，认为辽兵不堪一击，滋生骄傲情绪；同时，各路人马急功近利，派生出无端的矛盾。也就是在此时，承天太后与辽圣宗驻兵驼罗口（今河北涿县东北）派出文武兼备的耶律斜轸、智勇双全的耶律休哥等大将率辽军杀奔各地战场，又调动东征兵马以为应援。四月初，承天太后又驻蹕于南京（今北京北郊），指挥辽军集中优势兵力进行

反攻，重创宋军主力曹彬部于岐沟关，宋兵狼奔豕突，拼命南逃。七月，耶律斜轸攻占朔州时，擒获抗辽名将杨业。杨业身受重伤，被俘后绝食三日，不屈而死。

这场战争辽军取得了完全胜利，自此以后宋朝更无招架之力，对辽的战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从辽方来看，承天太后作为最高指挥者，睿智而有韬略，善于把握战机，用兵无常法；她重用德能之士，赏罚分明，多得将士死力。这与墨守成规，派监军控制军队，常用“阵图”指挥作战的宋太宗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看来，此次战争宋辽双方不战，胜负亦了解矣。

公元1004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9月，为保疆土完整，边境安宁，在对宋的虚实做了一系列试探之后，承天太后“亲御戎车，指麾三军”，与圣宗率20万大军倾国南叩宋廷。大军自幽州取道保州（今河北保定）南下，势如破竹，莽莽平原，宋军无险可守，辽兵、辽将又多为骑射之辈，勇猛异常，因此，大军直抵宋朝军事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澶州，古称澶渊，是宋都开封以北、黄河南岸的军事重镇，堪称宋都的屏障与门户。宋朝开国以来，与辽战事不断，深知澶州之重要。在接到辽兵已抵澶州城下的战报以后，宋廷上下一片惊慌，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提议逃往四川，一时人心慌慌。只有宰相寇准力排众议，晓谕利害，劝真宗御驾亲征。宋真宗无可奈何，只好在众卿的簇拥之下勉强来到澶州城，当他的黄罗伞盖出现在城头上时，宋军士兵欢呼雀跃，士气大振。

其实，承天太后这次挥师南下，进攻并不十分顺手。所攻城池多遇宋军顽强抵抗，如攻打瀛州（今河北河间）时，承天太后亲冒矢石，击桴鼓督战，死于城下者凡三万余人，城池仍岿然不动。它如攻保、定（今河北正定）及天雄军（今河北大名），辽军亦是狮子搏兔，用尽全力，仍然一挫再挫。特别是到达澶州城下不久，统帅萧挞凛被宋兵射死于城下，对承天太后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悬军深入、进退两难的局面，承天太后审时度势，认为在宋辽多次战争中，尽管辽胜多负少，但除军事以外，辽各方面都远不如宋，特别是经济落后，这样长久相持下去，对辽未必有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她决定以大军压境为前提，胁迫惧战的宋真宗不战而降。她一方面派出业已降辽的宋将王继忠为信使，联络议和事宜，一方面又猛攻澶州城。当宋真宗接到辽朝愿和谈的信件后，当即就表示他早想止戈息民，不想穷兵黩武，如辽真诚言和，请及早告之。后几经周旋，承天太后派飞龙使韩杞与宋代表曹利用正式进行和谈。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宋真宗尊承天太后为叔母，辽圣宗称宋帝为兄；宋朝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互不招纳降附和沿边境增筑城寨，开掘河道。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

之盟”。约成以后，宋廷即下令诸军不得出击，听任辽兵自行撤走。于是，原来陷于进退两难的辽军，反得以战胜者的姿态班师北还。

对于澶渊之盟，历史上一向认为是宋真宗的妥协投降和承天太后侵略的结果，这一定论似乎有失公允，评论者恰恰忽视了它积极的一面。这个盟约，是双方互战不下，力量均势下的产物。订盟以后，两朝各守其界，铸剑为锄，结束了双方长期战争的状态，此后一百多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百姓得以免除战争的屠戮，两朝都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经济都得到长足发展，呈现了两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双方的经济交往也日益繁密，中原的茶叶、粮食、丝织品、漆器等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大量输入辽国，而辽的牛、羊、马匹等畜产品也源源运到中原，起了相互调剂的作用。这种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大好形势，是承天太后首倡、宋辽两国君主高瞻远瞩、顺应历史发展和人民要求，毅然议和的结果。

四、金屋红粉 两情久长

承天太后在对辽朝长达40年有效统治的风风雨雨中，无论是其政治改革，还是军事活动，无疑取得了莫大的成功。但是，她是女人，在这铁腕戎车的背后，在情感舞台上，她扮演的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前文我们提到，在景帝驾崩、圣宗年幼、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萧燕燕倚重韩德让等人，诛除异己，摄行国政。她视韩德让为心腹，这除了韩德让才能出众，为国家栋梁之材以外，还有就是她与韩德让的关系并非寻常。史书记载，在萧燕燕18岁的时候，也就是公元969年，她已经出落得如花似玉，姿容倾国倾城，吟诗作赋，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能歌善舞，还精通武艺，名满整个上京城。经萧思温和韩德让之父韩匡嗣之命，二人订下婚约。这一年韩德让28岁，亦是器宇轩昂，英俊伟逸，文武双全，二人一见钟情，相互都认为自己找到了爱的归宿，燕燕更是受契丹习俗的影响，敢说敢爱，从见到韩德让那一刻起就许下的心愿：“愿做君家梁上燕，衔泥筑巢伴终生。”这是一种情深意切而又大胆的心声流露。

萧韩两家订下婚约不久，辽朝历史上号称“睡王”的穆宗被弑，萧思温、韩匡嗣等拥立耶律贤即位，是为景宗。景宗即位三个月后，突然下诏，命名满上京城的萧燕燕入宫陪王伴驾。自古以来皇家圣命难违，对此萧韩两家虽为重臣，但也无可奈何。萧燕燕不愧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孩，深明大理。入宫前，就与韩德让说：“这事我也反复权衡利弊，个人生死尚不足虑，关键是万岁初立根基未稳，有多少亲王大臣在窥测时机，倘因此你我二家失势，就是贬出上京，也必然有人趁机谋反，天下又将大

乱，我们又怎忍心叫百姓遭兵祸，生灵受涂炭呢？”于是，萧燕燕毅然割舍了心爱的人，步入宫闱，过起了“红烛高烧，锦帐生春”的后宫生活。但萧燕燕并非一般女子，她不甘心只做一个贤淑的嫔妃，她要在后宫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要让皇帝在政治上听取自己的主张。她认为，只有取得这样的权力，才能暗中保护韩德让，才不枉相爱一场。因此，自进宫以后，她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利用自己的才智和美色，曲意逢迎景宗，很快就得到了景宗的宠爱。时隔不久，景宗便颁旨册封她为正宫国母，这为她走向权力的巅峰，实现她的宏愿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景宗长逝，圣宗即位，萧燕燕以皇太后身份摄行国政。摄政后，外戚无能，诸子尚幼，她倚重的对象自然就落到了曾与她有过婚约，“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韩德让身上。二人的感情也随着往来的频繁与日俱增。摄政这一年她32岁，韩德让42岁。她让圣宗像对待父皇那样对待韩德让，每日一请安，礼遇甚隆，韩德让出入后宫，亦如自家，太后每出猎，也必与德让同居一处。他们的姻缘，时隔多年，到现在才得到完美的实现。

对于国家最高统治者这种“移情别恋”，辽国朝野上下并无异议，这大概与契丹习俗有关。契丹族与匈奴、乌桓、鲜卑、夫余各族同为北方民族，他们之间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这几个民族都有父死妻其后母、兄死以嫂为妻的习俗，契丹社会亦是如此，对于女人再嫁视之当然，况萧韩二人又是“重谐旧好”呢！对于母后与韩德让的关系，圣宗心里亦是了然。但聪明的辽圣宗，理解母后的苦衷，也认识到韩德让在辽国生存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无条件支持母后全力依靠韩德让辅政的策略。这样就使得韩德让在辽国的地位不断上升，作用举足轻重。988年被封为楚王，999年兼任南北两院枢密使之职，不久又拜为大丞相，晋封为齐王，1001年又赐其名为德昌，这也是后来有关戏曲小说中“辽国元帅韩昌”的由来。1004年，又赐姓耶律，再封晋王，1010年，又赐名隆运，出宫籍，列于皇族横帐季父房，按景宗庙位排列，可谓是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所有这些，应该说是承天太后知人善任、情有独钟的结果。

1009年，承天太后由于长期勤于国政，连年征战而积劳过重，一病未起，溘然长逝，享年57岁。两年后，韩德让也为辽国的强盛竭尽了最后的心血。

承天太后，从18岁入宫到57岁而亡，这40年中，她以其聪明才智，过人胆识，伟大的魄力和政治家的头脑，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她的政治才能和军事韬略为世所公认。对宋战争，以国母之尊驰骋沙场，在中国历史上应数独此一人。我们说她是契丹一代巾帼英主，伟大的女政治家、军事家，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在中华民族的英雄之林中，她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 萧 徐）

庆祝 炎黄春秋 杂志创刊 五周年

放胆直言當今史鑑
生花妙筆千古文章

炎黃春秋五周年

李銳

歌行千里
月上五層樓

賀炎黃春秋創刊五周年

丙午年

孫越

紀念炎黃春秋創刊五周年

對歷史要講
真實話

傅崇碧



獻壽圖
馬正初畫



浩然正氣袖日乾坤
賀炎黃春秋創刊五周年
馬正初畫

漫画家的祝贺

源遠流長

炎黃春秋創刊五周年

馬正初

傅崇碧



炎黃春秋
馬正初

賀炎黃春秋創刊五周年

炎黄春秋



“太上皇”洋顾问李德离开中国之后
碧血丹心的郭化若将军

谢子长之子谢绍明是怎样继承父业的

我与“武生泰斗”

厉慧良的40年交往

契丹一代巾帼英主萧太后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00元